

不被理解的毛泽东

卷三

作者：虚声

校对：**Kunter**

本文来自网络，涉及版权请联系作者虚声

第五篇 刘少奇篇（上）

一、刘少奇篇序——一种奇怪的现象

仔细看看那段历史就能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刘少奇现象。

在那个枪杆子决定一切的年代，刘少奇在军功方面即使不能说是零，跟其他将帅比，也差太远了，基本上没有直接指挥过战斗，可是到了建国那会，刘少奇的身份是党内二把手。这是一个相当奇特的现象，初看起来相当费解。

现在看起来费解，当初那些人何尝不费解？尤其是军方的人物。

自始至终，当年的军方大佬对这位党内二把手都不怎么买账。建国之前就不说了，没有哪个山头的大佬会听从刘少奇的指挥；建国之后军方势力一次又一次向刘少奇扑来。从高岗到彭德怀，到林彪，一波接一波，一波比一波凶猛。

这一连串的冲击波之后，刘少奇终于迎来终极对手——毛泽东。

首先是高岗，嚣张一时又因为自身不慎（误解毛泽东的意图）而倒下。

然后和刘少奇关系密切的军方红人粟裕挨整。

庐山之上，彭德怀差点就给刘少奇致命一击。因为在彭德怀看来，以刘少奇为首的国家政府要对当时的严峻形势负责。大饥荒之后，刘少奇对庐山事件表态：唯彭德怀不能平反。

之后和刘少奇关系紧密的贺龙和罗瑞卿惨遭打击。

在一次又一次的风波中，都能看到刘少奇的身影。即使他远去之后，他的身影还在，依然影响着那些尚在人间的朋友和敌人。

就是这样一个不受待见的刘少奇，不仅成为党内二把手，而且在一次又一次的风暴之后，还成了国家实际上的元首。要不是缔造这个国家的毛泽东还在，他就是名副其实的国家领袖，而非现在的被称为国家第一号蒙冤者。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对手无数。这些对手，皆一时之雄杰。既有蒋介石这种难得一见的政治强人，也有王明这种共产国际空降兵，又有张国焘那样的党内元老派。大饥荒之后，刘少奇加入了这个毛泽东的对手行列。如果说大饥荒之前，刘少奇还只是一个在毛泽东的羽翼下的理论家，那么通过大饥荒的一番折腾，刘少奇已经成长为一个政治能量堪与毛泽东匹敌的政治家了。

正因为毛泽东还在，国家主席刘少奇才不可避免地要走到领袖的对立面，从领袖最可靠的战友变成领袖在建国之后最大的敌人。当然，从个人角度上讲，刘少奇没有任何理由责怪毛泽东，没有

毛泽东就没有刘少奇。但是从政治理念上分析，刘少奇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要走上政治的最高擂台，和领袖一决高下。

现在领袖和他的战友要先刘少奇出手了。如果他的运气足够好，能够化解毛、林两人的霹雳手段，那么他将成为历史的巨人，也就没有后来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中国将比现在进步至少十年。现在的邓小平理论可能就是刘少奇理论。

十年是一个什么概念？

在这个历史终将以百年为单位来记述的世界，十年并不算长；放在历史上连一瞥都不够。然而如果站在现在，展望十年之后会怎么样呢？

大概十年之后中国的房价会跌到大家都买得起的水平上，或者医疗体系什么的都建立完善起来了，可能教育会改革得更为合理一点，国民素质差不多会再上一个台阶。然而历史没有给他这么一个机会。

所以，评价刘少奇的一生，就一个字——伤。

不仅是他个人之伤，也是国家民族之伤，更是时代之伤。

透过一连串的“伤”字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必然性。

刘少奇的伤，有其必然性，这才是悲剧的根源所在。

二、刘少奇的奋斗史

（一）刘少奇的出身

在中国的中部，有一个巨大的淡水湖，叫洞庭湖，古称云梦大泽。其气势有诗为证：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洞庭湖盘踞在中国的中央，几千年来一直滋润着中国的核心地带，孕育出一个奇美绚丽的楚地文化。在洞庭湖南边有一个平原和山丘起伏之地，曰湖南。

湖南属楚地，和湖北、安徽等地撑起了古楚文化。屈原就是楚文化的光辉代表。两千年前，人格洁净到近乎无暇的三闾大夫在楚地唱起悲歌，这一唱，唱出了楚人的心声。他的傲骨，他的悲鸣，深入中国人的灵魂的同时，更加深刻地影响着湖南人。近代湖南人的倔强倔强，大概可以从那位伟大而悲情的浪漫主义诗人的身上找到源头。

屈原之后，楚地人才辈出，贾谊、周敦颐、王夫之等人都是大名鼎鼎，然而这些人的成就以思想艺术为主，这条线一直延续到近代，包括田汉、齐白石、丁玲等人。

在近代历史上，湖南涌现出许多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他们左右了中国的命运。像曾国藩，没有他，太平天国运动肯定要折腾更久。没有曾国藩就没有湘军，也可能没有淮军；没有湘军和淮军，天知道清王朝是啥样，估计撑不到辛亥革命就挂了。同时期的左宗棠也不差。

说起辛亥革命，就不能不提另外一个湖南人——黄兴。没有黄兴，指望同盟会那群愤怒的书呆子把革命闹成功极不靠谱。黄兴之于孙中山，犹如朱德之于毛泽东。遗憾的是孙中山贵为民族革命先行者却不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所以国民革命先天不足。没有黄兴，孙中山将更为艰难。孙中山的革命失败，败于袁世凯之手。

提起袁世凯，就必须提另外一个湖南人——蔡锷将军。说起蔡锷将军，那是英明神武、风流倜傥，“小凤仙”三个字给历史增添了多少绚丽。在蔡将军短短三十四年的人生旅途中，最为高光时刻当属率领护国军讨伐袁世凯。一代枭雄袁世凯在护国大旗下绝望。蔡锷在光芒四射的一生中带出了很多将军，例如朱德、李宗仁。这两人分属国共两党，更为直接地影响中国的命运。

之后，湖南人迎来了巅峰。

古往今来，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大的湖南人肯定是毛泽东了。和毛泽东同时代的湖南人中，还有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人。

评：整个中国近代史，不出湖南。

在这一大堆湖南人中间，刘少奇或许并不是最出色的那一个。然而和其他人不一样的是，刘少

奇的故事属于启示录。

好吧，那就说说刘少奇。

湖南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山山水水交错相连。在山水相间之地，分布着一个个小盆地，简称为冲，像韶山冲。在众多冲当中，有一个冲的老百姓擅长烧炭，故称炭子冲。

直到一八九八年之前，和其它冲相比，炭子冲并无不同。老百姓遵循着千百年以来的生活习惯，消受着时间的欢乐或悲痛。世人并不在意这样一个平常且平凡的小冲子。炭子冲之所以能进入世人的视线，只因为一八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四号这天，一个男孩出生了。

这个男孩就是刘少奇。在以后的岁月里，刘少奇让炭子冲在地图上变得醒目起来。

刘少奇出生的时候，有一个八个月大的婴儿叫周恩来。在三十公里外的韶山冲里，有一个五岁的男孩正在玩耍，他叫毛泽东。另外在四川仪陇，有一个十二岁大的男孩，叫朱德。日后，这几个男孩成为中国近代半个世纪的主角。

刘家原本是江西人，因祖上有人在湖南做官而成了湖南人。然而和那个时代很多家族一样，刘家越传越不怎么样。传到刘少奇的曾祖父刘在洲那一代，刘官家变成了刘农民。好在刘在洲同志勤劳能干，把自家那点地打理得有板有眼，还扩大了地盘——租了点地。又经过一系列的辛苦劳作，家庭生活开始越过越好。

在中国，靠一代人的努力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个好儿子。刘在洲的儿子刘得云，也就是刘少奇的爷爷，继承了老爸勤劳能干的光荣传统，继续辛勤劳动扩大地盘，有了几十亩地，算小地主了。地多了，生活改善了，改善的结果就是孩子的教育好了。刘得云的儿子刘寿生粗通文墨，大字认识不少。而且他和上两代不太一样，不再一心想着扩大地盘啥的，而是对孩子的教育比较热心。

刘寿生三十四岁那年，也就是一八九八年，迎来了第四个儿子，取名刘绍选，后更名为刘少奇。刘寿生喜欢教育孩子，对小儿子也不放松，因此决定好好教育培养他。于是在八岁那年，刘少奇开始念书。

列为看官，你们是不是很纳闷，都八岁了才念书，还能叫重视教育？比起今天一两岁上托儿所，三四岁上幼儿园，五六岁上小学，甚至在娘胎里就开始接受教育的骄子们，刘少奇开始念书的时间的确是晚了些。然而在刘少奇那个时代，能接受教育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没有爷爷和爷爷的爸爸那两代人的勤劳积累，父亲再开明也没有用，没经济基础啊！正如现在的中西部贫困地区，许多孩子也不是不想接受教育，不想过早辍学，只是实在没有办法啊！

这就是旧中国。一个农民的孩子如果想接受教育，必须家里有点地，再通过一两代人的勤劳能干，而且运气好（没有旱灾、水灾、兵灾等一系列灾难）才可能积累一点家底，孩子才有机会接受

教育。当年的农民占了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列位看官可以想象当年中国为何任人宰割了吧？一个民族，如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国民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那么说这个民族是病夫似乎也不怎么冤枉。还是那句话，整体的民族素质决定一切。

民强则国强。如果一个政府没办法让国民富强，迟早只有一个结局——完蛋。

这段信息里还隐藏着另外一层含义，那就是土地对当时的中国人的重要性。所以，以后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一起实行土地革命时，蒋介石和他的那帮人很快就灰溜溜地下海逃往台湾去了。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说到底不过是谁给人民多点好处而已。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大饥荒之后毛泽东的威望下跌，而刘少奇的政治资本空前膨胀。因为就农民而言，他们更愿意把地分到自己的手里，而非吃大锅饭。

刘少奇念书虽晚，却不影响以后的人生。起跑线固然重要，而这只是人生的一个点。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比赛，要看爆发力，更要看耐力。何况跟同时代的人相比，能够念书已经不错了。拿到今天，比海归派还要吃香。

刘少奇念的是哪个学校呢？很遗憾，既不是贵族学校也不是公立学校，而是一种叫做“私塾”的玩意。虽然当时已经有了新式的教育机构，但对出身小地主家的刘少奇而言还是太遥远了。所谓的私塾就是乡下富人或老朽吃饱了不饿，找两间空房子收几个学生，然后摇头晃脑，之乎者也一阵子。这种教育能出人才？答曰看似不能，实则能。

有句古话叫：自古豪门出才子，自古寒门出奇才。刘少奇就是这样一个寒门奇才。

（二）奇才是怎样炼成的

刘少奇家虽然有几十亩地，算小地主，但那年头的土地收成不怎么样，所以并不富裕。为了省点学费，他时不时要换学校，基本上是一年一个地方。十一岁那年，换到一个姓洪的家里念书。这洪家有一个特点：世代为官，重视教育，书多——而刘少奇酷爱读书。

那年头科举制度已经没了，没了升学考试的压力，私塾只是几千年以来的惯性延续而已。在私塾里那叫一个乐——爱干嘛干嘛。当别人抓鸟摸鱼的时候，刘少奇却跑去洪家的书房里找书看。虽然那些书不见得有啥用，至少说明一点，这个十一岁的小男孩与众不同，希望过与众不同的生活，愿意干与众不同的事。

翻开名人传记，你会发现，基本上所有的历史名人在少年时代都有那么一段莫名时光：要么狂读书，要么独自发呆，要么就是摆弄新玩意，要么……总之有自己独立的世界和个性，显得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若干年之后，等这些人把自己具有鲜明个性的主观世界和现实世界融合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改变了这个现实世界，成为成功人士，例如科学家、发明家、作家等等，而刘少奇成

了革命家。

这种性格在学校，特别是当今的学校是不允许的。公立教育最大的败笔就是摧毁年轻人的独立人格。从这点看，战乱年代的刘少奇反而很幸运。放在今天，老师肯定要把家长叫过去讨论一番，提出若干条措施。这些措施实施下来，要么把年轻人训成乖宝宝，要么将其逼上叛逆之路。

一九一一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个特殊的年头——中华大地上延续数千年的王朝制度终于走进了坟墓。这个消息如同海啸一样冲刷着每一个人的内心，也冲刷着刘少奇的内心。

刘少奇有三个哥哥，二哥刘云庭参加了湖南新军。湖北新军起义时，湖南新军也响应了一把，就是说刘云庭是个革命军人。第二年回家探亲，刘云庭带了本书回家，刘少奇看了这本书欣喜若狂，立马就要姐姐把自己的辫子剪下来，表示和清朝决裂。幸好清王朝已经完蛋了，不然刘少奇同学这个举动即便不杀头也得充军。原来刘云庭带回来的那本书是介绍辛亥革命的，那本书勾起了年轻的刘少奇对革命的美好向往。

于是乎，刘少奇同学对不怎么富裕的家庭提出了一个要求——去外地上学。经过一番软磨硬泡，刘少奇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如愿进入了一所小学，成为一个小学生。那一年，刘少奇十四岁了，放到现在，中学都快毕业了。一年之后再考入了宁乡县高小，还是小学生。

那年代的学生和现在不一样，因为那年代当官的和现在不一样。现在当官的，最多也就是贪污腐败，侵吞点国家财产，然后到国外去逍遥啥的，弄不好就被送入秦城。那年代的当官的可就不一样了，除了贪污腐败，时不时还干点卖国的营生。高官一卖国，学生就抗议。所以当袁世凯搞点手脚时，学生就抗议了，小学生刘少奇同学也放下书本去抗议。

就这样边抗议边念书，小学毕业时已经十八岁了。

这是一个分水岭，接下来怎么办？在升学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一个小学毕业就已经十八岁的青年，如果没办法另谋高就，那就只好回家接父亲的班了，继续当一个小地主，过紧巴巴的日子。当然历史不会这么安排刘少奇同学的。在这要命的关头，一位姓梅的老师伸出了援手，把待业青年刘少奇推荐进入中学。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学生是软弱的。所以诗人说：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刘少奇深深地体会到了这句古话的含义，百无一用是书生啊，于是就有了当兵的念头。听说湖南陆军讲武堂很出名，在班超投笔从戎、岳飞精忠报国等光荣传统的激励下，刘少奇同学放弃了继续当中学生的机会，通过二哥搞到一张退伍证（当时讲武堂只招收下级军官和退伍军官，相当于给大老粗讲点专业知识），以冒名顶替的方式考入讲武堂。可惜的是，还没来得及学军事，护法战争就爆发了。

战乱发生，学生们只好各回各家。刘少奇也没有办法，只好跑回老家呆着，从军的美梦破灭了。这时候另一个问题来了：一个大龄青年，既不立业也未成家，究竟想干啥？不会是念书念多了，不务正业了吧？好心的父老乡亲们都说，那个谁谁谁啊，毕业了吧？结婚没有啊？老大不小了，可以结婚了吧？要不给你介绍个媳妇？旁边村里那谁谁家的闺女白白胖胖的，长得很俊，和你很般配……等等。特别是老妈，什么我要抱孙子啦、不要再出去闯祸啦……唠叨个没完。当时是也，刘少奇同志的处境堪比当今的大龄剩男、剩女回家过春节。

没办法了，怎么办呢？不能就这样结婚生孩子，继承老爹光荣的种地事业啊！那就想办法吧。办法很简单，做两手准备：一手以自学的方式准备报考外地的大学；另一手是起早贪黑练点武术，强身健体的同时，以备日后闯荡江湖。

不用再等了，因为一九一九年来了。

和一九一一年一样，一九一九年也深刻地写入中国的历史中。这一年的五月四号，一群年轻人再次放下书本跑到街上，高喊打倒卖国贼。不同的是，这次闹得有点大，不仅闹醒了整个京城，还波及全国。日后这一天被看成是中国人觉醒的一个标志，号称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

在爱国运动的影响下，远在长沙考中学毕业证书（报考大学必须有中学毕业证）的刘少奇被感染了。一一年的刘少奇，还是一个莽撞少年。八年之后，刘少奇已经是一个二十一岁的年轻人，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他决定亲自投身到运动中去，便直接去了北京。

到了北京，他看到这样一派景象：满大街都是慷慨激昂的人，大家张大嘴巴宣传各种思想，如同战场上的连天炮火。刘少奇感到很新奇、很兴奋。在这群人中，有一个从天津来的同龄年轻人，叫周恩来，只是他们没有碰到。据说日后两人还为此惋惜了几番。

初到北京的刘少奇比现在的北漂一族还惨，工作没有不说，生活费也紧张，改善一下营养都难，后来兵荒马乱，干脆就没了生活来源。他想进北大，可惜北大的门槛很高，而且学费高得吓人。其它学校吧，要么他看不上学校，要么学校看不上他。后来又想去法国勤工俭学，结果又因为没钱而作罢。

钱啊，呵呵。

刘少奇同学忙活了很久，依然没能改变浮萍一般的命运。当然他也没闲着，按照老习惯，依然是一边读书，一边倾听各种理论——这些东西锻炼了他的思维能力。

日后那位战斗力超强的党内理论家，那位毛泽东思想的发明者，就得益于这段时间的积累和锻炼。每天有不同的人以不同的风格向你灌输不同的理论，想不思考都难。所谓伟大的五四运动，伟大之处就在于启发人们思考。什么打倒卖国贼都是浮云，不能指望书生来搞政治，若干年之后，毛

泽东就犯了这样一个错误（文革用红卫兵来搞政治）。书生只擅长思考、辩论，让他们去搞政治只能搞砸锅。

日后那位游走在白区搞地下工作的中央领导人——刘少奇，就得益于这种漂泊生活中历练出来的生存本领。这种本领是在任何学校、任何大师那里都学不到的，必须在艰苦的环境中领悟。笔者每当看到现在的家长把孩子当皇帝来供养，就想对他们说，如果真为孩子好，就多让孩子历练历练吧！

随后又经历一系列的挫折失败（还是上大学无门，去法国没钱）。为了生活，还去了工厂当临时工。迷茫之中的刘少奇得到一个去苏联的机会。

十月革命之后，苏联对中国年轻人有致命的吸引力。并不是当年的苏联多么富裕强大，实在是苏联实现了工人、农民的大翻身。这对为中国也为自己寻找出路的广大贫寒知识分子来说，无异于天籁之音。对刘少奇而言，反正无处可去了，不能就这么干耗着，浪费青春时光，那就去苏联吧。

路程是这样的：从上海坐船，途径日本长崎，然后抵达海参崴。上海是春天，海参崴还是冬天。差别就像海南岛和东北一样。当时的海参崴还在日本人的手上，而且当时的日本对中国和苏联都不怎么待见。一行人在海参崴必须小心翼翼地行走，大家装作彼此不认识。

离开海参崴之后就是另外一个世界，在这里他们受到红军的接待，免费吃住，如同身在共产主义世界，实际上吃的也就是土豆、黑面包之类的东西。又经过一番折腾，总算坐上了去莫斯科的火车。当时的火车既不用电也不烧煤，而是烧柴火，跑一段就要停下来歇歇，大家下来砍柴当燃料，然后继续跑。据说刘少奇他们也下车砍过柴。

最后终于到达了莫斯科，这一路走了三个月。

在莫斯科，刘少奇同志见到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同志。

在莫斯科，刘少奇成了中国共产党员。

在莫斯科，刘少奇坚定了回国干革命的决心。

再次回到中国的刘少奇，已经不再是那个迷茫无助、大学上不了、出国没有钱的刘少奇了。尽管他依然没有钱，依然上不了大学，但是他找到了自己奋斗的方向，不再迷茫。

人的一生，知识积累和性格培养都非常重要，更为重要的还是找到了奋斗的方向，最为重要的是为了这个方向而脚踏实地去奋斗，百折不回。这一点上，刘少奇是榜样。

此时的刘少奇虽然年纪轻轻，却已经历尽世事艰辛悲凉，并顽强地活了下来，开始为了一个梦想而奋斗。这种人在以后的人生中，可以从容面对风浪，笑对险恶。这种人已经是人杰，精英中的

精英。所谓奇才，也就这意思吧。

自古寒门出奇才，奇就奇在能够应对各种艰险，哪怕最后粉身碎骨都浑然不怕。

（三）文斗时代

刘少奇从苏联回国之后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就业。

有了信念，有了实力，还得有工作是吧？

但那是一个异常动荡的时代，想要安心过日子是不可能的。想要安心过日子的人太多，食物和房子太少。最重要的是，想要得到食物和房子的途径太少。

同时，那也是一个容易叱咤风云的时代。

在那个年代，你只要有理想，敢于为理想奋斗，并且在奋斗的过程中不被消灭掉，好了，你的前途很可能非常光明——青史留名——因为那是乱世。

所有乱世都一样，实现理想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演武，二是为文。像贺龙拿菜刀闹革命，像彭德怀搞平江暴动，像毛泽东搞秋收，都是武斗，并且最终都修成正果。那个时代还有很多文字贩子，写过各个流派的故事，也曾荣华富贵、显赫一时，就不介绍了。

其实还有第三条路，刘少奇走的就是第三条路——文斗。

啥叫文斗呢？按字面解释就是通过文明的方式去争斗。这种斗争方式起源于一种宗教感情，经过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叙述之后形成一种观念，叫——勿以暴力抗恶。这种斗争方式到最后形成斗争形势的是在印度，就是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中国的文斗方式是另外一种，即罢工。当然这不是中国人的发明，欧洲早有罢工斗争的先例。然而中国本身是农业国，大部分是农民。历次激烈的政治变革的主力军都是农民。工人罢工，意味着工业力量的发展，是好事。

刘少奇从苏联回国的时间是一九二二年，当时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不久，还没有多少党员，甚至还没有多少人留意到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小小的组织。但是共产党员对自身工作的定义却是非常清晰的——解放全人类。那么要钱没钱，要枪没枪，如何解放全人类呢？他们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包括陈独秀、毛泽东在内，都没有一个很好的思路。当时他们想到的就是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办事，在国内寻求和孙中山先生合作。

不过有一点很明确，那就是咱是共产党，咱代表广大底层的工人、农民。既然苏联革命是依靠工人成功的，那咱们就效仿吧。于是刘少奇找到了工作的内容——搞工人运动。

所谓罢工，就是暂时不给你干活。啥叫暂时不给你干活呢？就是我还要给你干活，但如果你不改善我的生存条件，我就不给你干活，改善之后才给你干。

刘少奇回国后，一头扎入罢工狂潮之中。粤汉铁路大罢工、安源路矿罢工、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武汉工人……有罢工的地方就有刘少奇，或者说有刘少奇的地方就有罢工。总之，刘少奇和罢工运动绑在了一起。

（四）牛刀初试

在苏联倾听了列宁的教诲之后，年轻的刘少奇回国，在上海遇见了中国共产党的负责人陈独秀。一番客套、高论之后，陈独秀让刘少奇回老家湖南干点事。

在湖南长沙清水塘，刘少奇碰见年长五岁的老乡、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一辈子的领导——毛泽东。此时刘少奇是一个二十四岁外冷内热的青年，而毛泽东二十九岁，正在走向成熟。两个非同凡响的人物就这样在一个平凡的地方碰面了。在以后的岁月里，刘少奇多次对这次会面有美好的回忆。

老乡见老乡，自然有一番亲切交谈。刘少奇对这样一位兄长一样的老乡兼领导表示尊重，毛泽东对这样一位从异乡归来的小老弟表示羡慕——从革命圣地归来，并见过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呵。这层关系成了两人日后政坛联手的原因之一。

刘少奇的第一份工作是啥呢？协助粤汉铁路罢工。具体办法就是协助罢工专家李立三同志鼓动两千多名铁路工人放下手中的活，向资本家提要求，改善待遇。

说起罢工，就不能不提李立三同志。在罢工这一行比刘少奇更牛的人寥寥无几，如果有，那就是李立三了。一九二一年，全中国的共产党员寥寥无几，李立三就是其中之一，比刘少奇入党的时间还要早。从某种意义上讲，刘少奇就是在这位罢工专家的提携下入行的。就是因为李立三同志搞罢工过于积极了，陈独秀同志右倾之后，李立三同志就变成了左倾，刘少奇则后来成了白区的正确代表，这是后话。

在粤汉铁路罢工运动中，刚刚入行的刘少奇表现不错。

因为表现不错，毛泽东让他去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地方——安源路矿。

（五）安源路矿罢工——第一笔政治资本

搞政治也好，做生意也罢，或者其它，都需要第一笔资本，通俗说第一桶金。有了这第一桶金，相当于有了一个平台，是小鸡还是雄鹰将在这个平台上见分晓。刘少奇的第一笔政治资本，来自安源路矿罢工。

安源路矿的地盘更大、工人更多，同时搞罢工的危險更大。

站在资本家的立场来看，所谓罢工其实就是捣乱。本来就把工人当牛马，不爽了就拖几个月工资，扣点奖金啥的都是平常事。现在好了，来了个砸场子的，分明就是捣乱嘛。这些人有钱、有关系、有背景，那年头要收拾一个空有理想的共产党员还只是个动动手指头的事。罢工虽然属于文斗，也有相当的危險性。虽然比战场上的情况要好一点，却也面临着坐牢、挨黑棍的危險。

安源路矿本来是李立三同志的地盘，但是这位老兄活动的时间太长了，且过于显眼，已经成了某些权贵的眼中钉、肉中刺，随时可能被拔掉。为了避免英年早逝，李立三同志只能躲起来，搞遥控指挥，而刘少奇同志属于新人，暂时没有危險，可以负责台面上的工作。

罢工过程大概可以分为三步：前戏→高潮→善后。

所谓前戏，就是工人对资本家说：快把拖欠的工资给发下来，以后还要多发点，因为我没钱吃饭了，没钱吃饭就没力气干活。资本家就说：还是好好干活吧，许多人找活还找不到呢。工人又说，到底给不给；资本家说，不给。工人说，不给，我就罢工；资本家又说，你们敢不工作，我就用警察对付你们，警察不够还有军队，你们玩得起么？工人本来就觉得自己势单力薄玩不起，现在来了共产党人，对他们说只要咱们团结一致，就玩得起，资本家总不能自己去干活不是？总不能让警察和军队去干活不是？还得求咱们干！想让我们干活，就得提高待遇。工人一听，也对噢。

那就罢工，干他娘的！

前戏做足之后就要进入高潮了。

于是，在九月十三号这天夜里——半个世纪后这一天将更有名，罢工命令发出了。后半夜，也就是十四号凌晨，车站、矿井、修理厂等各个生产间一起鸣笛。刺耳的笛声撕裂了夜空，那是工人在怒吼：老子不干了，给老子加工资！

接下来整个路矿一万多工人全部不上班了，四处刷标语、发传单、搞串联啥的。还有模有样地写了一份宣言：我们饿了！我们要吃饭！我们活不下去了！我们是迫不得已才罢工的！并且申明，如有疑问，请与俱乐部代表刘少奇联系。

整个路矿的生产陷入了瘫痪。资本家当然不是吃素的，他们的理由是：老子给你们发工资，你们竟然联合起来对付老子，让你们这些穷鬼看看老子的手段——手段无非是威逼利诱。在威逼利诱之前还有一招，那就是拖。先拖上几天，等工人泄气了再威胁。他们认为，工人不过是一帮没钱的大老粗，要靠微薄的工资养家糊口。等那股劲泄了，再忽悠上班，就好对付。正常情况下，这种策略是对的。现在情况有点不正常，因为那个时代的共产党人是有远大志向的理想青年。

三天之后，也就是九月十六号，路矿当局送信来了，请俱乐部代表到司令部谈判。注意谈判地

点，是司令部。司令部戒备森严，门前架起机关枪，荷枪实弹的士兵在站岗巡逻。为了一个俱乐部谈判代表而这么大阵仗，至于吗？至于，非常至于！这叫下马威。

工人们都为刘少奇担心，就说了，那个刘代表啊，还是别去了，他们会害了你的。刘少奇也不是盖的，趁机慷慨说，不要紧，我刘少奇为大家办事，就是死了也甘心。有种！

二十四岁的刘少奇从容地走进谈判室，从容地坐在戒严司令李鸿程面前，从容地看着这位戒严司令，如同观看演出一样。这心理素质，不是一般人有的啊！

李司令也很配合，挺直腰板，提高嗓门说：“你们俱乐部为何要鼓动工人犯上作乱？”你看这官多么尽职，还没谈呢就把大帽子给扣上了。

刘少奇的反击也很犀利：“你们究竟要谈判，还是搞审判？”然后冷静从容地分析了罢工的原因以及工人的要求。

李司令有点挂不住了，心想老子本是粗人，今天就是来唬人的，你小子倒好，跟我较真起来了。要谈判还用得着老子出马么？不行，接着唬：“如果坚持作乱，就把你就地正法！”也不全是声音，也有拍桌子的动作，这样的表演看起来才形象逼真。

只可惜习惯了酒肉生活的李司令太不了解眼前这位年轻人了。这是他不懂，可能一辈子也弄不懂的一个群体。刘少奇根本就不鸟他：“万余工人如此要求，虽把代表剁成肉泥也不能解决问题！”

李司令讨了个没趣，发狠说：“我对万余工人也有办法制裁，我有万余名军人在这里！”

刘少奇回击：“请你下令制裁！”

这话戳到了李司令的痛楚。李司令的工作根本就不是实施制裁，他的任务只是威逼工人复工，制裁了工人又能怎样？还是没人干活啊！总不能用一万多军人杀掉一万多工人，然后把一万多军人变成工人干活吧？

李司令傻眼了，他没想到眼前这个年轻人如此强悍。这时的工人兄弟们表现也很给力，黑压压一群来到谈判室外面，对着机枪高喊：“谁敢动刘代表半根毫毛，我们就打得路矿两局稀巴烂！”

面对愤怒的人群，路矿两局和戒严司令部的领导都傻眼了，担心乱子闹大了会耽误自己的前途和财路，赶忙让刘代表出来维持一下秩序。刘代表来到走廊上向大家挥挥手，示意大家静一静，耐心等待。愤怒的人群果然安定了下来。那一刻，刘少奇的内心应该是非常有成就感的，那是通往成功路上的淋漓尽致的快感。那一刻，他不再是那个彷徨无助、上不了大学的年轻人，不再是为了生活去工厂找工作的待业青年，他为他的选择而庆幸，同时对自己的信念和梦想更坚定不移了。

安源罢工的结局是工人大获全胜。要求得到满足之后，工人复工。接下来全国罢工运动陷入低

潮期，特别是京汉铁路大罢工，遭到吴佩孚的血腥屠杀。安源路矿在刘少奇的领导下，日子过得还算凑合，刘少奇因此收获了许多赞誉。说通俗点，就是攫取了第一笔政治资本。

因为在安源的成功，刘少奇当选为全国首届总工会执委，此时的刘少奇还不到二十七岁。此时的周恩来正在广州搞战争，此时的毛泽东正在写文章试图批驳陈独秀的右倾思想。要知道那时候的共产党还没有自己的枪杆子，还要依靠工人搞文斗，刘少奇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一个执委的职位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这一切都得拜路矿资本家和李司令所赐，他们用自己的无能成就了刘少奇同志。

说白了，路矿的资本家也就是求财而已，李司令也不过是资本家的臂膀而已。如果真的很牛，那些资本家可以去和外国资本竞争，那个李司令可以走上战场一雪国耻，何需对自己的同胞装逼；说不好听，也就是装得很好的草包而已。纵然掌控社会资源，纵然身居高位，依然是草包，和真正的精英有天渊之别。

正是这种草包资本家和草包军人占据了社会精英的位置，才造成了近代中国那种任人宰割的局面。所谓革命，无非是让这群草包回到草包应有的位置上。唯有让草包回到草包的位置，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才可能得到新生，才可能爆发出惊人的能量。

（六）巅峰时刻——五卅运动

公元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号，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逝世，国人一片悲痛。他死后，留下一个巨大的烂摊子和一片权力真空。各派力量在这个烂摊子里挑挑拣拣，想方设法把自己填到那片权力真空中去，你争我夺。中国革命将何去何从？大家都在捣鼓。

几十天之后，也就是五月三十号这天，上海工人再次不上班了，学生再次不上课了，大家再次跑到街头喊口号、刷标语，说日本鬼子、英国佬滚出中国去，万恶的资本家不要再欺负弱势老百姓等等。接下来的情节和电影一样，巡捕房朝手无寸铁的国人开枪，国人伤亡惨重。然后国人反击，组织更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并且席卷全国。

从这一天开始，到二七年国共第一次分裂，前后三年时间在历史上称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大革命开始的标志就是五卅运动，结束的标志则是蒋介石和汪精卫清党。然后是国共内战，十年之后国共再合作，合作八年再内战，到今天我们期待着国共第三次合作。国共两次合作都取得令人惊喜的成果。第一次合作掀起了大革命的高潮，打倒了不少军阀，奠定了统一的基础。第二次合作，国共两党一起赶走了日本鬼子，拯救民族于水火。我们期望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到来，解决台湾问题，早日实现祖国统一。据说两蒋时代曾经策划过国共第三次合作，可惜没有结果。

这个运动的起因也很简单，就是日本人的工厂剥削中国劳工太厉害，中国人不堪忍受，找日本

鬼子理论，结果很多人被日本鬼子殴打，有人被殴打致死，有人被枪毙。共产党人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展示实力，开始领导罢工运动。

这场规模空前浩大的人民（工人、学生、小资产者）运动的领导者有好几个，比方说陈独秀，共产党老大；比方说瞿秋白，地位很高；比方说李立三，地位很高，干了很多活。这些人属于领导，后面再介绍。

另外一个就是刘少奇了。他不是最高领导，也不是最核心的那几个，定位是实干家。

刘少奇从青岛返回上海时已经六月一号，大规模的罢课、罢工、罢市已经开始。他的工作是总务主任，相当于后来的秘书长，就是听领导的指示，全面主持工会的日常工作。这是一种极大的考验，这种工作说白了就是苦活累活，不是仅有才华就能搞定的，同时需要相当大的耐心去摆弄数不清的琐事，需要相当多的心思和各种人士沟通、周旋。领导一个指示，足够忙活两天，还没忙完，又来一个指示，怎么办？干呗。

何况有些坎并不是通过努力工作就能迈过去的。

罢工最核心的部分是啥？一个字，钱。所谓罢工就是要求提高工资，提高待遇，并申明以后不能再欺负咱们的弟兄——这是问资本家要钱。在这个前提下首先得自己有钱。你不让工人去上班，那工人吃啥？人少也就算了，向别人借点啥的，挺一挺就过去了。在五卅运动中，工人二十多万，罢工几十天，生活费怎么办？放到现在不是啥大问题，中央说句话，财政部给点钱就算了。那时的中共中央有啥？除了理想和信念，基本上空无一物，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笔钱。理想信念这东西，属于远水，缺钱属于近火，远水永远也救不了近火。

没钱保证工人的基本生活，那就要失败。好在中国北方有一位爱国人士——好汉冯玉祥。他在孙中山的号召下，推翻直系军政府，把傅仪再次赶出故宫，归顺国民革命军，并且把故宫向老百姓开放。此时正值国共合作期间，冯玉祥就把故宫收取的门票钱通过共产党发放给工人，争取斗争的胜利。

刘少奇等人通过一系列方式把钱发放到工人手中。不要以为分钱很容易，那绝对是一种考验，弄不好钱分下去了还要惹起内斗。好在这些难不倒刘少奇，他用自己的才华解决了这个问题。对他那个级别的精英来说，有办法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苦一点累一点也就算了，还很危险。

上海滩是啥地方啊？那叫鱼龙混杂，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看那些旧上海电影，砍砍杀杀的场面屡见不鲜。其实那些都是一些黑帮小故事，小场面。如果场面能闹大一点，那就不叫黑帮了，叫军阀。和规模几十万人的工人运动相比，黑帮啥都不算，黑帮也就是一点小利益，牵扯到老外就

耸了。罢工可是直接跟大财阀、洋人干呐——这些人才是黑帮的后台老板。

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滩，洋人才是老大。洋人可以动用巡捕。巡捕搞不定，可以收买黑帮瘪三，用下三滥手段。

这种罢工，可以说牵扯到了上海各个方面的利益，也牵扯到各种各样的人。不同的人对付你的手段也不一样。那种不要脸的文人会为了主子的利益扯嗓子骂你。这种人并不可怕，当是疯狗乱吠就行了。真正可怕的是那种瘪三，他们不管什么理想信念、民族大义之类的空头货，谁给他们足够的好处让他们爽，他们就会拿起棍棒为谁卖命。

对付工会那群喊口号的秀才，瘪三是最好的选择。再坚定的理性信念当不了防弹衣穿。

八月二十二号晚，一大群流氓瘪三在吃饱喝足之后，手持刀棍冲入工会总部，见人就砍，见东西就砸，跟香港电影里的镜头差不多。恰好此时李立三和刘少奇都在免费加班。如果被这群人渣抓住，就算不被乱棍打死，在床上躺一段时间也是必须的。好在两人已经历经足够风浪，面对这种情况临危不乱，暂时抛弃革命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充分运用地下工作的技术手段——趁乱溜了，且毫发无损。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秀才遇到瘪三呢？只有撒腿跑了。

两人逃出生天之后，和普通人一样去报警，说俺们被侵犯了。和普通人不一样的是，他们并没被吓倒，报警之后还发布公告揭露某些人的暴行，体现出共产党人超强的战斗力。

然而流氓瘪三不过是前哨而已，在他们出手了之后，当局就要出手了。当局要强行查封工商联联合会和一些行业工会，这些都是总工会的外围屏障，扫除这些屏障，就要对总工会动手了。局势越来越恶劣。和安源时代一样，李立三又不便公开活动了，担子再次落到刘少奇身上。

毕竟当局是财阀供养的，还得看洋人的脸色。工人不干活了，资本家往哪赚钱？洋人往哪赚钱？所以当局准备动手。当当局准备动手的时候，意味着资本家开始架不住了。

管你日本人、英国人还是中国的财阀，大家出来混都是要赚钱的，没有劳工，毛都赚不到一分，闹到最后大家都不好过。日本工厂最先同意工人的要求，刘少奇就先组织日企的工人复工。接着是华商工厂复工。英商最顽固，就耗着。

当然，当局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军阀。两年前直系军阀吴佩孚血腥镇压京汉铁路罢工的事还历历在目啊。后来的工运领袖中，瞿秋白、蔡和森、向忠发、邓群、王荷波等人均死在军阀的手上。此时奉系军阀的北京政府向上海秘密通电，决定镇压。九月十八号傍晚，上海军警强行封闭上海总工会，逮捕有关工作人员，并通缉李立三、刘少奇等人。

现在问题来了，既然镇压，为何不在开始时镇压？等到结尾时来这一手是何用意？其实很简单。

开始时镇压，势必造成大规模的流血动乱，那么开工可能就遥遥无期，资本家赚钱也就遥遥无期。等到结尾时，资本家这么做，不过是向工人表态：看吧，穷鬼们，咱们有的是实力；下不为例啊，不然决不轻饶。

面对军阀的枪弹，刘少奇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先躲起来一面写文章揭露某某人的罪行，一方面做各种善后工作。这么一系列折腾下来，刘少奇病倒了，当然又收获了一箩筐的赞誉。这些荣誉成了他日后荣升的政治资本。

五卅运动成了一股风暴，席卷全国。这次运动的领导获得了一大笔政治资本。陈独秀之后，瞿秋白主持中央政治局。后来瞿秋白当共产国际代表，李立三火了一把，都是文斗捞取的政治资本。

对刘少奇而言，真正的收获还是主持总工会日常工作的这段经历。在这里，他接触到黑帮，接触到便衣特务，接触到五花八门的权利机构，接触到各种各样的龙和形形色色的鱼。更为重要的是提高了组织水平。日后在白区，也就是一面和鱼龙们打交道，一面组织群众而已，同时再次磨练了他的理论水平，非常可贵。日后主持党内的日常事务，干的也是这些事。

五卅运动，刘少奇开始走向成熟。

之后是武汉大罢工，又是惨案，又是占领武汉营租，一路下来，轰轰烈烈。

随着罢工次数的增加，刘少奇的地位也在上升。短短几年间，从工人俱乐部主任、到全国工会副主任、到中央委员，上升速度没有火箭快也不次于飞机吧？若不是在那个特殊年代，这样的升级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不熬到你头发白一半就别想进中央，而当时的刘少奇还没到而立之年。放到现在，非被人视为拉关系、走后门（这么大的后门好像还没有）不可。

如果这么一路干下去，刘少奇的前途还是非常光明的。然而文斗很快走到尽头，转入历史的死胡同。原本国共合作，大革命搞得轰轰烈烈，文斗是非常好的一条路。但是——问题出现了转折。

就像好剧本，情节充满曲折才有吸引力。刘少奇的一生也充满曲折。造就这种奇特现象的，正是中国的另一个大人物——蒋介石先生。

（七）刘少奇和蒋介石

两人的关系非常奇特。

粗略翻一下蒋介石和刘少奇的生平经历，结论很明显——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因为受长期以来的宣传影响，很多人心中的蒋介石的形象是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样样在行，在上海滩混黑白两道，搞证券，活脱脱一个集流氓、混混、小偷、无赖、文痞、军阀之大成者。而刘少奇从小热爱读书，勤学奋进，有理想且热爱祖国，绝对的五好青年，是蒋介石的反面镜子。从某个角度上看确实是这

样的。

但如果仔细对比一下，会发现两个人有很多的共同点。

蒋介石念过私塾，刘少奇也念过私塾。所谓私塾，就是接受传统教育，读点四书五经啥的。

少年时代的蒋介石很不安分，听说维新运动就激动得睡不着觉；刘少奇听见辛亥革命，立刻就要剪辫子。

蒋介石想上军校当军人，就去东北报考振武学校；刘少奇同样投笔从戎，去了湖南讲武堂。

按军校实力，云南讲武堂还要好一点。只是振武学校有个优点，可以去日本留学，就像今天的某些大学互派交换生（当然，当年的日本学生不会跑来中国学军事）。这一点差别就区分开了两人日后的人生轨迹：蒋介石凭借振武学校第二次去日本学军事；刘少奇的讲武堂在护法运动中成了炮灰，因为后来一系列的阴差阳错而去了苏联。

蒋介石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刘少奇在苏联加入共产党。

蒋介石回国之后，跟着陈其美等人参与领导一次又一次的革命起义；刘少奇回国之后，跟着李立三等人参与领导一次又一次的罢工。

在一次又一次的革命起义中，蒋介石结识了各种人物，干了很多事；在一次又一次的罢工中，刘少奇同样结识了各种人物，干了很多事。

羽翼丰满之后的蒋介石，以军人的身份玩政治，周旋于列强之间，把各个派系玩弄于股掌之中。刘少奇进入中共的核心领导层之后，就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家，一个在战争年代基本上与军事无缘的政治家。两人终于进入两种不同的人生轨迹。

蒋介石比刘少奇年长十一岁，活动范围几乎没有交集，且在不同的党派中从事不同的业务。按道理说，应该不会牵扯到一起。然而历史老人是一个神秘的编剧，写剧本时往往出人意料，偏偏把他们写在了一起。没有交集的两个人却因为不同的信仰而不共戴天。这样的关系，也只有在最残酷的年代才有。

要理清蒋介石和刘少奇的关系，必须从孙中山说起。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一生都很困惑。他几乎用了整整一辈子的光阴去推翻清王朝。后来终于成功了，却发现中国陷入四分五裂的军阀混战的局面。原来在清王朝时代，中国也是饱受列强的欺凌，好歹还有一个中央政府。现在好了，中央政府没了，国家分裂了，更加饱受列强的欺凌。孙中山很不安。如果中国因为他的革命而陷入长时间的分裂，像三国或者五代十国那样，他是不能容忍的。他也想把祖国再次统一，一会东征一会北伐，忙活了半天没啥效果。所以孙中山很困惑一

—难道这辈子白干了？不行，一定要建立一个以民为本的国家。

于是在一九二四年之际，生命垂危的孙中山干了两件影响日后局势的大事，一是决定创办黄埔军校，二是和共产党合作。

有了黄埔军校，才有了日后的蒋介石，才有了日后国民党的正面抗战。要不然国民党指望汪精卫在武汉折腾，那是没啥希望的。汪精卫的相貌、口才、文采那都没话说，只是那骨气，呵呵，实在是千古少有。他应该做一个太平才子，玩政治是一种悲哀。

俄国革命对孙中山的触动很大。眼看人家列宁比自己还年轻几岁，也是推翻封建王朝，事业比自己还晚成功几年。人家成功之后很快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政权，自己这边还是一盘散沙，觉得应该从对方那里取点经。共产党成立之后，把中国的工人运动搞得也是有声有色。于是孙中山决定向共产党敞开宽广的胸怀

对共产党而言，更是求之不得。那时候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任何搞革命的都需要这面旗帜。有了这面旗帜，对自身的发展极为有利，于是早期的领导人都有双重党籍——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既是共产党也是国民党。合作之后，共产党人更是如鱼得水，迅猛发展，又是工运又是北伐，那是相当的活跃。

国共虽然合作，本质上却是不同。

国民党主张革命靠上层人物来完成，基本策略有两个，一个是联络各派有实力的人，即军阀，说咱们都是中国人，搞团结吧，再按照各自的实力分权利，有肉大家吃，有权大家掌，然后再看看最后谁把谁踢出去；第二个是富人路线，就是让富人出钱，拿这些钱来买装备什么的，然后保证这些人的利益。孙中山先生几十年来都是这么干的，虽然目标没有达到，却也结束了封建王朝制度。

共产党完全是另外一套。他们就是要搞一个严密的组织，发动底层人物造反，然后重新组建这个国家（当时尚不明确）。所以天天操纵工人去跟资本家斗。由于人多势众且组织严密，战斗力那是相当的强悍。这帮人看起来既不贪财也不好色，好像也不怕死，和传说中的死士差不多，但是比那些死士要灵活得多——这种人相当可怕。

同样是革命，国民党想要自上而下，共产党却是自下而上。孙中山在世，凭借自身的威望尚能把这两个矛盾的冤家统一到革命的旗帜之下。孙中山不在，基本上没人罩得住了，分裂不可避免，腥风血雨的日子早晚要来。

孙中山之后，国民党的大佬们非常清楚地看见，大革命虽然搞得轰轰烈烈，利益却被共产党得去了。为啥这么说呢？从整体来看，共产党领导工人搞运动，有声有色。斗争对象是谁？资本家啊！资本家恰恰是国民党的后台。共产党闹得凶，相当于拆国民党的后台。所以国民党人不干了，尤其

是对外畏惧、对内强硬的蒋介石同志。

一九二七年是蒋介石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年头。这一年他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清党。所谓清党，就是告诉那些在国民党里的共产党员，要么宣布脱离共产党，要么接受死亡。比方说周佛海同志，中共一大的几个代表之一，元老中的元老，去国民党那边混了。若干年之后，此公又跟随国民党元老汪精卫跟日本人混了。如果还是共产党，对不起，那就杀掉。当然这不是贴告示的，而是先出动军警捕杀一部分共产党人来做宣传的。

应该说蒋介石的举动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党外的资本家，党内右派，均欢迎蒋介石这个行动。比方说桂系的白崇禧——号称小诸葛，一直对蒋介石不怎么看上眼，这次行动却愿意听从蒋的调遣；比方说武汉的汪精卫，可以说是蒋的死敌，却也响应蒋介石在武汉清党。

这次行动，蒋介石收获颇多，从江浙财阀那里赢得无数的赞助费用，而且成了右派的旗帜，并且压过了左派。接下来在“宁汉合流”中，以退为进搞一次下野，再走向前台，一系列漂亮的转身动作之后成了核心人物，搞定！

蒋介石这么一番折腾下来，对共产党的影响挺大。党员哗啦一下子从六万人变成一万人。一部分被杀掉了，小部分跟着国民党混了，很大一部分为了人头脱党了（有的后来再次入党），剩下的万把人都是战斗力超强的主，他们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昂起脑袋继续战斗了。

对共产党人而言，文斗行不通了，那就改行——武斗。在武斗这一行里，涌现出无数的英雄豪杰，后来的十大元帅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本来走在文斗的康庄大道上的刘少奇迎来了命运的转折——一下子从一片光明的文斗世界转入一个陌生的世界，一个属于彭德怀、林彪们的世界。对刘少奇同志而言，虽然在讲武堂呆过几天，却没有接触过军事，武斗并不是他的特长，隔行如隔山呐。在这点上，他和湖南老乡毛泽东就差远了，没有办法无师自通，只能重新摸索了。

可以这么说，蒋介石改变了刘少奇的工作方向。是蒋介石的铁血和残酷，把搞工运颇为顺利的刘少奇推入一个恐怖、陌生的世界。刘少奇当然不会屈服，他也无路可退。要么反击，要么死亡，要么向周佛海前辈学习。但那是死路一条，后来的张国焘的经历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那么如何反击呢？实事求是讲，直到解放战争之前，刘少奇和蒋介石都不在一个档次上，连过招的机会都没有。更像猫和老鼠的关系：蒋介石扮演猫的角色，恨不得立刻吃掉刘少奇等人。刘少奇则如老鼠一样东躲西藏，利用智慧与之周旋，没有办法给蒋介石以致命的打击。

等到十七年之后，国共第二次合作结束之后，刘少奇才有机会真正给蒋介石致命打击，但那是后话。现在的刘少奇要做的是保命和工作，要躲避蒋介石的伤害。

本着为革命发光发热的需要，久经考验的刘少奇同志硬是给自己找到一个新的工作方向——白区地下工作，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地下党——这是一种高危行业。

从事这项工作活下来的概率不高，死去的人不少。然而刘少奇凭借自身的实力和运气硬是在这个高危岗位上干出了一番成绩。正是通过白区工作，刘少奇终于和那个湖南老乡搭上了关系，一跃而起。两人默契配合，主导政坛数十年。

（八）白区时代的隐患

白区时代，更为艰难。

文斗那些年，生存环境还是比较宽松的，只需要应对一些地方恶势力，同时和老外较量时注意拿捏分寸就行。因此可以跟刘少奇比成绩的还有不少。现在好了，跟国民党干上了。出于反共需要，国民党再次组合成一个统一的政府。随后张学良在东北搞易帜，天下基本上是国民党的了。站在国民党的对立面，过着东躲西藏、朝不保夕的日子，那是相当的难过。

许多优秀的人物都没能熬过去，比方说瞿秋白，比方说恽代英，比方说邓中夏，他们搞罢工并不比刘少奇差，都是精英，第一流的人物，依然没有熬过去。还有刘少奇的结发妻子何葆真也死于白区，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也一样。白区之路固然艰险，刘少奇依然无怨无悔。

在艰苦卓绝的白区道路上，刘少奇如同百变观音一样转变着身份，工人、农民、商人、乃至官僚，根据需要不停地更替。不论怎么变，有一项工作是不变的，那就是写文章、搞组织。从东北到上海，再到华北，搞了一路的组织建设，针对不同情况，以不同身份写了一系列文章，和一系列人物进行论战，取得了不少成绩，党内名气越来越响亮。鉴于瞿秋白和李立三的失败，刘少奇渐渐在白区内部形成一个核心。

在这段时间里，刘少奇通过无数考验，干了很多事，为日后成为白区路线的正确代表奠定基础。这些都是政治资本，在这些资本中有两件事成了隐患，恰好是这两件事影响到后来的局势发展。

第一个隐患——奉天被捕。

刘少奇一生有两次被捕，第一次在湖南长沙。

五卅运动之后，刘少奇回长沙休养，湖南军阀赵恒锡同志得到了这个消息，就把刘少奇抓了，并打算按照军法处理。此前他已经军法处理了工运领导黄静原。哈哈，抓到一条大鱼。赵恒锡没想到的是，他抓到的不是一条大鱼，而是一只刺猬。

赵省长还没来得及高兴，办公桌就被来自全国的抗议信给淹没了。全国总工会的，上海总工会的，广州总工会的，还有国民党要人的。在国共合作愉快的大背景下，汪精卫发电报要赵省长放人。

成为汉奸之前，汪精卫在国民党啥地位，大家想必都知道，蒋介石都要礼让三分。在这种大环境下，省长下面的那些马仔（什么局长、师长的）也纷纷表态：老大，这次就算了吧，这人还是别杀了，不好惹。

赵恒锡弄得左右为难，没办法，只好把刘少奇给放了，只是为了脸面，限他五天之内滚蛋，离开湖南。还派人赠送《四书》一册，用意大概是提醒刘少奇安分点。只能说这个赵恒锡不太走运，偷鸡不成蚀把米。

俗语说，这叫命。

须知二五年那会，国共正打得火热，国民党还要申请加入共产国际呢！如果晚两年抓住刘少奇，也许赵恒锡同志就辉煌腾达了。

刘少奇第二次被捕是四年后，在东北。一九二九年正是白色恐怖最为严重的时候。刘少奇奉命到东北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满洲省，即东北三省。东北三省的省委书记，听起来很拉风，实际很虚弱。当时在东北，日本人、苏联人、国民党、原东北土匪交织在一起，混乱程度堪与上海滩相媲美——而共产党也要去插一脚。

在刘少奇之前，共产党在东北搞了三届省委机关。很遗憾，这些领导班子中的很多人成了革命烈士，现在是一盘散沙。刘书记孤身一人来到东北，要钱没钱、要枪没枪，连个正儿八经的住房都没有，还要时刻准备搬家，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当时是也，贵为中共东北三省的一把手，生活质量还不如当今东北的一个镇委书记。

然而闹革命可不是享受生活，虽然衣食住行不怎么好，刘书记的工作能力可不是盖的，很快就恢复了东北的地下党组织。然后干起了本行——组织工人闹罢工，扩大影响。

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刘书记这次马失前蹄了。当时分管奉天市工作的省委常委孟坚向刘少奇报告：奉天纱厂正在酝酿罢工。刘少奇决定参加纱厂支部会议，进一步了解情况，以便指导罢工。

八月二十二号下午，化身为工人的刘少奇和化身为教书先生的孟坚来到纱厂边上的小树林里，准备和纱厂党支部书记常宝玉碰头。但他们不知道，此前已有工人党员叛变，向厂方告了密，常宝玉已被捕。

接下来刘少奇和孟坚也被捕了，二人在监狱里呆到九月中旬。这段时间究竟发生了啥呢？按照现在的正史记载，刘少奇和孟坚串通口供，在常宝玉翻供的情况下，蒙混过关。之前可不是这样的，在高岗得势那会，毛泽东曾经让高岗查过那段往事，高岗让张秀山去办。

高岗死后十二年，文革起。刘少奇被打倒。最后给刘少奇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当然

现在已经翻案了。但是要说案子完全捏造，似乎也不见得——尽管当时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要拿下刘少奇，尽管中央文革嚣张一时，因为其中有疑点。

周恩来任刘少奇专案组组长。案子是在毛泽东高度关注的情况下进行的。就算周恩来没有力量保住刘少奇，也不至于和中央文革那帮人一起捏造这么大的一个冤案。像周恩来和毛泽东这种人，都是非常重视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当时的刘少奇已经没有还手之力，找借口定罪还没有么？以他们那么精明的人，何必编织这样一个弥天大谎把自己推到极为不利的位置上？

话又说回来，如果刘少奇真的像文革定案时写的那样不堪，那么像毛泽东和周恩来（特科就是周恩来亲手创建和领导的）如此强人，还能容忍刘少奇隐藏如此久远？也说不过去。

个人认为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刘少奇在狱中为了自保应该说过不少“脏话”。所谓脏话就是共产党是土匪、败类、垃圾之类，我和你们一样痛恨共匪，和共匪有不共戴天之仇之类的言不由衷的话。毕竟常宝玉已经暴露，不是靠装傻就能糊弄过去的，很可能写过一些黑材料之类的东西。那些话、那些材料很可能存了档。日后高岗和中央文革寻找材料时，很可能看过这些档案。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是以这些档案为基础，顺水推舟同意定案。

这些都是猜测，但可以把另一件事做为佐证。佐证就是刘少奇在东北留下的第二个隐患：61人案。

说61人案之前多说两句。当年在东北逮捕刘少奇的是张学良的人。张学良刚刚易帜归顺南京，想要好好表现，最好的办法就是抓共产党。刘少奇在狱中几十天，中共又建立了满洲临时省委，以备刘少奇牺牲后转正。刘少奇出狱后临委取消。临时省委书记正是后来的死敌饶漱石。饶漱石和刘少奇不对头正是从那时开始的。

三六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夜，刘少奇奉命主持北方局。在那里，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向他汇报说，草岚子监狱里关了六十多位同志，因为要履行一个出狱手续给卡了。

这些都是内战时代左倾路线的牺牲品，都是中共高层干部，什么地下省委书记、地下市委书记、地下军委书记啥的，反正都是有名无实的高官，被关进了监狱。但是这些人日后都大名鼎鼎，比如说薄一波，比如说安子文。当年高岗同志想要拱下刘少奇的时候，就采取“批薄射刘”和“讨安伐刘”这两招。薄，即薄一波；安，就是安子文。

当时北方局遭到多次破坏，他这个负责人下面人手奇缺，就想办法把这帮人弄出来。但是监狱那边也够缺德的，说出狱也可以，出狱之前要写一个反共启事。内容大概就是悔过书之类的，说本人被骗了，被共产党骗了，以后跟共产党不共戴天之类的。

拿我们现在的观点看，这个太简单了，写就写呗，不就是点违心的话么？写了出去再说。出去

了继续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有啥不可以的？别说，还真就不可以！因为当年共产党人对节操之类的看得非常重，而且组织上的处理非常重。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一个贞洁的女人愿意为了自己的贞洁干任何事，哪怕是坐牢；对节操看得很重的共产党员愿意为了自己的节操干任何事，包括坐牢。女人没了贞操，也就是受点丈夫冷眼（不太开明的丈夫啊）；共产党员失了节操，那是要受组织惩罚的。

为了这个反共启事，有部分人已经把牢坐够了，因为操守这一关不知道如何解决，只有继续坐下去。从国民党那边来说，即使把牢坐够了，也必须写反共启事——就像恶汉抓住小女生，说必须把贞操献出来才能放你走。看来双方都把操守这个问题看得很重啊！后来国民党的汪精卫投日，蒋介石三番几次派人去暗杀，以此收买人心。军统特务们向来臭名昭著，但在暗杀汉奸这一项是赢得广泛支持的。失身事大啊！

敌人的监狱里组织管得到么？能。

共产党的组织可以把触角延伸到蒋介石的司令部，何况一个小小的监狱。监狱里是这样情况。有一个负责人，负责开介绍信，说今天某某同志要出狱了，希望外面的同志做好接应工作。就表示这个同志没有变节。如果没有这个介绍信，就难说了，要仔细审查。当年在草岚子监狱里负责开介绍信的同志叫刘格平。

从原则性来说，刘格平绝对是忠实的共产党员。宁愿不出来也不愿意说共产党半个不字。一直耗到四四年，抗战差不多结束了才出狱。就这样，为了节操白白错失了八年抗战打鬼子的机会。他可以证明出狱的哪些人在出狱过程是履行了“手续”的。文革期间，康生等人正是利用组织性超强的刘格平找到“材料”的，这也是后话。

当时刘少奇想把这些弄出来，就绕不开操守这个问题，尽管他是中共华北局老大。换成别的问题，他就能解决了，涉及到操守，没办法，只能向组织汇报了。

当时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的是张闻天，听到这个事之后表示同意。得到批复后，刘少奇就把这事交给柯庆施去办。然后这些人履行那个手续（写反共启事之类）就出狱了。这些人都是精英，活动能量非常大。想当年白色恐怖的年代，他们都可以响应左倾号召跟敌人拼命。现如今国共再次合作，那简直是如鱼得水；出狱之后安子文留在华北搞组织工作；薄一波等人赴陕西和阎锡山一起搞统战工作，成绩喜人。建国之后，这批人有的成为政府的高层官员，多半成了省部级大员。文革开始，这些人又成了那狂欢盛宴上的下酒菜，变成了叛徒集团，直到七八年才得以平反。

反而是刘格平一直在狱中守节，不能不佩服他的原则与傲骨，同时也是浪费大好时光。在这段时间里，鬼子在占我领土，杀我同胞。如果不是国共两党为了各自的利益明争暗斗，刘格平这种不要命的角色当是鬼子不愿面对的那一类。悲乎！

现在看来，刘少奇这事干得对。然而在斗争年代，这是一个破绽，一个巨大的破绽。这个破绽伤害了安子文、薄一波等人，也伤害了刘少奇自己。

再次审视事情的过程，发现刘少奇处事的手腕非常灵活。再从这件事反过来看奉天被捕，刘少奇在狱中很可能说过或者干过一点违心的事，也就是说落下了把柄。在中央文革那帮整人专家的眼里，只需要一点点证据，就能整出足够的材料送人去另外一个世界免费旅游——当然，是单程票。

现在回过头来看白区时代的刘少奇，写了很多文章，干了很多事。在刘少奇拼命干活积累威望的同时，那些能和他匹敌的工运牛人都在干傻事，或者说倒了霉。

说起中共的早期领袖，当首推李大钊和陈独秀。李大钊英年早亡。文斗结束，陈独秀的政治生命结束，也靠边站了。李大钊和陈独秀是那种思想比较激进的学者，干不了政党领袖的活。相比之下，胡适的选择还要好一点。

接下来就是瞿秋白了。从他的遗书《多余的话》来看，他连激进学者都不算，最多就是个文人。文人就文人了，居然成了共产党领袖，领导搞工运，真是难为他了。仔细观察瞿秋白，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莫名其妙。莫名其妙地成了共产党领袖，莫名其妙地下岗，莫名其妙地死掉。然而他是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即使在生死关头，依然经得起考验。

罢工最牛的人当属李立三。他应该是罢工中的大哥大。因为工人运动的崛起而崛起，又因为工人运动过于剧烈而跌落。前面已经说过他。在安源路矿时代，国共还没有合作，他就已经是最高领导，躲在后面遥控指挥了。这一次也一样。此时的李立三已经是中央委员。但他依然活跃于第一线，东游西说、上下串联，战斗力超强。他说：“我们中国工人受尽了日本老板的压迫和虐待，现在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罢工这条路。我们这次罢工，一定要同日本老板拼个你死我活。只要大家团结一心，坚持斗争，就一定能使日本老板屈服于我们工人。”这话说得相当有鼓动性。正是这股子劲，造成日后那种不要命的斗争策略。

就李立三而言，套用一句古话：成也罢工，败也罢工。

向忠发是另外一个典型。李立三红得发紫那会，他是中共一把手。他之所以成为一把手，也是因为罢工。毛泽东之前的中共一把手都是学者或知识分子，比如说陈独秀，比如说博古。只有这个向忠发是工人。从向忠发成为一把手之后的表现，以及被捕叛变（存疑）的经过来看，他显然不合格。这点后面再仔细分析。

邓中夏、蔡和森、邓培、王荷波这几个人也是工运时代的领袖，是比较纯粹的理想主义者，拥有各自的传奇。比如说邓中夏，是资格最老的共产党员之一，曾经参与创办上海大学，其中一个学生叫康生。蔡和森和向警予的故事是那样地感人、那样地绚丽，今天读起来依然让人神往。和向忠发一样，中国土生土长的工运领袖邓培和王荷波，也和向忠发一样没熬出头：邓培死在广州，王荷

波死在北京。不过他们的死是烈士的死，没有向忠发的背叛行为。

看看这些早期的工运领袖，可以说死亡概率非常的高，不亚于战场上的死亡率。刘少奇本人也是九死一生。虽然他修成正果，依然是结局悲惨。结局悲惨，就源于白区时代留下的祸根。这个祸根当然不是指奉天被捕或者 61 人案。这些只是一个破绽，一个表面现象。毛泽东也被捕过，从没有人敢追究。刘少奇的惨淡结局有更深的原因，这里要说一说。

这个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凭借长时间的艰难处境，结合自己的才华和修养，领悟出来的组织能力和思维方式。这种组织才华和思维方式表现在后来的建国治国方略上，就是所谓的治本主义路线。为啥这么说？很简单，刘少奇长时间和国统区的人打交道，和国统区的官僚机构打交道，潜移默化之中吸收、学习了这些人的特征，知识结构乃至思考方式和这些人的差别并不远。国统区也有很多精英，组织能力、统战能力一流，刘少奇和他们周旋时不可能不受他们的影响。

这种经历不是苏区将领诸如彭德怀、林彪、高岗能体会到的。所以他们认为刘少奇官僚、修正主义，要打倒。

最后真正通过白区考验的工运领袖只有刘少奇一个。他要不代表白区，那谁代表白区？还有项英，他也挂了。只有周恩来了。以周恩来在军队、特科的实力，加上国际派支持，再来个白区党代表，那也太强悍了。刘少奇成为白区正确代表，除了自身情况之外，还有一个人必须要说，那就是毛泽东。没有毛泽东的首肯，刘少奇无论如何当不了白区正确代表。

（九）刘少奇和毛泽东

在安源大罢工期间，刘少奇第一次见到毛泽东，那还是文斗刚起步的时候。在随后的工人运动中，刘少奇远比老乡毛泽东活跃。五年光阴转瞬即逝，进入武斗时代。

武斗是朱德、贺龙、彭德怀、林彪等人的天下。一次又一次的暴动，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一次又一次的轰轰烈烈，却没有刘少奇啥事。按照正统的说法，这些年刘少奇同志到了国统区发动群众，做了很大贡献。

武斗之后，毛刘二人再次相见是在遵义会议上，和所有后来得到毛泽东认可和嘉奖的同志一样，刘少奇在会议上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随后就是一系列代表，执行了一系列政策，如此这般，唯独没有指挥过战争。在新四军干了一阵子，仍然没有指挥过战争，还和陈毅搞僵了。提拔一个饶漱石吧，最后和高岗一道反水。唯一的收获便是结识粟裕了。

如果光看形势，武斗以来，刘少奇确实没干多少值得大书特书的事。虽然勤勤恳恳地工作，为党为国为理想日夜操劳，却并不具备决定性的影响力。这也没啥，毕竟在战争年代，风光属于林彪、彭德怀他们。

但是正是在战争年代，刘少奇越过那些赫赫有名的战将，甚至越过红军总司令朱德，越过一直活跃于中共最高层的周恩来，直接成为党内第二号人物。有点奇怪是吧？

这个奇怪的表象，有三个内里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一本书，叫《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写于一九三九年。书的内容并不高深，主要就是讲共产党员要怎样怎样、为啥要当一个共产党员、以及怎样当好一个共产党员。从党员的行为规范一直讲到党性，性质等同于中国共产党的《礼记》。

有了这本书，中国共产党人就有了自己的伦理道德观：同志之间如何相处，如何对待领导，心里都有一个谱。即使在日后的历次运动中受到伤害的同志，也可以从这本书中吸取能量。

这本书刚刚发表时引起一定反响，但说很大反响也不客观。毕竟那时候大家都在前线拿着枪一边跟鬼子拼命一边提防蒋委员长，过着东躲西藏、朝不保夕的日子，哪有空学习这个啊？但是这本书的重要性堪比任何一场战役。一场战役的输赢，影响是暂时的。这本书却是从根本上区别了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这本书之前，共产党人也就是一个泛泛的理念，为了崇高理想跟敌人拼命，不怕断头流血之类的。这本书制定了党员的行为规范，属于纲领性的文件。这也正是毛泽东看重刘少奇的原因。

从延安整风运动之后，这本书的影响越来越大，成了共产党人的教材。

第二个原因来自一项发明——毛泽东思想。

这个发明的伟大意义无须累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出现，标准着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切实可行的思想体系，不用凡事都去马克思列宁那里取经了。这个思想形成于延安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运动，对很多人而言是一场噩梦，对刘少奇而言却是一次机遇。这个运动实质上是由毛泽东同志发起，经过刘少奇等人推动的。

正是通过延安整风运动，不太听话的将领（如彭德怀）听话了，还有反对过毛泽东的大佬（如周恩来、博古）检讨了，还有不少党员“被拯救到马克思那儿去了”。

正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刘少奇和毛泽东结盟，标志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此后刘少奇成了白区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成为党内排名第二的大人物。在那种党指挥枪的情况下，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

这件事在这里先放一放，后面会详细说。

刘少奇之所以取得如此高的地位得益于第三个原因：没有军方势力，且资格、地位均不如毛泽东。当时的革命力量虽然有苏区和白区两个部分，然而白区地下党的工作只是起辅助作用，主力还

是在苏区。在苏区的都是军人，这些军人在恶劣的环境里和敌人打仗，下了战场不免要露出本色——粗人。有的军头（如彭德怀）见了毛泽东张口就是老毛。在艰难的环境里，这样叫固然亲切。但是作为一个政党，一个志在夺取领导权建立新国家的政党，基本礼仪是必须有的。军人们对这个似乎不太在意，老子打赢就行了，管那么多干嘛？

白区出身，长期游走在各种机关单位的刘少奇对此相当熟悉，干起来得心应手，这是一个方面。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知道，毛泽东虽然参与创立中国共产党，但是早期的党内地位并不太高。除了井冈山早期过了一段天高皇帝远，谁也管不着的生活外，后来直到遵义会议才逐渐掌握了领导权，即便如此也拿张国焘没办法。

在中共早期的牛人中，陈独秀右倾了，瞿秋白、李立三左倾冒险了，张国焘失败了，实力派人物周恩来归顺了。刘少奇虽然工运搞得不错，但入党没有毛泽东早，地位从来没有毛泽东高，还戴过右倾的帽子。而且在白区地下党的岗位上干得不错，工作能力很强，且任劳任怨。有了这样一个精通业务的帮手在身边，麻烦琐事全部推掉，何乐而不为呢？

毛泽东可以给刘少奇一个很高的位置，用来制衡军方那些巨大的山头，同时又不会跟军队走到一起，可谓一举多得。

正因为刘少奇没有军方背景，毛泽东外出，才能放心大胆地把中央党内事务交给刘少奇。这才有了重庆谈判期间，刘少奇代理老大的事。

从此之后，中共中央形成这样一个格局：军内大佬管打仗，刘少奇和一帮理论家管党务理论，周恩来管党务之外的所有事（外交、统战之类的）。毛泽东高高在上，负责战略运筹。这是一个相当成功的框架。它让中国浴火重生。

毛之用人，高啊！

毛刘同盟主导中国政坛数十年，大饥荒之后出现裂痕，到文革才彻底断裂。现在看一看这部对新中国影响最大的二人转。

三、政治二人转

（一）毛刘结盟的起源

在他们成为政敌之前，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密切。解释两人之间的关系，相当于在森林里捉迷藏，难啊！

刘少奇和毛泽东是老乡，比毛泽东年轻五岁。

现在去湖南旅游，从花明楼（刘少奇故居）到韶山（毛泽东故居）二十公里左右。即使步行，也用不了一天的时间。当然，年轻时代的刘少奇没有步行去过毛泽东的家，毛泽东也没有步行去过找刘少奇。两人虽近，彼此并不知晓。

两人老乡见老乡的故事上演于一九二二年，陈独秀派刘少奇回老家搞工运。当时刘少奇入党之后刚从苏联回来，毛泽东更是在一年之前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两人初相识，毛泽东就委派这位老乡去领导工人斗争。然而文斗时代的毛泽东并没过多参与工人运动，风头远不如刘少奇强劲。

随后两人一个在苏区一个在白区，交集不多。遵义会议的时候，刘少奇再次支持老乡毛泽东，然而当时正处于生死存亡之秋，大家想的是如何逃跑，以及跑到哪里去，没时间也没心思拉关系、搞感情。结盟那啥的，还是等到闲了，有时间解决问题了再说吧。

啥时候有空呢，那就等吧，等两年再说。两年之后，也就是一九三七年，空闲来了。说这个之前，还得把时间倒退十年，先理一理之前的那些条条框框。

话说白色恐怖到来，文斗结束，武斗兴起。

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即南昌起义之后，毛泽东搞了秋收起义，一系列的风云际会之后，毛泽东把队伍拉上井冈山坐等各路英豪来投靠。若干年之后，江西那个地方不仅达到了武装割据的目的，还建立了政权，让老蒋一次次围剿一次次失败，一时好不威风。但正是这个时候，毛泽东把权力给丢了，丢得一干二净。

是毛把权力扔了？不可能！是毛没能力了？也不可能。是毛被排挤了！比起武装根据地的拉风，中共中央居然在上海混不下去了，迁到江西。加上一批从苏联回来的满腹洋墨水的青年，一合计就把毛泽东给排挤了。

根据地是毛开辟的，然而毛什么都没有了。因为毛既没有出过国，战略战术跟苏联那套背道而驰，因此被尊为“山沟里的马列主义”，也就是拿不上台面。排挤毛的是那些人呢？具体来说就是历史书上提到的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这些人在苏联受过正宗的共产主义教化，以正统自居。没办法，当时中国受共产国际的支援且听其指挥。

洋派的这些有志青年，理论水平都是一流，看过很多书，背过很多经典教条，是优秀的书生。这些人要干一番大事业的勇气可嘉，却忽略了一个现实问题，干事业的前提是会打仗，他们不会打仗。不会打仗就算了，偏偏自以为能打仗。在不会打仗而自以为能打仗的书生的领导下，根据地就没了，要长征，说难听点叫逃跑。书生误国啊！

现在流行一种瞎扯的观点，认为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的位置一下子从地上升到天空。任何政治团体，在最高权力过渡时，如果不想出乱子，就要慢慢来，平稳过渡。当时共产党非常弱小，又在逃跑的路上，如果再出点分裂什么的将非常危险。所以在遵义会议之后，所谓毛泽东重新上台，只是重掌军事指挥权而已，党的最高领导人叫张闻天。当时的毛泽东，只不过上升势头比较猛，还有人可以不买他的账，和建国之后那种高高在上的地位相差甚远。

那时毛泽东虽然上台，依然被迫承认苏维埃时代“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就是说被迫承认那种让地盘（苏区根据地）和人手（军队）损失百分之九十的策略很对头。是不是很搞笑啊？其实一点也不，那是各个方面妥协的结果。政治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先妥协后算账。

在政治的涡流中，一味讲原则意味着天真鲁莽；只懂得妥协、和稀泥牟利，那是政客；真正的政治家除了妥协之外，还要秋后算账。听起来似乎怪怪的，但算账也有多种算法，赶尽杀绝是一种，团结帮助也是一种。高明的政治家在秋后算账的时候，都是对个别赶尽杀绝，而把大部分人团结到自己这一边来。像苏联空降兵王明同志，以及书生博古上台之后瞎搞一通，只会坏事。

遵义会议期间，形势恶劣，必须团结帮助。毛泽东出山只是搞军事。把党务让给张闻天，是一着妙棋，在后来和张国焘的肉搏中，张闻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没有张闻天，毛泽东要在党内战胜张国焘将更加困难。没有以张闻天为首的苏联派力挺，或许张国焘不用南下了，直接把毛泽东干掉。那样中共历史将改写。正因如此，在后来的庐山会议上，张闻天表态支持彭德怀时，毛泽东认为问题严重——因为毛泽东知道张闻天这位前任的政治能量和威信。

毛泽东走上最高领导的岗位需要一个契机。契机来自一九三七年。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被迫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暂时不再进攻延安。这时候大家终于可以喘口气了。既然有了空，那就反省之前的事吧。共产党反省的方式就是开会。开会讨论之前究竟怎么了，以致现在搞得这么狼狈，还不如井冈山时代了。

问题大大的，特别是远在苏联的王明同志，简直罪大恶极。毛泽东打算在政治上批判王明的左倾路线，把曾经跟随王明的同志们团结到自己身边来，带领他们打下一片大大的江山。但是毛一直没突破口，因为在之前的权力转让的过程中，作为交易条件，只是说当时的军事路线错了，让李德那个外国佬滚蛋；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是对的，所以让他出来搞军事，根本就没有涉及到政治路线。毛泽东也承认之前的政治路线是对的（不承认不好出山啊）。大家都是聪明人，在那危急时刻，生

存是第一位的。在生存前面更像一种扯皮。如果当时在政治上扯皮，估计扯到阴间也扯不完。

现在有时间了，能够进行扯皮了，毛泽东也通过了考验，需要通过政治手段高升一步获得名义上的最高领导权。

如果是直接清算，不仅违背自己之前的诺言，还将清洗掉一部分同志。当时共产党相对弱小，经不起折腾。毛泽东的目的是要重新整合共产党，大干一番，而非搞政治运动。最好的办法是开辟第二战场，由另外一个人挑起战火，制造一个突破口。

这个人必须有一定的分量，对中共足够了解，而且很有才华。当时党内的理论高手主要是从莫斯科回来的那帮人，但是他们是不能指望的，因为苏维埃时代的失误就是他们整出来的，不可能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周恩来是另外一个选择，但他不会去干这种事。除了周恩来的性格谦和、善于组织团结的原因外，他自己也曾追随过王明、博古，算起账来也有份。毛泽东自己带出来的人吧，打仗还行，要搞理论斗争，切切不是那帮国际理论家的对手。

突破口在哪里呢？在刘少奇那里。

刘少奇根据自身经历和理论才华给主管党务的张闻天写了一份长信，内容很长很苦涩，但结构严谨、理论清晰、语句流畅、没有错别字。信中摆了很多事实，讲了很多道理，主要意思就是讲，十年内战期间领导有错误，这些错误既有右倾又有左倾，而且形成了“左倾传统”。因为错误的领导导致了党组织的理论被严重削弱，特别是白区政策，更是错的。总之一句话，就是之前的领导很没有水平，才导致了如此大、如此多的失误。就信的内容而言，火爆程度远胜彭德怀在庐山上写给毛泽东的“万言书”。

一九三七年的刘少奇还不是党内二把手，还不是白区的正确代表。当时党内比刘少奇的地位、威望高的人还有很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些人不说，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人都比刘少奇的地位高。刘少奇的信相当于横扫了一大批地位高过自己的同志。

刘少奇写这封信的目的和动机是啥呢？从公开的资料来看，彼时的刘少奇和彼时的毛泽东关系并不密切。也没有证据证明，刘少奇写信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或鼓励。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按照刘少奇当时的地位和处境，写这封信是冒着极大风险的。如果不成功，自己很可能被清算，至少要弄顶什么帽子戴一戴。就算取得某种成果，自己也不见得有啥好处，这封信攻击的人太多了。

今天看来，可能的动机只有两个，一个是刘少奇同志本着大无畏的高度组织纪律性写了信；第二个是政治敏感性，嗅到国际派将要完蛋了，所以写信打开一个缺口，搞一个前期投资。

真正的受益者只有毛泽东。

毫无疑问，这封信引起激烈争论，因为很多人就是跟着之前的领导干的。在之前的领导当中，

如博古同志，现在还是领导。你刘少奇凭啥说咱们不行？咱们不行难道你行？你行你干点事给我们看看先！你干了啥子嘛？啊？一番唇枪舌剑，一帮高手口舌论战，那是唾沫星横飞，场面远胜今日的精英辩论赛。大家引经据典，开口马克思闭口列宁，从恩格斯到斯大林再到毛泽东同志的言行，那叫一个热闹。

彼时的毛泽东还不是终极仲裁者的角色，只能默认刘少奇的行为。争论的结果除了“展现刘少奇高超的理论水平”之外，还打开了一个政治缺口。通过这个缺口，毛泽东可以对过去的路线进行清算，进而登上最高领导台。

这是毛刘联盟的第一个契机，从此两人在老乡的基础上有了共同的政治目标，那就是对过去的路线进行清算。五年之后，通过延安整风运动，毛刘同盟正式形成。两人相互配合，主导中国政坛。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政治史大体可以分为两段：毛刘联合的时代和毛刘分裂的时代。

（二）延安整风

延安整风之前，毛泽东在党内的合作者是张闻天。毛泽东管军事，张闻天管党务。毛泽东通过和张闻天的政治合作来控制共产党。经过三年整风，毛泽东在党内的合作者变成了刘少奇，党内事务交给刘少奇干。但是从张闻天到刘少奇有一个巨大的转变：张闻天虽然也是一个理论家，但也是名义上的最高领导，隔三岔五地整出一叠报告出来让大家学习。张闻天的离职，标志着国际派的全面失势。刘少奇上台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完成本土化的进程。尽管刘少奇也去过苏联进修，但他的靠山并不是莫斯科而是毛泽东。刘少奇的身份只是党内二把手。

延安整风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运动，它看起来就像一个漫长的会议——一个长达三年的会议，这是中共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会议之一。站在国际的角度上看，整风之前，中国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整风之后，中共成了一个独立的政党，依然依靠却不再依赖莫斯科。当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共产国际解体了。

共产国际类似于一个各国共产党的联盟，负责给旗下各个支部提供援助。中共从中得到不少好处——这些好处甚至让国民党眼红。在大革命时代，国民党曾两次申请加入共产国际被拒绝。一年之后，国民党开始清党。

对早期的中共而言，共产国际更像一个母体，以作为精神信念支柱的方式给年幼的中共各种安慰，同时也给中共各种伤害，包括把土生土长的向忠发推上总书记的位置，包括把王明空降给中共。到了后期，中共羽翼渐丰，共产国际适时解体，中共开始独立自主。

中共虽然独立了，内部却还有一批人唯莫斯科是从。通过整风运动，中共开始从精神上摆脱对莫斯科的从属关系，走向独立自主。这是积极伟大的一面，已经是历史定论，这个问题在后面还将

讨论。延安整风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纯粹的整风。

整风，整风，名为整风，实为整人。风气因人而存，要整风就要整人。

既然是整人，为啥还要整呢？那就要从当时的风气说起。

当时有很多风气，比如说曾经的陈独秀同志，赞同共产党应该放下武器，结果工人武装力量完蛋，历史定论右倾。共产党成为地下党之后，李立三又搞了一段时间的左倾，地下党组织基本完蛋，定义为左倾。这些都有定论，但是王明同志不同——搞教条。由于他是莫斯科的空降兵——莫斯科是全世界共产党的核心——凡事都参照苏联那一套。加上博古和李德二人比较给力，在中央苏区玩左倾，把苏区革命根据地基本玩完。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结束之后，军队损失一大半。损失之后，王明同志跑到苏联当共产国际代表去了。国共合作之后，局势稍微稳定一点，王明又回来了。

王明从苏联回来，还带来了一道圣旨，圣旨曰：“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话翻译过来，就是要共产党放弃独立自主的政策，也就是共产党服从国民党，也就是把当年陈独秀的那一套再来一遍，也就是所谓的右倾。

苏联当时的注意力在欧洲，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希望中国的抗战给力点，免得分心照顾东方的日本。因为当时国民党是抗战主力，是中央政府，所以希望共产党配合国民党。当时共产党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苏联通过共产国际给中共施压。这些可以理解，不能理解的是王明。

当年在苏区，毛泽东在军事上主张游击战，王明为了搞不同，主张正规战。如今毛泽东主张和国民党在斗争中求团结，王明为了区别毛泽东，主张团结不斗争。总之两个字——不服。他要另拉山头 and 毛泽东对抗。勇气固然可嘉，问题是王明你行吗？

王明的表现确实不像中共领导，而是苏联在共产国际的代言人。所以后来毛泽东批判王明，说他：别人的事操心太多，自己的事操心太少。此话一针见血。然而王明自己意识不到这一点，他还以为自己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略家，而毛泽东只是民族主义老土。懂得很多理论教条的人，多半如此。

历史证明，王明同志是个喜剧演员，上一次他搞左倾，差一点让共产党完蛋。留下一个烂摊子也不收拾，跑去苏联当代表。这一次来个一百八十度转弯，主张向老蒋妥协。虽然他的表演让人好笑。作为观众，我们不禁要问，王明同志，你自己的观点是啥？王明的观点就是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观点，并非中共面临的必然选择。

接下来就是“皖南事变”。皖南事变的原因除了一年前百团大战很给力，引起蒋介石的注意外，另一个原因就是这种服从蒋介石的“右倾”思想。当然还有其它原因，比如说项英和毛泽东不和。当时延安的风气还不止左或右这些，军内还有各个山头，大家孤立在不同的地方，思想、行动相差

甚远。

既然有如此多的风气，那就整风吧。

整风运动的发起人：毛泽东；推动者：刘少奇，任弼时。

目的是啥呢？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领导整风运动的组织：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组长，毛泽东。这个组织诞生之后就成为党内权力最大的组织，就像后来的中央文革小组在文革中成为最高权力机构一样。不少人认为，延安整风就是文革的彩排，这些话有些道理。

既然名曰学习小组，那就学习吧。学习小组实际上就像一个补习班，相当于一个高级别的补习班，能进这个补习班的，要么曾经显赫一时，要么就是一方精英。在这个补习班里，教书先生是毛泽东，他的助手是康生、刘少奇、彭真、罗定一等等一帮理论家。

毛泽东和一帮理论家带领大家学习，给大家补习功课，看起来相当温馨。这种温馨只是表象而已。通常意义上的学习，是学习知识求得自身进步，此次学习却是另一个模样——找自己的缺点。就是本人之前干过哪些错事，导致了哪些严重后果，应该怎样改正。同时还要指出，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才得到这么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本人可能已经被万恶的蒋介石抓起来坐牢杀头了。本人以后坚定地沿着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正确路线前进。

通过这个学习，同学们学到不同的知识，认识到自身的不足。

博古同学热爱学习，最先学习到一些关于自己的知识：本人在井冈山后期犯了严重错误，给党和军队造成了很大损失。本人是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和发挥者。本人辜负了广大同志的重托，辜负了老百姓的期望。希望大家再给本人一次机会，让本人好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发光发热。当然博古同学不是一个人在学习，他还代表了凯丰、邓发等人。

张闻天学到的是：苏维埃后期的路线是错误的，对待毛泽东同志的做法也是错误的，这些是老账，必须算清楚。只有把这些老账算清楚，才能统一思想步伐，迎接新时代。这个新时代，就是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全党全军大踏步前进。

王稼祥学到的是：知识分子缺乏经验，生搬硬套苏联经验，所以导致了一系列失败。现在好了，有了正确的领导和方向，前途一片光明。

学习班刚开始时，周恩来在重庆搞统战。期间父亲去世了，大哭了一场。等他回到延安，补习班已经开课有一段时间了。长期以来就热爱学习的周恩来同志当了一回插班生。在学习班里，周恩来同志学到的是：本人曾经错误跟随王明路线，错误地批判过毛泽东同志，造成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被撇到了一边，造成了严重损失。本人有错，本人认错，此后本人将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

下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和周恩来一起学习的还有陈毅。

和周恩来一样，彭德怀一开始也不在补习班，而是守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进入补习班之后，通过数十天的紧张学习，彭德怀认识到：本人发动百团大战的时机是不对的，没有领悟毛泽东同志以游击战保存实力的意图。战斗的结果引起了鬼子的反扑和蒋介石的注意。这一战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观念相冲突。在以后的战斗里，本人一定虚心向毛泽东同志学习。

经过一系列教学之后，毛泽东成了所有人的老师，可以说非常成功。但是却不能说百分百的成功。为啥呢？因为王明同志不愿意当毛泽东的学生。在毛泽东开这个补习班的时候，王明同志一直在生病，没有来上课。

换成别人也就算了，王明不一样。按照教学大纲，是王明同志造成了中华苏维埃的损失，他不来上课，这课就少了很大的象征意义。请客吃饭，却少了主角，当然很遗憾。

当然王明同志也有他自己的理由：本人没在苏区待几天，直接负责的是博古、周恩来等同志，不能把账算在我身上。再说王明当时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基本上是传达共产国际的政策，没有办法对共产国际说你错了，是吧？共产国际在时，不敢说；解散之后就没地说了。但是中共要独立，要本土化进程，就必须对过去的事进行批判。王明是一个天然的批判对象。和博古、王稼祥等人不同，当时的王明还有相当的威望。既然如此更要批判了。

中共高层中，被批判却不认账的只有两个，一个是王明，另一个资格更老点，叫张国焘。这两个人让毛泽东很窝火，到后期的政治运动中，一不高兴就说：不满的同志可以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我去上山打游击。

然而王明同志远远不是补习班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在哪呢？在中下层。中共在战争期间虽然紧密配合，但内部却也是派系林立。连毛泽东自己都承认——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整风就是要削平党内、军内的山头 and 派系。

所谓派系，就是一群人跟这个，又有一群人跟那个。有人因为羡慕某个人加入共产党，又有人从国统区跑过来就是因为某人，乱着呢。国民党统治区内那一块块的根据地，就是一个个山头。孤立的各个局，缺少交流，基本上都是一个派系。像华北局，就是跟着刘少奇的。后来的东北局就是高岗的天下。大家和蒋介石同志拼命的同时，彼此之间还有很多芥蒂。

这些派系、山头的领导人挨了批，下面那帮人当然不爽。不爽就要表达啊，怎么表达呢？那时候没有网络，邮件、博客之类的玩意还还在遥远的未来，连印本书都很困难。写匿名信吧没处发；上访吧，不敢。同志们充分发挥创造力，发明一种信的表达方式：即把自己的不满直接用锅灰石灰（油漆很贵）写在墙壁上，条件好点的写成传单贴在墙上，号称墙报。那玩意还不如现在的小区宣传栏，但在当时的确非常有效。

墙报曰，批判这个领导是不公平的，为啥不批评另一个？什么人公报私仇，陷害什么人之类的话。有些人就和现在的网络愤青差不多，愤怒夹杂私货一泻而出。他们很快就要为自己的愤怒付出代价。如果世上有后悔药，他们一定买一包回来吃吃——因为他们招惹了一位惹不起的人物。

这人是谁呢？就是久经考验的康生同志。

（三）康生的身手

这下好了，整风本来就是为了统一行动的，现在出了这么多乱子，怎么办？那就扩大呗。对上层人物，那叫整风，曰思想上清党。就算是错误路线代表的博古或者王明，只要低头认错，表示以后跟着毛老师学习就行了，思想清党成功，保底是个政治局委员。

对下层人物就没有那么客气了，用另外一个词来形容，叫审干，又名组织上清党。

为了审干，中央成立一个反奸斗争委员会，由毛老师的两位助手负责。主任是刘少奇，但业务工作主要由副主任康生来搞。康生同志本来就干过特务，业务水平一流，据说得到张汤、来俊臣等人写的整人秘籍，并且本着发扬中华传统国粹的精神，还有所创新。

主要科目分为两大块：一是摧残肉体，二是折磨精神。

啥叫审干呢？就是查查你是不是特务，有没有给万恶的国民党提供情报。按道理说，这是防止敌人渗透，是好事。按照正常情况，怀疑一个人是不是特务，得先找出证据，然后再定罪。但那时候不一样，监控设备、窃听装备都没有，只能用最原始的方法。

康生同志是这么干的：怀疑你就把你隔离，先把你全身每一个毛孔都搜查好几遍；接下来再把你的窝翻个底朝天；再接下来就去审问你的亲戚朋友，问你有没有反常表现。

要是这么一路下来还没有得到想要的线索，你心里想，该放人了吧？康生同志会用实际行动告诉你，刚刚布置好外围工作，进攻才刚开始呢！进攻的方向当然就是你。你可能被五花大绑吊起来，一瞬间就会让你冷汗如雨，全身瘫软。如果你运气够好，很快昏过去，忘记了那种痛苦的滋味。如果你运气不够好，昏过去之后可能被冷水浇醒，继续享受。当然这只是其中一道菜，还有很多别的美味，比如说把你的头发拔下来等等。

这是身体能享受到的待遇，还有精神上的。怎么招待你呢？一天二十四小时有不同的人为你服务，让你忘记吃饭、忘记睡觉、忘记胡思乱想，一直在反思哪里做错了。不仅如此，还会有人拿枪在你面前比划，说最近局势很紧张，我很忙，没时间陪你耗之类的。

你说你恨不恨康生同志？当然恨啊！

这绝对是一个得罪人的差事——然而康生干得有声有色，取得优异的业绩。以至于有人为中共

叛徒张国焘同志说好话；有人闲来无事为汪精卫翻案，以此哗众取宠，就是从来没听到过为康生同志叫冤翻案的——尽管康生同志比张国焘更有才华，生前比汪精卫享受更多尊荣。不容易啊，康生同志，你很成功！

康生，山东胶南人，生于一八九八年，和刘少奇同年。生前德高望重，死后遭众人唾弃。

康生生于名门望族，受过良好教育，二五年加入中共，当过一系列干部，拥有多重身份。这些身份中有一项是特务。正是这段经历，康生审查别人得心应手。

康生同志业务能力了得，做人也了得。王明得势那会，康生是忠实的粉丝。然而凭借自身的精明，在清算王明路线时，康生竟然一跃而成为反王明路线的英雄，近身为毛老师的助手，真是奇迹。康生同志不仅安然通过历次残酷的运动，而且在每一次运动中都扮猪吃老虎。很多地位比他显赫的人都落到康生的手中，康生对此很满意。

在延安整风中，康生同志迎来人生的第一次高潮。他很好地用实际行动迎接了这次高潮的到来，并为此准备了精彩的表演。所谓表演，就是抓特务。康生同志通过自己的技术手段，在延安抓到很多特务。特务数目从一个班上升到一个排，再上升到一个连……到最后连主任刘少奇都搞不懂：既然延安有那么多特务，怎么没有重大机密泄露事件？

当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柯庆施，据说和刘少奇有矛盾。当年刘少奇挑战张闻天时，柯庆施骂过刘少奇“老右”。此次整风享受反革命分子的待遇，接受身体和精神双重考验。眼看就要完蛋了，被毛救下，成为毛的粉丝，后来成了反对刘少奇的铁杆。此君逝世于文革之前，曾留下经典语录：跟从毛泽东要到盲从的地步，相信毛泽东要到迷信的地步。柯庆施主政上海期间，为上海的经济建设做出很大贡献，留下很多财富。当然还留下一批人，比如说张春桥同志，比如说姚文元同志，他们后来都成了老对头刘少奇的克星。当江青同志在北京没人理会，她跑到上海来，立刻被他供奉起来。

陶铸的事也差不多，也是被毛临危解救。但陶铸为人正派，文革初期因不赞成“文革”演变为“武革”而被打倒。叶剑英的夫人也被整出精神病。这些有名气、有地位的人尚且如此——他们有毛泽东保，地位更低的人，毛泽东够不到的人就惨了，特别是那些从外地来的。

张克勤是一名共产党员，到延安深造。他的父亲曾在兰州被敌人逮捕，他本人对领导提过偏激的意见，于是乎一名与他一起来学习的同志检举他是特务，于是乎康生下令把张克勤看管起来。此时年仅十九岁的张克勤享受如下待遇：六天六夜的“车轮战”肉体折磨和“假枪毙”的精神威胁，以及“坦白了可以保留党籍”的诱逼后，张克勤再也忍不住了。十九岁的年纪还是个孩子，能支持六天六夜已经相当不简单了。张克勤，你已经够硬了。

张克勤同志招出了甘肃地下党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红旗党”，是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

之类的虚假口供。而他当时并不知道这一切。什么“红旗党”、“国民党的红旗政策”这一类词，全部是审讯他的人的提示。经过他一番胡扯，当初与他同来延安并揭发他是“特务”的人成了“特务”！

取得这么大的成果，康生相当开心。

张克勤以为这下完蛋了，胡说八道这么多估计要枪毙了，那就等死吧。然而现实出乎意料，康生同志不仅没有继续摧残张克勤同志，还让他摇身一变、享受了一下新郎官的待遇：骑着高头大马，佩上红花，到各机关学校作演讲，介绍他的“特务”经历和反悔过程，并鼓励更多的张克勤站出来。这手段让戴笠都自叹不如啊！

根据张克勤的瞎编乱造，康生得出如下结论：来自甘肃、安徽、湖北等地的地下党组织都不可靠，需要抓起来重新审查，一夜之间抓了好几百人。这些人成了康生刀俎上的鱼肉，任凭康生处置。康生同志也在一夜之间找到当阎王的感觉，那叫一个爽啊。

有个叫王实味的作家，因为对延安整风略有不满，惹了康生同志。经过一系列操作，王实味成了罪大恶极的人，什么特务、奸细、叛徒、反党、托派……一长串的帽子免费赠送。对于这样的人，下场只有一个——处决！你不是有才么，不是作家么，脑袋只有一个吧？那就割下你的脑袋，看你还有没有才华？

康生整人狠到啥程度？从彭真身上可以反映出来。当时彭真是中央党校副校长，曾积极参与整风运动。彭真自己也承认错误：“延安整风嘛！我得罪了一些人，后来我与他们见面就道歉。不只道歉一次，是反复道歉！”然而整风运动比较积极的彭真对康生都看不下去了，向毛泽东反应情况。如果说彭真的分量不够，看看毛泽东的反应。

接下来毛泽东也认为康生干得过分了，多次向受到伤害的同志“脱帽致敬”、“鞠躬敬礼”赔不是。四五年五月份毛泽东在中央党校讲话：“整风运动中的一些问题，是则是，非则非，搞错了的，摘下帽子，赔个不是。”说到这里，毛泽东向听众行礼赔不是。四五年二月，毛泽东再次在中央党校讲话中说：“审干中，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别的地方搞错了，谁负责？也是我，因为发号施令的也是我。”

应该说彼时的毛泽东还是很有风度的，至少比文革那个时候更有风度。能让毛泽东这种人一再认错，可见康生同志的“战绩”多么强悍。然而康生并没有被就地正法。原因很简单，毛泽东保护了他。为啥呢？因为当时正值战争年代，局势很险恶。延安时常面临来自敌占区特务的威胁，需要康生这种人。

康生的故事证明，正义并非所向无敌，在非常时期，邪恶之人只要有用也能生存。

康生的真正破坏，除了延安整风运动中整了很多，还为未来的政治运动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

即不论你是谁，只要搞点材料、给你个帽子，就能侮辱你的精神、折磨你的身体。后来的刘少奇和彭德怀就是典型。

看看康生这个人，名门出身，精于文物收藏鉴赏，写得一手好字，怎么看都像个“贵族”。实际上却是“跪族”。此人甘愿跟着强人身后吃屎，从来没有自己的主张。虽然生前尊荣，死后却遗臭无穷。从康生同志身上，你很难找到人格、尊严、理想、信念这类词。但是这种人从来就存在，只为充当强人的爪牙而存在。

毫无疑问，康生是精明的，不然不会历经各个时代而不倒；毋庸置疑，康生是有才的，当时和郭沫若并称“郭老”、“康老”；康生以“鲁赤水”作画，和齐白石起名。透过精明和才华，背后却是一身的媚身软骨。

如果说整人还有无奈，那么作为鉴赏家的康生就让大家没话可说了——非常的无耻：常常以鉴赏为名从国家博物馆里拿点东西出来，鉴赏之后就变身为收藏家，自己收藏了，人品可见一斑。很难想象一个有知识、有素养、见过世面的人如此极品。放在中国历史人渣榜上，也会名列前茅吧。

从康生身后的遭遇来看，验证了一条规律：酷吏是没有好下场的。生命是宝贵的，需要的是珍惜而非摧残。这是康生被扔进历史臭水沟的原因，估计以后也不会有人试图打捞他。

回顾一下延安整风。整了很多，代表人物有三，以王明为首的国际派；以周恩来为首的毛泽东之前的中央实力派；以彭德怀为首的军方大佬。

整风运动有两个主要推手：康生和刘少奇。

康生主要是审干，开创了党内摧残精神、肉体的恶劣先河；而刘少奇是在造神。

（四）刘少奇在造神

说完康生，说说补习班毛老师的另一位助手刘少奇。

应该说，刘少奇也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主要受益者之一。他没有像康生一样干那种万人唾骂的事，他干了另一件了不起的事——造神。

延安整风和文革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延安整风总体上讲还是非常有利的。没有延安整风，很难有后来解放战争中那种高度一致的整体配合。

延安整风留下两个巨大漏洞，一个是康生审干，为后来的政治斗争对待失败者开了恶劣先河，后期的彭德怀和刘少奇都是受害者；第二个就是刘少奇的造神运动，把毛泽东捧上神坛，这个对日后的局势影响深远。

后来毛泽东那种近乎神圣的地位，是由很多人长年累月、辛苦努力造出来的。这些人中最为主要的一个就是刘少奇。刘少奇掀起的造神运动，起于延安整风。

分析刘少奇的造神运动之前，先看看他的性格。早期中共四大领导人中，毛泽东的个性是务实中透着大气，生活比较随性；朱德比较宽厚；周恩来则是一团和气。至于刘少奇，那就是严谨、严肃、认真。平时不拘言笑，干起工作来从不含糊，需要说话时滔滔不绝。虽然是搞政治工作的，工作方式却如工程师一般严谨，很少留下破绽。当然，这一切和白区经历有关。没有如此严谨的性格，估计已经死了很多次。正是因为这种性格，造神运动效率奇高。

造神运动有两个部分：对下层和上层。

实事求是地讲，刘少奇对康生那一套是看不惯的。他不赞同搞人身攻击、肉体精神双重折磨。他甚至还怀疑那一套。刘少奇喜欢另一个模式——坦白反省。所谓坦白反省，就是大家坐下来好好谈一谈，谁对谁不满说出来。班长对连长说，你那天让我给你洗衣服，我不愿意，你骂我，我很不爽。连长就说，不好意思，没有注意到你的感受，下次衣服不让你洗了。就是大家沟通沟通，解开心结，像个大家庭，看起来挺温馨理想的一种方式。然而烽火连天的时代，有多少可行性是个未知数。刘少奇是通过另外的方式影响整风运动的。

前面提到过，刘少奇写过一本书——《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在整风运动中发挥了作用。书中对同志们说了，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对待同志最能宽大、容忍、乃至“委屈求全”，必要时能够忍受各种误解和屈辱而毫无怨恨之心。因为误解终究要消除，屈辱终究要昭雪。怨恨会导致同志之间更多误会，因此要忍耐。只有做到这一点，才是经受住了党内斗争的考验，才是党性修养到家的表现。对领导要足够尊重、爱戴，因为领导是好意的、善良的、无私的、怜惜下属的。即使领导错了也要有理说理。根据这本书对领导的要求，就是领导要体恤下情，时刻为下属着想。

概况一下这本书：给党内铁的纪律蒙上一层温馨的面纱，千年以来表儒里法制度的再一次翻新推广。毛泽东曾经兴致勃勃地问薄一波：“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写得好，你读过没有？它讲‘修养’，我讲‘整风’，意思是一样的。”

说白了，就是集权，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集权。

按照这本书的意思，康生同志搞“抢救运动”，四人帮搞文革，大家要忍让。很多优秀的共产党人确实相信了这个理念。刘晓同志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因为在白区工作，经历比较复杂，到延安开会时被康生打成特务。根据他自己的回忆享受了这样一些待遇：十天十夜坐在一个小板凳上，接受两个人一组“车轮战”式的审问。审讯者常常拿枪在他脑袋上比划。那意思不用多说吧？

刘晓这样描述当时自己的心境：在这种情况下，我一点也没有害怕，立刻想到的是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少奇同志在该报告中曾明确指出，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冤枉、误会。我若真

的被枪毙了，是为自己的信仰而死，要经受得住这个冤枉误会，何惧之有？

一年后，刘晓恢复了自由，心情愉快地投入了新的工作。在文革中，刘晓再次被打成“苏修特务”，母亲被逼死，父亲哭瞎了眼睛，儿女一疯一傻，妻子过早地离世。

很多优秀的共产党员以自身的“宽大、容忍、委屈求全”之心对待领导，却没有换来领导的民主“修养”，反而使冤枉误会闹得越来越大，不可收拾。为啥呢？因为领导只是一个人而已，要管的事也很多，同时还要享受生活、注意劳逸结合，怎么可能面面俱到？

这就是刘少奇那本书的致命缺陷——以人性善良为前提，把组织引向了人治方向而非法制。导致领导权力过于集中而非分散制衡。体现在最高领导那呢，就是无法无天。

我们知道，现在中共中央最高领导是总书记，一开始那会也是书记。而毛泽东称为主席，虽然就是称呼的不同，差别却大了。

建党之初，陈独秀提出中共采用相对民主的委员制，委员中推举一个书记负责联络。这是一种分权的领导体制。尽管陈独秀本人乐于充当“大家长”，权力依然有限。莫斯科空降兵王明，组织上的权力也有一定的限度。

这个总书记设置延续到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这一年刘少奇从苏北回到延安。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在周恩来、王稼祥、王明、博古、陈云等政治局委员缺席的情况下，刘少奇和任弼时为推动整风，对党的领导体制，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动议。时任中央秘书长的任弼时提出：书记处作为政治局办事机关，成员精简为三人。如果这个提议通过，这三人将有很大的权力。刘少奇还嫌不够，更进一步提议：书记处应设立一个主席，其他两名书记是主席的助手，书记处要能够在政治局的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与会者赞同刘少奇的意见，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书记处，以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啥意思呢，就是承认毛泽东有权干任何他想干的事。

从此，毛泽东就在党内正式成为“毛主席”，凌驾于所有人之上。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得到的第二个主席头衔，第一个主席头衔是在苏区失势，总书记向忠发赠送他的苏维埃政府主席头衔，一个虚职。这一次才是威力无边。

从法理上看，毛泽东这个“主席”具有比斯大林的“苏共总书记”更大的权力。在中国历史上，能力超强的个人拥有巨大的权力之后往往能干出伟大的事业。比如说秦始皇统一六国，比如说汉武帝开疆辟土，都是强人和强权结合的典范。没有强人拥有无限的权力，就不可能成就如此伟业。同样毛泽东也是一个能力超强的人，拥有这种权力之后，他的军事、政治才华得到彻底释放，中国再次快速统一。而在抗美援朝之前，大多数政治局成员对是否参战持保留意见的时候，毛泽东运用自

己的权力做了最后决断。

然而历史一再证明，这种强人和强权结合终究会造成巨大的破坏作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是巨大的工程建设，造成秦帝国崩溃。汉武帝无尽的战争消耗之后，是大汉帝国迅速滑坡衰败。毛泽东在一系列的政治军事胜利之后，因为种种原因导致了经济建设的惨败，大饥荒给予新中国沉重打击。

这仅仅是整风中造神运动的开始而已，巅峰是毛泽东思想。

（五）神座下的牺牲者——国际派

所谓造神，就是让一个人高高在上，俯视众人，其他人则站在四周，表达忠心，听从领导的吩咐，服从领导的指示。既然是造神，那么原来和神的地位相差不远或者地位曾经高过神的那些人都必须打压，因为和神拉不开距离是不行的。造神是刘少奇的工作，但是仅凭刘少奇无法打压那些人，必须由毛泽东亲自出马带领刘少奇的造神团队打天下。

第一批牺牲者，就是靠莫斯科吃饭的那帮才子，排名第一的是王明。

十年之前，王明也是一个斗争高手，通过积极打击瞿秋白和李立三上位。前面说过，王明的政治主张就是跟着莫斯科走，没有自己的主张。莫斯科指左就左，指右就右。但是王明可以博得莫斯科的青睐并非仅仅善于跟随莫斯科。那年头愿意紧跟莫斯科的人多了去了，毛泽东之前所有中共领导人基本上都是惟莫斯科马首是瞻。李立三稍微叛逆一点，说过一些不太动听的话，结果被狠批。王明之所以被看中，因为他很有才。

王明的才华并不在政治实践上，而是在理论方面。王明作报告，不论何时何地，都不需要稿子，张口即来，滔滔不绝讲半天，引经据典、条理清晰、通俗易懂、老少皆宜。回到延安之后，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的人都能听得如痴如醉，纷纷称赞王明同志是“活马列”。建国初期，王明负责起草婚姻法，一口气讲半天，啥叫出口成章？这就是。

这可不是写穿越文章，这是在制定法律啊。这种才华，放在历史上也难得一见。然而王明这种卓绝的才华仅仅表现在理论写作上，从没在实践中表现出来。没有实权却又过于招摇，肯定要完蛋的。刘少奇的理论水平也是一流，但他懂得隐藏在毛泽东身后。

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一个不懂得政治实践的政治家注定是悲催的。王明回到延安，相当于鸟飞入笼，从此天空虽阔，和他再没有关系。回延安之初，王明有过一段快乐的时光，享受过不少欢迎会，听过不少阿谀逢迎的。身为知识分子的王明感觉很好，但他被这种感觉给麻痹了。和平时代的麻痹，可以多享受一会快感愉悦，战争年代的麻痹就意味灾难来了。

在工作方面，王明起初的职位比较高，书记处书记、政治局成员、统战部长啥的，理论上还是有权力的。然而也要看谁干，王明干就比较虚。因为能干事的没人听他的话，听他话的人都是理论家，一样干不了事。后来越干越虚，虚到最后教书去了，教啥呢？教女人！一个曾经的中共一把手沦落到延安女子大学校长。延安那地方本来就没几个女人，还要喂猪砍柴抱孩子，哪有空学习啊？王校长就想把外地去延安学习的女人全部招进来。组织说，不行！还有人写信暗示王明：小心点，不要搞花样。

不仅不行，接下来没过多久，女子大学被延安大学给兼并了。王校长又成了原来的王明，有虚职，无实权，时不时要面对不友善的目光，时不时被批评。常常有人在背后说，看，这就是害我们丢了井冈山的那个家伙。

王明的最大靠山是莫斯科。然而王明回到延安之后就失去了这个靠山。因为延安和莫斯科的秘密通信系统掌握在毛泽东一个人的手里。平时是下面的人翻译，重要情报由任弼时亲自翻译。毛泽东当然不会对王明说，我和斯大林同志交换了啥意见。

失去莫斯科温暖的怀抱，政治实践能力不够强的王明成了一个赤裸羔羊，顺理成章地沦为刀俎上的鱼肉。为了改变自身处境，王明曾经改变策略，低头弯腰去称赞、吹捧毛泽东，掀起了一阵吹捧毛泽东的热潮。意思就是，我已经服气了，放过我吧，看在大家这么多年的份上，留点面子吧。

毛泽东对这种行为很受用。多年的对手终于低头了，当然很有成就感。但他绝不会心慈手软——就算心慈，也不会手软，也不能软。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特别在这么个拥有赶尽杀绝、痛打落水狗习惯的国度，政治有时候比流血的战争还要残酷。毛泽东继续追击，直到把“教条主义”、“左倾机会主义”等一系列标签彻底烙印在王明的脸上。

王明一个人是没有胜算的，然而国际派还是有很强的实力的。博古、张闻天、王稼祥、凯丰、邓发，甚至还要算上周恩来，如果这些人团结起来，毛泽东和刘少奇也没有多少办法。三七年刘少奇给张闻天写信时，就被一帮人硬生生给挡住了。就算共产国际解体了，莫斯科还在、斯大林还在。毛泽东和他的新领导班子必须得到莫斯科的支持。要不然毛泽东干嘛垄断和莫斯科联系的话语权？还不是想取代这些人在莫斯科的斯大林那里的地位！然而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

这些人都在干啥？都在争相向毛泽东靠拢！

王明说，苏维埃时代的事，是由博古直接负责的——这是在和当年的老战友博古等人划清界限。

博古呢，也在想办法改善自己的处境。此时博古的表现比王明要好。国共第二次合作之后，博古一直跟周恩来在国统区搞统战，日子还算可以。然而这种还算可以的日子在皖南事变之后就结束了。回到延安的博古必须面对延安整风。博古采取了两手措施，一是小心翼翼（躲避康生的监视）地跟苏联在延安的代表弗拉基米洛夫接触；二是全面向毛泽东缴械投降，承认自己的错误，写检讨，

歌颂毛泽东。

博古说：我们有保卫的力量，我们有八十万党员，我们有五十余万在党领导下的军队，我们有巩固的根据地，我们有二十二年的斗争经验，我们有全国人民的拥护，我们有无数身经百战的干部，最后异常重要的是我们有党的领袖、中国革命的舵手——毛泽东同志，他的方向就是我们全党的方向，也是全国人民的方向，他总是在最艰难困苦的时候领导党和人民走向胜利与光明，我们有取得胜利的一切条件。军事威胁不足以征服共产党，挑拨离间不足以分化共产党，相反，我们将更亲密地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周围，在毛泽东的旗帜下战斗并且取得胜利。

博古这么干只求一个目的——自保。他基本实现了这个目标，只是结局有点意外——和叶挺一起坠机，至今还留下一团迷雾。

张闻天原本是国际派的第三号人物。张闻天和王明是同一类人，有才，作报告的水平一流，时不时弄一大堆报告让大家学习。和王明一样，也是缺乏政治实践的能力。

刘少奇之前，毛泽东的政治合作伙伴就是张闻天。中共党史上，张闻天是一个过渡性人物。他和毛泽东合作期间，毛泽东取得对张国焘斗争的胜利。张闻天用他的才华和影响力帮助毛泽东从理论上战胜张国焘，对此毛泽东相当感激。然而张闻天必须下台，因为他的身份是总书记，党内名义上的一把手，毛泽东是终究要走上这个位置的。所以刘少奇横空出世之后，毛泽东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张闻天，说张闻天从莫斯科背回来一麻袋教条。

面对毛泽东的指责、挑剔，张闻天很郁闷，很想不通，然而他只能做两件事：一，检讨让位；二，歌颂毛泽东。张闻天做得很不错，日后工作还行。如果从此以后张闻天能够隐声，应该有一个不错的结局。然而十几年后的庐山会议上，张闻天再次成为出头鸟。

最有趣的应该是凯丰。他原本是最为坚定的国际派，对毛泽东都看不上，遵义会议上紧跟博古同志，坚定地站在毛泽东的对立面，挖苦道：“你懂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看《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打仗！”遵义会议之后仍然撂下狠话：谁输谁赢，走着瞧。二十年后，毛泽东回忆说：“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了。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如果真是如此，那毛泽东还真应该感谢凯丰。

然后凯丰很快转而支持毛泽东，在批判张国焘时相当卖力，错批了不少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之后随博古一同工作，然后一起返回延安。整风运动之初活跃过一阵子，批判王明、博古的错误路线。然而作为那个路线的一员，他自己也是跑不掉的。不过凯丰同志的结局还不错，早逝，避开了后来

历次残酷的政治运动。

其他人，如王稼祥、邓发等人表现都差不多，积极检讨，然后争相歌颂毛泽东。

王稼祥最先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说法：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邓发则写文章说：“青年们！我们究竟走‘中国之命运’的道路呢？还是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呢？我想一切有国家观念、有民族天良的热血青年，为了他的理想，为了他的人格，为了保持他那纯洁的良心，他们绝对不愿意走那法西斯黑暗统治的「中国之命运」的道路的，我相信中国青年是会选择引导中国走向独立、自由、民主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道路的。”

看看国际派这些才子们，不说还手之力，连招架之功都没有，还没过招就土崩瓦解了。他们真的如此不堪一击么？当然不是。他们不是失败了，而是投降了。失败和投降有区别么？区别不大，但还是有区别。

这些人都是第一流的人才，受过很好的教育，文化水平没得说，都是刻苦用功，且身处逆境从不当孬种。敢于在那个时代投身共产党的，就算身子看起来弱不禁风，骨头也足够硬，内心也足够强大，瞿秋白就算光辉代表，庐山上的张闻天表现也不差。也许他们的政治实践能力不怎么样，拉队伍也不见得行，但是理论水平绝对一流，骂人不吐脏字。搞辩论、政治骂战绝对不在话下，穿越回三国打嘴仗，放在江东儒生中不见得比诸葛亮差。而早期的中共政治局也是唾沫横飞，大家吃不饱穿不暖，唯有用精神代替粮食——开会。

既然开会，也就免不了口舌之争，一帮口舌强人怎么会如此惨败？答案是——不团结。

难道他们不知道团结的重要性么？当然不是。

那么为啥不团结呢？因为他们曾经团结过。

因为他们曾经团结过，失败了。曾经他们团结在莫斯科的周围，把莫斯科当成主心骨，但是惨败了。红军长征，实际上就是惨败之后的转移。

现在很多文章回忆那段往事，基本上着眼于阴谋或者利益的重新分配，忘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心理因素。

苏区惨败给那群理论家心里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他们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心中那种内在压迫，导致了一种负罪感——即对过去工作失误的一种自责。这种负罪感促使他们不是想办法联合起来迎接以毛泽东和刘少奇为首的进攻，而是试图迎合、融入这种力量，再重新开始——也就是说他们试图以毛泽东为主心骨代替原来的旧的主心骨莫斯科。

当国际派的才子们纷纷放弃原来的阵线迎合毛泽东时，并不是他们势利或者说善于见风使舵，而是需要新的主心骨。

没有主心骨就干不了事——这正是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千百年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没有从政治的圈子里走出来，所以没有科学精神的兴起、没有技术思想的发酵、文化缺少精确性，只是一个又一个的王朝更迭。

所以在每一个王朝末年，或者说每一个乱世，都有一片知识分子在哀嚎，不是他们懦弱没种（如文天祥），而是没有主心骨来推动他们。国际派的那些人就是这样，离开莫斯科后需要新的主心骨，和所有人一样，他们选择了毛泽东。没等毛泽东进攻，他们便纷纷举手投降。于是他们在这场造神运动中扮演了殉难者的角色。

然而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还不是知识分子寻找主心骨的代表。

（六）神座下的伤员——周恩来

前面说过，王明等国际派知识分子在寻找自己的主心骨的过程中土崩瓦解，但他们并不是知识分子寻找主心骨的代表人物。

代表人物是周恩来。

周恩来和王明他们不一样，他的实干能力远胜国际派中任何一位，他的实力也远胜国际派中任何一位。和周恩来比起来，国际派的才子们更像未成熟的义气书生。

周恩来从来没有成为当年最大的那一个，然而在毛泽东之前，他比任何一位党内负责人的能量都大。从陈独秀，到瞿秋白，到向忠发，到王明，到博古，做重大决定之前都要仔细倾听周恩来的意见。因为周恩来不仅仅是中央委员（中共六大开始），更重要的是拥有极为广泛的人脉关系，以及其他人不具备的能力。

周恩来是旅欧派核心，那一批人包括邓小平、李立三、王若飞、蔡和森、李富春、赵世炎、向警予、李维汉等人。这批人包含了共产党各个时期的风云人物。后来邓小平回忆说，周恩来像兄长一样关怀过他，大概就是指法国勤工俭学那时候吧。

在法国，周恩来还干了另外一件事——介绍朱德入党。朱德生于一八八六年，打过很多仗，打来打去觉得没意思，想找一个能托付一辈子的组织。朱德出身旧军阀，要选择一个组织，当时就是一个难题，要么国民党，要么共产党。已过而立之年的朱德决定选择共产党。做了决定之后就开始满世界地找党组织，找了一圈之后终于在上海找到了大名鼎鼎的陈独秀同志。两人一番客套之后进入正题。陈独秀对朱德相当不感冒，说你是旧军阀出身，没资格加入共产党。当时的共产党还是比

较弱小的组织，文斗事业刚刚起步，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拥有军队。而朱德这种军官，跟陈独秀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朱德很郁闷，去了欧洲，碰见周恩来才美梦成真。此时朱德三十六岁，周恩来二十四岁。朱德是什么人不用多说了吧？战争年代的朱德可是一个巨大的象征——连毛泽东都不敢轻易触碰的象征。

周恩来还有一个身份——中共情报之父，周恩来亲自组织并领导了特科。这个机关有多重要，打个比方说吧，当年顾顺章叛变，想要把中共中央一网打尽。顾顺章是什么人？早期的工运领导兼特工领导，了解中共高层的全部内情。然而这种事并没有发生，因为国民党的中统头子叫徐恩曾，而徐恩曾有个得力秘书叫钱壮飞，钱壮飞是周恩来的人。顾顺章还没有被押解回南京，钱壮飞已经到上海报告了。

可以说没有这个机构就没有中共中央那些人，这个组织可以把触角伸到蒋介石的司令部。当年胡宗南带领精兵二十万进攻延安，延安仅有彭德怀指挥的两万解放军。但是两万人的军队可以牵着二十万人的军队的鼻子走，最后战而胜之，除了一大堆早已熟知的原因外，还有一个人也应该铭记。他叫熊向晖，是胡宗南最为器重的秘书，同时他的另一层身份是共产党特工，和周恩来直接联络。毛泽东说熊向晖一个人顶几个师。

十大元帅中，聂荣臻有过情报工作的经历；十大将军中，陈赓本身就是极其出色的特工情报领导。周恩来手中最为出色的特工，号称“情报之王”的李克农上将一直负责情报部门。几乎所有的敏感信息，周恩来都能第一时间拿到手。

周恩来的军方背景极其不平凡。国共合作期间，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政治部主任就是周恩来，周恩来的副手则是叶剑英。那个时候，未来的十大元帅在哪里？彭德怀还没认识段德昌，贺龙还在当军阀，刘伯承在还川军当中，徐向前还是一个数学不咋地，且不爱说话的学生，林彪更是害羞得厉害。

黄埔出身的中共将帅有多少就不用介绍了吧？光元帅就有徐向前和林彪，算上教官聂荣臻和副主任叶剑英，就有四个。死去的那些，包括蒋先云、黄公略、段德昌、左权、刘志丹等人，每一个都大名鼎鼎。后面还有陈赓等人，就不说了，他们都是周恩来在军内的根基。

周恩来进入苏区之后，出色地指挥过第四次反围剿斗争，赢得军方的支持，军方的人脉和资源得到积累。长征途中，以及西安事变、国共合作，周恩来都是主角。这样一个人物，以素质而论，成为一派领袖没有任何问题，然而周恩来好像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成为领袖。不说党内一把手，第二位都不沾。

纵观周恩来的一生，都是辅佐别人。辅佐毛泽东之前，他辅佐过陈独秀、蒋介石、瞿秋白、王明等人。无论遇到怎么艰辛的环境，周恩来总能平静度过。无论在怎样的顺境，周恩来总是不会，

甚至不愿意成为领袖，他好像不愿意出头和蒋介石的国民党争夺天下。

如果从历史上寻找模板，周恩来应该是张良或诸葛亮那样的人物，总是在兢兢业业地做事，在等待领袖人物的出现，等待他的主心骨。终于他等到了毛泽东，他决定服从毛泽东，协助毛泽东和蒋介石斗。

遵义会议上大家商定，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三人团，代替旧的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周恩来作为党代表在军事上享有最后决定权。也就是说，让毛泽东名义上辅佐周恩来。几个月之后，角色就对调了过来，变成周恩来辅佐毛泽东。那几个月是周恩来最接近领袖地位的时候，他放弃了——主动或被迫只有当事人才晓得。

就算周恩来已经拿毛泽东为领导，但是对毛泽东来说，这个实力派部下的经历太复杂了，需要仔细考核——至少要敲打一番，表明自己的权威。

四零年开始，周恩来远离延安本土，一直在重庆搞统战。三年之后，即四三年七月十六号，回到延安，正赶上抢救运动的高峰。前一天，也就是七月十五号，康生同志刚刚投以巨大的精力和才华完成人生的巅峰作品——《抢救失足者》，抢救失足者的运动随即展开。在这场运动中，所有出外归来的人基本上都是特务或者有特务嫌疑。

周恩来一出场，立刻成为一个巨大的猎物。康生等人看见周恩来回，如同豺狼看见羔羊，顿时双眼发光，喜悦之情暗藏心头。这可是一条大鱼啊，如果成功，轰动效应将不下于魏忠贤消灭东林党，自己的这块牌子可就算亮起来了。

康生等人很快发现，要找周恩来的茬实在太容易了。此人和陈独秀、蒋介石、王明、博古这些延安的臭石头紧密合作过，而且至今依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周恩来同志在井冈山上还曾批判过毛泽东。按照计划，随便弄点材料不在话下。然而康生同志很快又发现，周恩来只不过看上去像羔羊，实际上是大象，一头豺狼永远可望而不可即的大象。尽管周恩来的经历如此复杂，要弄材料太不容易了。周恩来的人脉太广了，人缘太好了，让同是干过特科的康生羡慕嫉妒恨到牙痒。

然而康生倒不必生气，因为他和周恩来的差距是全方位的，行动能力、人脉、阅历、乃至相貌，周恩来都甩了康生好几条街。康生唯一胜过周恩来的是书画功底和文物鉴别，这些对整人没用。

周恩来和毛泽东之间的真实关系，康生根本无法正确评估，甚至并不了解。周恩来反对过毛泽东，但同样支持过毛泽东。毛泽东虽然想周恩来臣服，同样需要周恩来的支持。在这点上，周恩来很清楚。举个例子，在重庆时，周恩来的父亲过世了。当时周恩来正在住院，邓颖超和董必武等人为周恩来的身体着想就没把消息告诉周恩来。三天之后，周恩来在医院得知真相，大哭一场，同时把董必武和邓颖超等人啰嗦了一顿。接下来周恩来做的，就是把情况打电报告诉延安的毛泽东。也就是说，不论什么事，周恩来总是第一时间呈报毛泽东。对毛泽东的尊崇，或者说这份政治敏感性，

康生有这水平么？

周恩来的行动很敏捷，信息来源广泛，就算人不在延安，延安发生的一切他也知道——并且知道该怎么应对。

周恩来的应对措施可谓天衣无缝：第一步就是加入到颂扬毛泽东的合唱队中。在延安中央办公厅欢迎他的招待会上立刻做如下表态：“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者整个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慷慨激昂，感染力很强。

虽然毛泽东对这一类的乐章已经习惯了，但周恩来的表态依然与众不同。并不是说周恩来的言语上有什么创新，而是由实力决定的。就政治实力而言，当时的周恩来远胜羽翼未丰的刘少奇，是毛泽东之外最具实力的人。周恩来的表态，给其他老干部做了一个示范。周恩来不仅仅表态，而且身体力行。此后毛泽东发表讲话，周恩来总是坐在第一排中间，和毛泽东面对面的地方，倾听毛泽东的讲话，神色庄重、态度端正、一丝不苟地做记录，俨然以学生自居——这是应对措施的第二步。

在这点上，周恩来的表现远胜国际派的理论家们。王明他们只是承认错了，却没有用行动表达出来。批判会也不参加，躲在病房里不出来。这就是理论家和真正的政治家的差距。即使毛泽东再苛刻，也挑不出刺来。何况毛泽东还要指望周恩来的全力支持。没有周恩来的支持，毛泽东要统一政令的难度是不可想象的。

第三步：周恩来还抓住机会向刘少奇表达敬意，说自己在白区工作时期暴露了不少问题，而刘少奇同志才是正确的。此时的刘少奇还没有定性为白区路线的正确代表，周恩来已经看到了结果，并顺水推舟做了人情。面对如此强人，康生等人再狠，也只能徒呼奈何。

像康生这种只能对付内部同志的同志，能力虽然很强，那也要看和谁比。和周恩来相比还是处于幼稚阶段。周恩来是谁啊？周旋于重庆和莫斯科之间游刃有余的人物，而康生同志的整人技术连延安都出不了。

光低头或者表达敬意是无法过关的，要过关还需要深刻的自我检讨。其实从毛泽东的角度讲，周恩来做到这些已经差不多了，毕竟同样位高权重、人脉资源极其丰富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也没有触及到。说到底，他需要实力强大的周恩来的支持，为何要对周恩来紧追不舍？

问题还是出在刘少奇的身上。延安整风之后，刘少奇主导党务的格局已经初现。然而不论何时何地，任何集体，要提拔某个人，首先需要成绩。领导无法让人信服，后台无法让人信服，只有成绩才能让人信服。要把实力不是那么雄厚的刘少奇拉到党内至高无上的地位，必须拿出足够的成绩。

刘少奇没有指挥过军队，只有白区工作经验。

要让一个只有白区工作经验的人上来，必须强调白区成绩。在之前那些工运领袖纷纷犯错误的情况下，要扶正刘少奇为白区的正确代表，就需要解决周恩来的问题。

周恩来的问题就是白区工作的功劳不比刘少奇小。

既然如此，直接选择周恩来为白区路线的正确代表得了，比扶正刘少奇简单很多。初看起来是这样，事实完全不是那回事。首先周恩来的性格比较中庸柔和，亲和能力超强，组织水平一流，跟谁都能合得来。让他去挑战张闻天，去消灭国际派是不可能的。倒是国际派分裂，让他去团结协调还差不多。如果博古还是一把手，他就会和博古合作；王明还是一把手，他就会和王明合作。让他像刘少奇那般去造神也不太可能。造神意味着要和别人开火战斗，周恩来干不来这事，和他的性格不符。就算他决定死心塌地跟随毛泽东，也不会主动掀起猛烈斗争。在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就能看出来，就算迫不得已参加批斗会，批斗别人之前必然先做自我批评。毛泽东晚年评价周恩来：爱和稀泥。

其实不是周恩来爱和稀泥，是性格决定的——还是性格决定一切。

另外一个问题是，扶正周恩来为党内二把手固然容易，然而周恩来本身已经树大根深，无须依靠毛泽东也能活得很好。不管谁当一把手，周恩来只要配合就行了。刘少奇不同，刘少奇在军内没有根基，要想在党内立足，必须依靠毛泽东。这样毛泽东就可以紧紧地把手抓在手里，以党的名义指挥枪，名正言顺。

要扶正刘少奇，就要清算周恩来在白区的工作，降低他的成绩和威信。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自己做深刻检讨，说出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把那长篇大论的检讨翻译过来，大概意思是，周恩来亲口说他很笨蛋、干了笨蛋才干的事、要向其他同志学习云云。就算缺点和错误不够，他自己也得想办法，增加缺点和错误的数量和质量。总之一句话，白区工作干得最好的是刘少奇同志。

周恩来违心检讨，受了伤害，但并不致命，因此他只能算是神座下的一个伤兵。这个伤兵很快恢复了力量，重新投入战斗。因为他是超级战士，活动能力极强，恢复能力极强。周恩来一生检讨无数，每一次都能顺利过关，皆因他那融合的躯干里蕴含着惊人的力量。

至于想要公开批判周恩来的康生同志，本身就是一个笑话，和十几年之后盛传柯庆施要当总理一样是个笑话。之所以说是笑话，只因为康生或柯庆施等人的能力和周恩来相比差距过大。不是毛泽东偏爱周恩来，而是由周恩来自身的实力决定的。另外周恩来通过自己的检讨保住了一大片的自己人，比如说陈赓，虽然反对过批判王明，却也没怎么样。

整风整到最后，莫斯科都看不下去了，觉得过火，对王明和周恩来表示关注。虽然共产国际不

在了，中国共产党依然离不开莫斯科。特别是随着二战行将结束，斯大林的权势和威望逼近历史巅峰，尚处在荒凉延安的毛泽东绝不可能对他的声音听而不闻。

然而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周恩来的命运还不是最尴尬的，最尴尬的是军方。

（七）神座下的英雄——将军们

在延安整风中，军队统帅们的处境最为尴尬。

军队是毛泽东的命根子。没有军队就没有井冈山，换句话说，没有军队就没有毛泽东。军方将领们在前方拼死拼活打仗，在党内很少有发言权。

当毛泽东一方面论证枪杆子里出政权，另一方面又在坚定地执行党领导军。看似矛盾，实则高明之至。通过枪杆子出政权的论断，逼迫其他政治家就范。延安整风中的理论家们如果手中掌控军队，毛泽东还敢发起整风运动么？另一方面，他又不把自己归入军方，而是通过党领导军打压军方将领。

这大概是中国五千年用人之精华吧。

既然要整风，光整党、整政治人物是没啥用的，关键要把军队捏成一团。毕竟那是战争岁月，政治家说得天花乱坠都没用，消灭不了一个敌人。如果无法在主要业务——军事——上取得成就，花言巧语很快就会变成恶毒攻击，王明、博古的遭遇就会轮到毛泽东。这点他非常明白，因此要大力气整军。

整军，是一门技术活。整得不好，要出乱子的。那群人可不管左还是右，马列主义中的内涵他们也不知道。不能让老子信服，休想让老子卖命。既要保证不损害军人的战斗力，又要把全军捏合成一个整体，统一在一种思想之下，难度非常高。斯大林清洗红军的伤害依然历历在目，清洗这条路肯定是走不通了，何况八路军当时的处境已经很不妙了，搁不住清洗。

这种高难度技术活，在别人那里也许很难，但难不倒毛泽东。

怎么整呢？首先朱德不能动。因为长期以来的宣传，朱毛作为一体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动朱德，可能造成八路军震动，进而影响整体作战实力。

那就整下边的人吧。林彪刚从苏联回来，又是嫡系，用不着整。罗荣桓一直跟随毛泽东，且为人低调朴素，政治过关。叶剑英和聂荣臻等参谋型人物，倾向于政治，且和周恩来关系密切。周恩来的个人检讨，某种意义上遮住了两人人，只要政治上稍微触及一点就行了。

后来的十大元帅中，个性最为鲁莽的是贺龙元帅。然而贺龙元帅口直心快，但紧紧配合毛泽东批判张国焘，双方比较了解。当年毛泽东娶江青，很多人反对，唯有贺龙大声说：“堂堂一个党主

席，讨个女人有什么了不起？谁再议论我枪毙了他！”豪情不减呵！让人感叹的是，多年后，贺龙因对文化大革命的热情不够赔了性命。

刘伯承当年在井冈山时代反对过毛泽东，但之后的岁月里刘伯承对毛泽东表达了崇高的敬意。同时刘伯承是军内唯一一个可以和国际派扯上关系的高级将领，要想隔断国际派的军内实力，必须把刘伯承和他们划分开。最为重要的是，当下是用人之际，刘伯承低调、有才华，且并不在十分要害的位置上。

徐向前的情况和刘伯承差不多。徐向前追随过张国焘，且有西征失败的污点。然而作为红四军的代表人物，拉出去整，必然又翻出当年的旧账。毛泽东应该清楚记得，当年因张国焘叛变，处理范围扩大，差点造成红四军官逃跑的事，其中还传言许世友要杀毛泽东的趣闻。此时的徐向前行事极为低调，让休养就休养，让上前线就上前线，毫无怨言，且不和老部下来往。如果这样的人也拉出来整风，那么整个军方都要从上到下整一遍，毛泽东也别想有好日子过。

在战争年代，毛泽东用人有一个风格，就是把政治对手打掉之后，再把对方的某个军人提出来当代表，也就是所谓的恩威并施。施恩于将军，雷霆之怒劈向政治家。刘伯承和徐向前就是这种风格的典型见证。

要什么样的人才符合标准呢？军内有实权，手无实权且不懂得收敛服从的人。当时中共有两支队伍，八路军和新四军。对照这个标准，八路军中最合适的对象是彭德怀。而新四军么，项英本来是天然选择，项英死后，只能是陈毅了。

所以彭德怀和陈毅就成了军方要整顿的对象。有了这两个人物做代表，触及到军方皮肉而不伤及筋骨，再好没有了。

彭德怀和毛泽东的关系，前面已经说了很多，归纳起来一个词——爱恨交织。

在长征的过程中，彭德怀因为坚定支持毛泽东，有大恩，之后又有许多磕磕绊绊。

后人研究彭毛两人关系时，多半着眼于彭德怀的个性倔强，认为彭德怀倔强的个性经常触碰到毛泽东的神经。这种说法也不能说没有道理。然而比较一下林彪就会发现，彭德怀触碰毛泽东神经的次数没有林彪多。井冈山时代，林彪怀疑红旗还能打多久；会理会议，林彪让毛泽东放弃军事搞政治去；到了延安那会，林彪还要去陕南打游击；在东北对毛泽东先斩后奏。这都是原则性的违逆，毛泽东都忍了。林彪个性就不倔强？当然倔，而且不输彭德怀。彭德怀性格中最为毛泽东不容的，是那种“独立性”。林彪也倔，但是在立场上选择紧跟毛泽东，即使常常让毛泽东不爽，但关键时刻总是站在毛泽东这一边，从未变过。彭德怀的独立性，使得彭德怀虽然极为尊崇毛泽东，并不对毛泽东亦步亦趋，百团大战，认为该打就打；庐山上，认为该写信就写信。

彭德怀身上的这种独立性，让他有别于其他将帅。正因如此，彭德怀的一生都与众不同。别的将领只顾打仗，彭德怀除了打仗还关心其它事，彭德怀曾经给毛泽东发电报讨论日后建国的课题：国民党有长期的历史影响，且有一定社会基础，战后我党与国民党的斗争仍是长期的。战后中国人民的政治动向是“自主自由”、“和平建国”，谁能满足这一愿望，谁将取得最后的胜利。这封电报的时间是一九四二年——那时还没看到抗战的希望。

彭德怀认为中共应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制度，在人与人之间发扬互爱、互敬、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把自由、平等、博爱成为合法的东西。目前则要进行“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教育，灌输科学精神，反对封建迷信。这些建议看起来非常好，然而在毛泽东看来，这不是军人该干的事。此外彭德怀还关心很多事，比如说妇女问题，比如说商店问题，比如说教育问题。

毛泽东要整顿八路军，没有比彭德怀更合适的目标了。彭德怀的职位是八路军副总司令，在总司令朱德很少参与前线指挥的情况下，副总司令掌握实际指挥权。他也不负众望，打出了百团大战那样的战役。打击这样一个人，可以震慑其他军人。你们有彭德怀牛么？没有。那就好好听党的话吧，牛叉的彭德怀刚刚被党棒敲了脑袋。

而且彭德怀此人心高气傲，有时很蛮横，不仅不去笼络人心，还得罪了不少人。敲打他，可以拉不少帮手，特别是搞政务党务的同志。因为彭德怀不大看得起搞政治的人，比如说阴狠毒辣的康生同志，比如说说起话来滔滔不绝的刘少奇同志。在他看来，这些动舌头、动嘴、动笔的先生们的作用不大，只是毛泽东身边一群搞文件的而已。别人对康生敬畏如虎，彭德怀看他充其量是一只狐，——毛泽东身边的一只狐。

好吧，彭德怀同志，那就让你尝尝他们的火力，有时候舌头也能伤人。战场上威风凛凛的大将军，在笔杆子那里可以成为叛国者。

要彭德怀低头表态不难，因为彭德怀对毛泽东本来就非常钦佩。在颂扬毛泽东的合唱团里头，也有彭德怀的声音。彭德怀写过这样的文章：“毛泽东同志在抗战的几年中，对于理论上的伟大贡献，有持久战的理论和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新民主主义论’就是辉煌的杰作……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既不混同于旧三民主义，又不混同于假空喊社会主义，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地提出于中国目前的具体环境及历史阶段，成为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指针。”这就是彭德怀，就连颂扬都与众不同。

然而整彭德怀的目的并非整治他一个人，而是震慑其他人。彭德怀这种人，不会因为一次整风就改变其独立的个性，要不然也不会出现庐山那一幕。

彭德怀又非常强硬，偏偏不认输。于是就出现这样一幕，一大堆理论家对一个军人喷口水、扔板砖。他们不是和彭德怀比贡献，也不谈战争，而是在清算。

甲说：你说说你个彭德怀，整天板着脸，见人也不笑笑，也不交交心，即使吹吹牛也好啊，怎么能整天板着脸呢，你还拿我们当同志么？你这个人对待同志的态度就不对。——这是态度问题。暗示彭德怀不会做人。

乙说：你口口声声说自由、平等、博爱，那是资产阶级的那一套。资产阶级都是唯利是图的，你说你当年投身革命有没有“入股”的嫌疑？恐怕是有吧。你沾了伟大的毛主席的光知道么？有了毛主席才有你的成就。然而你呢，你看你的名字起得就不对，原来不是叫彭德华么？德华，得到中华也，和毛主席争天下么？因为伟大的毛主席是要赢得天下的。你看你多阴险，简直是太阴险了。你知道错吗？——质疑革命动机，增添莫须有罪名。

丙说：现在来谈谈百团大战的问题。如果不是你不请示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擅自发动战争，鬼子进村的次数也许就不会增加。假设你运用伟大的毛主席的伟大战术，可能就是另一个结果。要不是你的骄傲自大，损失或许会少点。都是你的错，你知道吗？——质疑百团大战，彭德怀迄今为止指挥过的最具影响力的战争，唯有如此才能打击彭德怀的威望。

丁说：彭德怀同志啊，我们也不想怎么着你，就想帮助你改变错误，你还是赶快认错吧。如果你不认错，我们会帮助你，直到你发现自己的错误，承认自己的错误为止。我们相信在我们的帮助下你会认识错误的，因为我们是伟大的毛主席的学生。伟大的毛主席是战无不胜的，你拒绝我们的帮助就是拒绝伟大的毛主席，就是……

如此这般前后持续了 43 天，战斗过程异常激烈，陈芝麻、烂西瓜全部翻出来，一遍又一遍，白天太阳晒，晚上让风吹。言语中出现很多如果、假设、大概、可能、差不多之类不确定性的词语。如同一群苍蝇围着一头狮子嗡嗡乱叫，搞得彭德怀的头都大了，最后烦得不行，表态说，爱咋地咋地吧！

理论家们终于长出一口气：总算给彭德怀打倒了！

然而没多久，他们就傻眼了，因为彭德怀又复起了。那些批判他的人见了这种情况换了一副笑脸，点头哈腰，三句话不离彭老总，这样一点头就是十五年。十五年之后的庐山，彭德怀再次成为批判对象，再没能复起。原因很简单，没战争了。

延安整风之后的彭德怀得以复出要感谢蒋介石同志，蒋介石的拳头胡宗南伸向了延安。胡宗南是什么人呢？也没有三头六臂，只是不可能被舌头打败。那帮善于用舌头的人对胡宗南毫无办法，因此彭德怀只好复出了。通过这一番折腾，大家各干各的活，唯有毛泽东彻底、完全地控制了八路军。

如果说对彭德怀猛烈开火四十三天是为了敲打八路军其他将领，那么对陈毅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和整天板着一张脸得罪人无数的彭德怀不一样，陈毅的情商非常高，统战、组织、搞政治样样

都行，见人哈哈一笑，有话直说，人缘甚好；再加上能诗善文，很有儒将的味道。历史告诉我们，这种人深得文人的喜欢，大后方做资料的那帮同志对陈毅的感觉都不错。一言蔽之，陈毅同志人缘很好。

人缘老好的陈毅同志不幸沦为被整的典型，并非他本人怎么样，而是因为他所在的团队——新四军——有问题。

（八）命途多舛的新四军

和八路军不一样，直到延安整风之前，毛泽东都没有真正掌控新四军。

新四军又称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成立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二号，由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而成。叶挺任军长，长期不在新四军军部，大权掌握在副军长兼政委的项英手中。项英的身份还是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东南局书记。

另外，项英还有一层身份——毛泽东的主要政治对手之一。

项英，湖北武昌人，生于一八九八年，和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等人同年。早年项英和刘少奇的经历类似，一九二二年入党（和刘少奇同年入党），随即参与文斗事业，并成长为早期的工人运动领袖。巅峰时期的项英，在工运届可是鼎鼎大名，曾任武汉工人纠察队总队长。在武斗之前，工人纠察队已经是共产党人最强大的力量了。从第三届中共代表大会开始，项英就是中央委员，势头比刘少奇还猛。

大革命失败之后干了一段时间地下党，中间又干了一系列职务。然后进入苏区，军事上项英代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如果各位不知道这个职位有多高，请参照副主席的人选，副主席是毛泽东和朱德。之前的朱德和之后的毛泽东都干过这个职位。政治上项英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仍然是毛泽东的领导。

项英虽然成了毛泽东的领导，和毛泽东却不是一路人。事实上毛泽东不可能和任何领导走到一起，因为他自己要做最大的那个领导。项英和博古、李德的关系紧密，和毛泽东好像是天生的对头。凡是毛泽东不爽的事，总有项英的身影。

富田事变时，项英狠狠地批判了毛泽东。

宁都会议上，项英和后方局的同志一道把毛泽东轰下台。毛泽东一辈子从未输得如此彻底。可以说毛泽东在井冈山的落寞，很大程度上是拜项英所赐。

毛泽东虽然下台了，始终是博古等人的一个心病。如何安排毛泽东呢？很难办。博古、李德曾经想让毛泽东去苏联养病，没成。如果愿望实现了，历史将改写。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牵扯到这样一个问题，谁留守善后。国际派中能担当此重任的好像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周恩来，另一个就是项英了，其他人都是理论家，留下来死路一条。刘伯承的军事能力可以，但政治能力从没表现出来。周恩来好像不可能留下来，只有把项英留下来了。

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不可能把所有人都转移干净。还有那些老弱病残带不走的，只能留下来。还需要一批队伍留下来掩护中央，项英留下来领导这些人打游击，可谓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也。这件事证明项英是一个可以独当一面的人——事实确实如此。

准备留守的项英依然不忘老对头毛泽东。长征之前项英对李德说，让毛泽东也留下来，如同瞿秋白一样，留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好管一点。项英认为，在战略转移阶段，毛泽东可能利用自己的威望号召追随者重新夺权，到时候书生博古和老外李德都没办法。

不得不佩服，项英的眼光毒辣啊。如果其他人有项英这本事，国际派不见得输得如此稀里哗啦。

李德认为有道理，考虑让毛泽东留下来。如果毛泽东留下来，历史也将改写。然而博古另有顾虑。博古认为既然毛泽东当年能在一片荒凉的井冈山能弄出苏区最大的根据地，现在手中有兵有将（虽然很菜）的情况下，东山再起的机会非常大，还不如带走，在自己的眼皮底下也不见得能耍啥花样。看看，对内斗争都如此残酷，都啥时候了还想着算计。这个结局预示着，日后毛泽东要走上前台必须采取更为严厉的斗争手段。

现在设想一下，如果毛泽东没有参加长征，留在井冈山会怎么样。结局有两个，要么当瞿秋白第二，要么再次腾飞。第二个可能性倒是大一点。项英都能在残酷的游击战中生存下来，作为游击战的宗师，毛泽东自然不比项英差。以毛泽东的水平和当时险恶的形势，毛泽东很可能拿下项英。如果项英和毛泽东摊牌，作为另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陈毅很可能倒向毛泽东。倒是中央军悬了，没有毛泽东肯定到不了陕北，至于能不能冲到湘西也是未知数。即使冲到湘西，国际派的才子们估计逃不掉张国焘的清算。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啊！周恩来应该能和张国焘合作得很好，那样张国焘和陈浩昌将会有有一个大大的结局。如果张国焘把军权放给徐向前，也许在湘西能站得住。彭德怀和林彪恐怕就没有后来的风光了。后来西安事变也就没了，国共合作也就没了……都是假设，都是浮云，言归正传。

项英留下来，是代表博古、李德留下来的。应该说项英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人，准确预言了博古、李德的遭遇。然而他对此已经无能为力，他能做的就是保命，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剩下的虽然理论不足，却完全听从项英的调遣。这一次他干得不错。在红军主力转移之后，项英的军事才华上升到一个新境界。老实说项英代理军委主席那段时间，干得并不怎么样，恰好赶上战略大溃败。不过也不能因此埋怨项英，因为他从未真正控制军队。

站在今天往回看，井冈山时期的国际派中，除了周恩来，就数项英、刘伯承了。周恩来只能算

是合作者，并不是正統的莫斯科派。真正的国际派中，能文能武的人只有项英一个。

中央军转移之后，项英放弃了所谓的正规战，抄起了政敌毛泽东的压箱绝学——游击战，玩起来有模有样。留下的红军向各地分散，经历了最残酷的考验。三年之后，这些人从山沟沟里爬出来组成了新四军。项英最光荣的称号应该是——新四军之父。

当博古等人在遵义会议失败之后，当周恩来选择和毛泽东合作之后，项英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把新四军紧紧攥在手里。而项英和毛泽东的关系，基本上是难以调和的。两人分居南北，彼此看着对方，心里都不是滋味。通过游击战成功的项英，更加了解毛泽东的能耐。毛泽东看着如此有才的项英却不能为其所用，看着生龙活虎的新四军不能掌控，心里那叫一个酸。如果项英处在刘少奇的位置上，军功、政绩都有，推上前台应该容易很多吧。可惜！

毛泽东为了限制项英，派刘少奇去管理江北的地盘。项英因为忌惮毛泽东，和刘少奇、叶挺也不太合作。这样多方面的矛盾下来，结果只有瞻前顾后，彼此消耗，叶挺等人的军事才华也无处发挥。叶挺是一个理想派，比较纯粹的军人，平生很少卷入政治斗争。

然而项英万万想不到的是，他和毛泽东的芥蒂不仅葬送了皖南山区八千好汉，还葬送了自己，更把整个国际派的理论家们给葬送得干干净净。

行文所限，皖南事变的过程及其若干疑点就放在后面的篇章了。皖南事变的大致过程就是，在皖南丛林中，在外敌压迫、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八千中国好男儿送了命。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精英，经过血与火的考验，原本可以在战场上给鬼子以重创的，却因为党派矛盾以及党内领导人的矛盾丧命于同胞的枪口之下。

江南新四军的主力基本上全军覆没。一代英豪叶挺一心报国，最终却落得个壮志未酬，而且结局很窝囊；文武双全的项英身死魂灭；整个久经考验的干部队伍烟消云散。国共双方葬送掉那么多的健儿郎。可以这么说，皖南事变是咱们这个善于内斗的民族一次劣根性的集中爆发，是民族的耻辱。中国人没有胜利者，胜利者是日本鬼子。

皖南事变直接推动了延安整风的进程。在皖南事变之前，国际派还有项英这么一支力量，还可以借此说明之前的路线并无太大问题，你看项英他们不是干得很好么？事变之后国际派只剩下一帮理论家了。本土派可以指着国际派的鼻子说：看看，你们干的好事，你们右倾，你们投降，苏区丢了，新四军又丢了，现在还有啥话讲？

国际派当然没话讲。人都死光了还讲啥？讲也没人听啊。正如当年的张国焘同志南进失败再北上，也就失去了话语权。正如徐向前西征失败回到延安，能做的只能沉默不语。

项英死了，延安整风的最后一个障碍没了。项英没了，需要整修理的对象也没有了。毛泽东要

控制新四军，必须对新四军重新进行一次人事安排。

皖南事变之后，刘少奇去整理过一阵子。然而毛泽东不能指望通过刘少奇控制新四军。刘少奇留下饶漱石，以为饶漱石是自己人，然而饶漱石心中另有打算。一番折腾之后，陈毅自然地成了新四军的代言人，而毛泽东和陈毅也存在芥蒂。

项英把毛泽东赶下台，陈毅也曾把毛泽东赶下台。

项英是和中央配合把毛泽东赶下台的，陈毅则是单枪匹马，发动袭击把毛泽东赶下台。

项英赶毛泽东下台时好歹是毛泽东的领导，陈毅赶毛泽东下台时是毛泽东的下属。

虽然事后陈毅亲自把毛泽东请回来，解释说一切都是误会。但毛泽东心中还是留有芥蒂的，时不时翻出往事，敲打陈毅一番。此后陈毅也担心了好一阵子，特别是清洗“AB团”那会，陈毅可是非常地担惊受怕。

日后陈毅很注意和毛泽东搞好关系，时不时写点诗歌寄给毛泽东，请主席品评指点。也许陈毅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消减毛泽东的怒火，但是延安整风运动是另外一回事，毛泽东除了要清理掉华而不实的国际派，另一个目的就是要彻底掌控新四军。要掌控新四军，就要对陈毅做一个巧妙的处理。

在整个整风过程中，如果说对彭德怀打的是刚猛罗汉拳，那么对陈毅使用的则是太极。

（九）陈毅的困局

十大元帅当中，唯有陈毅没有参加长征。不是他不想，而是不能。

战略转移阶段，大家都认为离开比留下来活命的概率更大。从心理上讲，陈毅也想参加长征。像陈毅这种上层领导理应随大队人马转移的，然而陈毅最终还是留了下来。

陈毅留下来的理由有两个，一个是伤病。当时陈毅的大腿内部还残留着几块弹片，肿得像水桶。战略转移前夜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刚刚做完手术。因为缺药，只是用南瓜捣烂了当药涂抹在伤口。部队转移之后，陈毅的大腿溃烂到骨头，眼看腿保不住了，陈毅显示了强悍的一面：让警卫员用绳把腿绑在大树干上，用刺刀割烂肉。警卫员下不了手，陈毅自己动手，生生地割掉烂肉。接下来马克思显灵：腿保住了。

大家习惯了陈毅的大大咧咧、吟诗写字或着放炮，很少在意他的硬汉本质。所以说那一代人都很有种。因为都有种，斗争起来就显得格外残酷。像现在某些娘娘腔，伤风感冒这点小病都要跟好几个人诉苦好几天的人，别说搞革命，当汉奸估计都不行。

然而伤病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当时的中央领导都像搬家一样，锅碗瓢盆几大车，带一个伤员走，虽然困难，应该也能带。过草地的时候，周恩来就是被肖劲光和陈赓带人抬出去的。

战略转移之前，哪个人要走，哪个人要留下，都是组织计划好的。所谓组织，真正的决策者只是中央三人组，主要是博古。比方说留下瞿秋白，纯粹是当包袱想扔掉。比方说留下项英，代替博古、李德善后。留下陈毅为何呢？需要追溯一番。

现在很多人认为，当年毛泽东失势，毛派人物跟着倒霉。陈毅因为没参加长征，算倒霉了。所以认为陈毅是毛泽东的人，毛派。此言甚虚。

南昌起义之后，陈毅辅佐朱德重整队伍上井冈山，井冈山上遇见毛泽东。实际上陈毅和周恩来的关系最为密切，如果要算派，应该是周派。

从性格上看，陈毅和毛泽东有很多的相似点，都属于豪放派，有点给人以放浪不羁的感觉。因此判断陈毅更愿意接受毛泽东的领导那就错了。豪放派的人一般都不大喜欢强势的领导，而毛泽东恰好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人，而周恩来的领导方式则比较温和。

站在当年陈毅的立场上看，周恩来的地位比毛泽东高；周恩来比毛泽东更温和；认识周恩来的时间比认识毛泽东更早，第一次上岗（南昌起义）就是在周恩来的指挥下干的。陈毅倾向于周恩来是很正常的。所以长征开始时，陈毅孤零零地躺在那里，只有周恩来向他告别。

当时中央的最高领导是三个人：博古、李德、周恩来，号称老三人团。

三人团中，李德是个外来户，只能依靠博古。博古、李德是一体的，周恩来属于合作者。周恩来一直是个合作者，谁当一把手就跟谁合作。由于他能力突出，实力强大，每个一把手都需要和周恩来合作。

博古留下陈毅应该是考虑到三个因素。伤病姑且算一个吧。另一个原因就是陈毅是老井冈山。博古、李德面对的最大阻力就是老井冈山，因此老井冈山能少一个就少一个吧，差一点连毛泽东都丢下了。另一个原因就是陈毅是周恩来的人。博古想削弱周恩来的力量，毕竟周恩来只是合作者，并非自己人，只有削弱合作者的力量，才能增加自己的话语权。

陈毅是走是留，决定权并不在周恩来手上。但周恩来的心情应该挺复杂的。在当时的情况下，留下来意味着危险系数增加，特别是陈毅伤情严重。然而陈毅留下来，对周恩来而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也许在某次开会少一个支持者，但是陈毅留下来意味着留下一个后手。当时中央战略转移，前途未卜。苏区局势虽然很糟糕，并没有进入死局。未来的局势是无法预料的，留下一个后手，意味着埋下一颗种子，收获可能是意想不到的。

如果把政治看成一盘棋局，周恩来就是一个顶级高手，能看到后面很多步棋怎么走。留下来的

陈毅经受了残酷的考验，最终脱颖而出。当我们感叹于周恩来非凡的一生时，往往只注意到那些光鲜亮丽的道德外衣，而忽略了内里的惊人谋划。在政治舞台上，必须先具备超一流的谋划实力，之后才有可能披上道德的外衣。

两人的见面是这样的：陈毅紧紧地握住周恩来的双手，两眼湿润；周恩来尽力安慰。

陈毅极力控制住感情说：“你们就要走了，快对我说说悄悄话吧！”

这段对白哪像无所畏惧的革命者之间的谈话，简直是恋人的告别，可见当时形势之艰辛，那个名叫死亡的老人随时可能光临。唯有生离死别，才能让好汉流露出内心的温情。

周恩来对陈毅说：“你是高级干部，本来应该把你抬走的，因为你在江西搞了七八年斗争，有影响，有名望，又懂军事，中央走了，不留下你无法向群众交待。”

前面相信是男人之间的真实感情的流露，只是最后这一句不太真实。毛泽东和朱德都走了，都有办法向群众交代，为何陈毅不能？可以肯定，如果毛泽东留下来，也会听到这句话。

陈毅在南方经历了三年残酷的游击战。现代人对“残酷”两字已经没有多少概念，以为陈毅他们之所以活下来，是因为共产党很牛逼，国民党很愚蠢。完全不是那样的！当时中央分局有五个人，分别是项英、陈毅、陈秋潭、荷昌、瞿秋白，只有陈毅一个人活到抗战胜利。

南方三年，陈毅过的是啥日子呢？就是整天趴在山沟沟里，应付敌人搜山。敌人搜得不耐烦了，直接放把火。而且把周围的老百姓全部转移掉，让游击队成为旱地里的鱼。

某一天陈毅在梅山被围了二十多天，眼看即将完蛋，怎么办呢？在顽强的意志和精神的支持下写了首诗：“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很豪迈？不，很有种：一句话，老子就是不服！

不知道这首诗最初是怎么写的，是用笔写在纸上的么，还是用树枝写在泥土上？但支撑陈毅写下这首诗的，一定是精神信念，说土点，是一股狠劲。在那种条件下，没有这股狠劲是挺不过来的。

关于那三年的生活，陈毅在诗中有很好的记录：

天将晓，队员醒来早。

露侵衣被夏犹寒，

树间唧唧鸣知了。

满身沾野草。

——这是早晨的待遇，早早醒来躲避敌人，睡懒觉的机会都没有。整一天怎么过呢？看看下面

这一段：

天将午，饥肠响如鼓。

粮食封锁已三月，

囊中存米清可数。

野菜和水煮。

——这是白天，主要任务就是躲避敌人和饿肚子。然后就是傍晚了，黄昏最容易思绪动荡，然而陈毅在干嘛呢？参照下面这一章。

日落西，集会议兵机，

交通晨出无消息，

屈指归来已误期。

立即就迁居。

——还是在躲避敌人。夜间开始行动了，行动如下：

夜难行，淫雨苦兼旬，

野营已自无篷帐，

大树遮身到晓明。

几番梦不成。

这些不是诗文，是历史。翻译过来只需一句话就可以表达全部意思了：很苦、很累但是决不低头。

三年之后又过七年，也就是四四年三月，陈毅从华中返回延安。从三四年的红军长征到四四年的延安整风，中间整整十个年头。十年了，陈毅同志再次见到中央领导，再次见到毛泽东。十年了，有多少恩恩怨怨都应该随风而去。十年之前，陈毅是一个伤号。十年之后，那个连腿都险些保不住的陈毅成了新四军的代言人。

一别十年，两人均跨入中年，四目交错，感慨良多。两人都是思绪奔放之人，理应坐下来交流交流感情，或者送上一壶小酒畅谈天下事。然而他们并没有这么做。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极为严峻，整风运动正处于最高潮。

十年过去了，很多事情已经改变了许多。当年那个在井冈山上的老毛，这个时候已经成了毛老

师；当年那个平等论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陈毅面对的是崭新的情况。批斗、审干、抢救等一系列政策正在实施，可以说陈毅回来得正是时候。陈毅回到延安，和彭德怀的待遇不同，他并没有受到彭德怀那种大面积的围攻，甚至还享受到一些言语上的欢迎。一方面陈毅的人缘不错，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延安批判陈毅一个人并非最佳办法。

在延安围攻彭德怀，那是因为毛泽东对掌控八路军有信心，通过敲打一下彭德怀震慑其他将领就可以了。批判陈毅，主要是通过批判陈毅把新四军重新整合起来，整合到中央的直接指挥下，也就是整合到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手里。

因此批判陈毅需要一种艺术。最佳地点不在延安，而在华中。实际批判从延安整风就开始了，批判的主持者，并非毛泽东身边的某个人，而是中共非常复杂的一个人物——饶漱石。

所谓饶漱石排挤陈毅，孤立起来看难以理解，事实上那是延安整风的一部分。

皖南事变之后，刘少奇顺势代表中央收拾新四军的烂摊子，陈毅代理军长，饶漱石任政治部主任。在皖南事变中，部队被打散，饶漱石被俘，差点挂掉，据说是用黄金买通狱卒才得以逃脱。刘少奇离开华中之后，提拔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成了名义上的一把手。

和陈毅比起来，饶漱石在新四军中只能算一个生瓜蛋子。陈毅在江南打游击的时候，饶漱石还在苏联呢。叶挺、项英之后，陈毅才是领导新四军众望所归的人选。刘少奇偏偏选择白区出身的饶漱石当继承人，或者说这也是毛泽东的意思。这个安排本身就很蹊跷，其实是刘少奇希望在新四军中培养自己人，只是后来饶漱石另有所图而已。

整风运动开始之后，饶漱石就对陈毅动手了，而且是毫无顾忌那种。想想看，陈毅在新四军干了多久？所有将领都得喊陈毅一声领导。因为陈毅的资历确实很老，不服不行。饶漱石在白区混过一段时间，现在成了新四军的一把手。名义上是一把手，实际也就是一个空壳，没有任何根基。在当时局面混乱不堪、局势变幻莫测的情况下，公然批判实力在握的陈毅，按常理只有死路一条，随时被丢到某个山旮旯喂狼去了。然而饶漱石同志不但放手大胆去整陈毅，而且把陈毅整得很惨，归根结蒂一句话——有后台。

现在公开的说法是，饶漱石整陈毅是因为个人野心的膨胀。从后面的高岗事件看，饶漱石是有野心。那年代敢于投身革命的，哪个没有野心？但是要撼动陈毅这个根基深厚的军方大哥，光凭野心是远远不够的。

后台就是毛泽东和刘少奇，饶漱石只是一颗钉子。想要以饶漱石为首重新整合新四军，首先干的事就是让陈毅屈服。拿下陈毅不太现实：陈毅在军内的资格非常老，早在朱毛井冈山会师，陈毅已经作为政治部主任排名第三，他经历过新四军所有的困难时期。

有人可能会有疑问？拿下陈毅有很多种办法，比方说直接换人，比方说拉回延安批斗一番不就可以了？甚至更为邪恶一点，把陈毅给“拯救”了。这些都是办法，不是办不到。

但是——没那么简单。

饶漱石虽然也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但在延安整风那会在新四军中和陈毅还是没得比的，而且陈毅的直系领导是周恩来。毛泽东需要周恩来的合作，同时希望陈毅和饶漱石合作。这也是饶漱石的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前面都有个“代”字的原因。要转正，必须有陈毅的鼎力支持，也就是让陈毅心甘情愿地拜饶漱石为领导。

让一个人归顺的最好方法，就是让这个人亲口说出来：我是错的，我不行，你是对的，我帮你，我愿意在你的领导下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话陈毅说过，而且说过很多遍，只不过是冲着毛泽东说的。让他对饶漱石说，不好意思，说不出口。毛泽东可以凭借自身的实力让周恩来归顺合作，而饶漱石对陈毅就做不到这一点。

饶漱石是新手，啥都不懂，新官上任三把火一把也没烧着。不是他不想烧，实在烧不起来。论资历、论实力、论人际关系、论才华、论幽默、乃至论长相（陈毅不算英俊，饶漱石就更不算了），饶漱石都没优势。如果比后台就不一样了。陈毅的后面是周恩来；饶漱石的后面是刘少奇，刘少奇和毛泽东联合为一体。他在等待机会，等待一个把后台优势转化为政治优势的机会，在等待机会的时候熟悉新四军高层的各种关系，然后就可以下手了。

一般而言，在白区工作的同志的政治水平都不错，饶漱石也不例外——政治水平一流。

延安之风刮到华中局时，理论上的一把手饶漱石知道机会来了。八月十三号这天，他首先玩了一招欲擒故纵，自己跑出去搞调查（表示我这个一把手很重视这事），让陈毅主持整风大会，让大家提对领导的意见。大家说咱们新四军的政治工作不是很给力，也就是对不在场的饶政委意见比较多。接下来一个星期，情况差不多，但并不激烈。饶漱石根本就没搞啥调研，而是在等待。为啥要等这一周呢，根基不是不深么？总要摸摸行情，看看同志们的心里是怎么想的。所谓整风，也就是开会吵架。然后等大家闹得差不多了，再以仲裁者的角色出现。毛泽东经常用这一招。现在饶漱石也跟着用。然而饶漱石不是毛泽东，毛泽东有资格、有实力做最后的仲裁者。当年的饶漱石还不行，实力、威望都不够，以至于战火烧到自己身上。可见政治上没有所谓的百试百灵的绝招。毛泽东能用的绝学，饶漱石就用不来。

所谓整风，也就是开会吵架。胜败和战场不一样。战场上讲的是战术和实力。吵架是拼口舌，还要拼后台。说到底，政治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立场、站队的问题。饶漱石有理由相信，当他亮出杀手锏的时候，胜算还是很大的。因此一个星期之后，也就是八月十八号这天，饶漱石出现了，加入吵架的行列。

饶漱石以最高领导的身份分别找同志们谈话，内容包罗万象：吃饭怎样啊、能不能睡好啊、找到老婆没有啊、怎么不找一个啊等等，但有一点是必须强调的，就是陈毅同志在井冈山曾经反对过伟大的毛主席，把伟大的毛主席赶下台。言下之意，毛主席是真理，陈毅反对过真理，所以他错了，要检讨，你们不要跟犯了错的同志走得太近。

饶漱石的这些谈话在同志们起到这样一个效果——中央让饶漱石清算陈毅了。于是乎，大家都和陈毅拉开距离。啥叫政治手腕？这就是。

此后陈毅、饶漱石两个人经常在一间小屋子里谈话，也不睡觉，常常谈到天亮，搞得秘书们夜里睡不好觉。当然不是说他们感情有多深，而是在吵架，饶漱石在啰嗦陈毅的错误，陈毅在辩解。现在已经无法知道他们说了啥，但可以肯定这些话浓缩一下，核心意思只有一句——饶漱石：以后新四军我当老大；陈毅：不行。

这样吵吵嚷嚷也不是办法，总要爆发出来，那就来得猛烈些吧。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六号，黄花塘，两人彻底摊牌。

饶漱石让陈毅作自我批评，陈毅罗列自己的历史。饶漱石不满意，让陈毅的态度端正些。陈毅还是罗列自己的历史。陈毅的历史，功劳很多，也有错误。

饶漱石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弄不动陈毅，自己头上的“代”字就去不得。如果哪一天其他人（陈毅或中央另派）当了华中老大，自己肯定变成陈毅的下属，在华中还怎么混嘛？既然骑到老虎的背上，只好一条路走到黑。

饶漱石亲自出马列举了陈毅的“十大错误”：第一，在历史上，陈毅一贯地反对毛主席；第二，陈毅一贯地对抗中央；第三，陈毅一贯地反对政治委员制度，不尊重政治委员；第四，工作不负责，办事拖拖拉拉；第五，轻视工农干部，偏袒知识分子干部；第六，对新四军七个师亲一部，疏一部；第七，陈毅的封建主义思想严重，嗜好下棋、写诗这类封建士大夫恶习；第八，主观主义严重，说话办事，不调查研究，凭印象瞎表态；第九，官僚作风严重，不愿意深入到炮火连天的部队去指导工作，只愿作水中浮萍，在离军部较近的部队走马观花；第十，个人主义严重，好大喜功，夸夸其谈。

十条都是空话，十顶高帽子而已。这些高帽子如果在延安那群职业政治家那里，那肯定相当有料，基本上要惹得口水一大片、板砖满天飞。然而这里是华中局，生存环境极为恶劣。甭管啥官职、都要打仗，既要打日本人、伪军，又要防止蒋大委员长的突袭，搞不好哪天就挂了，还是讲点实际的好，大家对整风、整人兴趣不大。所以在整风期间，延安天翻地覆，苏北和山东只是和风细雨。一方面是罗荣桓和黄克诚等人的抵制有关；另一方面，主要还是局势紧张，朝不保夕，没心思搞这些玩意。因此华中局的同志们没啥反应，眼睁睁看着一把手和二把手单挑。实际上这意味着饶漱石

的整风失败。

饶漱石很来火，大怒，说：“同志们！整风运动是毛主席、党中央号召的，大家应积极投身进来，不能站在门外徘徊，这可是对毛主席、党中央的态度问题。对陈毅的错误，不能姑息迁就，要提高到路线斗争的原则高度来认识。陈毅的问题是严重的，在新四军中的危害极大，必须彻底批判，肃清其影响。”

停顿了一下，喘口气，又说：“我代表华中局责成陈毅重新检讨，如果仍然不能正确地认识错误，我们建议党中央重新派一位德高望重、德才兼备的军长来。如果有谁对陈毅的十大错误认识不足，或者同情，或者包庇，则是对整风运动的态度问题，那就要受党纪处分，甚至会有撤职的危险。”

这已经是赤裸裸的威胁了，大家仍然没有反应。没办法，扛枪的和拿笔的思路不一样啊！既然没有效果，那就等下一天吧，留点时间让这群大老粗的脑袋转过来。

然而第二天，陈毅反击了。陈毅把帽子往桌子上一扔，昂首挺胸、滔滔不绝：“为驳斥饶漱石对我的诽谤和打击，在此，我要申辩性发言……”和彭德怀不同，陈毅的口才相当好，滔滔不绝，战斗力相当强悍。

首先给自己辩解，其次逐条反驳，最后竟然给饶漱石罗列罪状！

饶漱石那叫一个来火，最后竟然谈起官职来了：“现在让你重新检讨，重新作自我批评，不是让你再次摆功劳。你的态度很成问题！我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我又是华中局的书记，我有权代表华中局和军部，向中央揭发你的问题，有权建议中央另派一位德才兼备的军长来。”没有办法了，饶漱石只能给中央发电报。

事情闹到这个份上，虽然目的已经达到，指望饶漱石在华中搞定陈毅是不可能了，只好把陈毅叫到延安来。理由是帮助毛泽东和朱德起草七大报告。陈毅离开之后，饶漱石继续批判陈毅，效果不大。开会时，各路的首领头头不露面。粟裕、黄克诚、谭震林、邓子恢等人直接派代表参加了事。

十年之前，毛泽东和陈毅在井冈山分手。十年之后，毛泽东和陈毅在延安相见。在延安，毛泽东和陈毅谈了很多，甚至还给陈毅很多安抚。只是涉及到陈毅和饶漱石的矛盾时，毛泽东让陈毅公开场合不要谈自己和小饶（饶漱石）的争论。

然而这事最终还是绕不过去的。一段时间之后，毛泽东让陈毅发电报给华中的同志们做自我批评，实际上就是让陈毅向饶漱石低头。毛泽东发话了，陈毅当然要照办，就发电报啰嗦了一些个人小毛病，大帽子一项没认。随后毛泽东跟陈毅说，黄花塘争论结束了。

就这样结束了，没有批斗会、没有大帽子、没有审查、没有拯救，简单到出人意料。在毛泽东这里确实结束了，因为该做的事在华中就做完了。现在陈毅已经离开华中，又发电报认错，这些已

经够了。华中局已经没人能在政治上抗衡饶漱石了。安抚一下陈毅，卖个人情给周、陈二人，何乐而不为呢？

剩下那点事留给其他人去做就行了。七大结束之后陈毅留在延安，也就是说没回工作岗位。陈毅整天喝酒下棋，心里虽苦，外表却是一副乐呵呵的模样。这段时间里康生倒是经常出现，暗示陈毅承认饶漱石的领导，陈毅偏不认账。事情就这样拖着，最后才出现这样的情况，解放战争期间，陈毅一年多时间不在军部。然而和陈毅这种久经考验的老军头不同，饶漱石除了依靠中央就没有办法立足。

按道理说，陈毅和饶漱石争论不休，应该对新四军不利。然而一个人的横空出世改变了这种局面，那个人就是粟裕。而粟裕在朱德和刘少奇的印象中都不错。朱德、刘少奇均把粟裕当自己人。毛泽东也鼎力支持这个看起来老实巴交的粟裕，试图把粟裕攥在手里。粟裕接管了打仗。陈毅不在的时间里，和粟裕配合的是饶漱石同志，所以当年有“陈粟大军”，又有“饶粟大军”之称。陈粟大军也好，饶粟大军也好，好在饶漱石和粟裕配合得很好，打仗那一块交给粟裕，其他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陈毅和饶漱石的争论就局限在政治领域内，没有影响到军事行动，这点又是新四军的大幸。

尽管陈毅非常有才华、有道理、有功绩，说话很有感染力，人缘也好，然而在这次交流中，他注定无法战胜饶漱石，因为他处在被审判的地位，最多就是洗涮自己的清白。当他把十年来的是是非非说清楚，饶漱石已经稳坐华中一把手了。

一番折腾下来，饶漱石成功地把陈毅赶出新四军，稳坐华中一把手。唉，新四军军长总是敌不过政委，前叶挺，后陈毅，大同小异。再加上粟裕破土而出，接管华野作战指挥权。毛泽东终于通过整风运动达到控制新四军的目的。

通过陈毅这事，咱们再次看到，毛泽东用人手段之精妙，远非任何一个政敌可比。

再把镜头对准饶漱石，此君究竟把谁当成后台老板？按道理说，刘少奇对他有恩，理当跟着刘少奇混。为何又卷入高岗事件针对刘少奇呢？刘少奇把饶漱石当自己人，饶漱石却没把刘少奇当自己人，他认为刘少奇这棵树还不够。他或许是把自己当成毛泽东的人，所以跟着高岗针对刘少奇。但是毛泽东好像没有把他当自己人，所以他从未真正成为毛派，命途多舛。也许毛泽东把他当自己人，只是没有保他，毕竟毛泽东连高岗都没保。

个人认为，毛泽东还是没把他当自己人，如果是的话，后期应该提拔利用，就像后来的柯庆施，作为一颗反刘抑周的天然棋子。当然也可以看作是饶漱石陷得太深了，洗清他涉及到给高岗翻案。谁说得清楚呢，是是非非的。

评：饶漱石是一位人才，晚景凄凉。但是他有过施展才华的机会、并且抓住机会施展了才华，

人生如此也当无憾了。

饶漱石批判陈毅，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在批判陈毅。

陈毅和饶漱石斗争失败，实际上就是周恩来的实力被削弱的一个缩影。

纵观神座下的人们：延安整风，不仅只有“狠”与“猛”，还有“巧”字。对国际派用狠，对彭德怀用猛，对周恩来、陈毅用巧。

（十）毛泽东思想的诞生

毛概嘛，谁不知道啊，考试时还是靠抄袭才过的呢。真实的毛泽东思想和教科书还是有很大差别的。那本教材是经过专家教授咀嚼过的东西，因此味道有点怪异。事实上毛泽东思想并不是那本书上的文字堆砌而成，是鲜血和白骨堆砌而成的。

这可不是在拍恐怖电影，因为世界上任何一部恐怖电影都是有限度的。

数千年来，中国的每一次浴火重生，都意味着流血、再流血。两千多年前周朝解体，历经春秋、战国数百年的流血，方有秦汉强势。东汉末年起，又是流血几百年，才有隋唐盛世。五代十国，乃至整个两宋王朝，战争从未休止，流血从未休止。接下来是元的野蛮和明清僵化。清末民国，中国进入流血流得最为惨烈的时候。

无数仁人志士、英雄豪杰想要给国家止血。有人想以相对温和的方式给国家止血，比方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没有成功，反而使得谭嗣同等英豪流血而亡。又有人希望通过简单一点的方式给国家止血，比方说孙中山让贤袁世凯，也没有成功，反而让宋教仁等志士流血而亡。最后没有办法了，只能通过最原始的力量，以暴抑暴，铲平一切重新来过。毛泽东思想，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流血流出来的。

所谓毛泽东思想就是一帮精英通过无数次的生死考验之后得出来的行动指南。这本指南就四个字——实事求是，都说烂了，但真正能理解的人很少。翻开整个一部中共党史，实事求是，就是为了革命理想的需要流血时就流血，需要杀头就杀头，需要坐牢就坐牢，需要蒙冤就蒙冤，需要运动就运动，需要改革就改革，需要开放就开放。在这些“实事求是”的行动中，很多同志流血牺牲，变成累累白骨，同时杀了很多同类。从共产党建立到新中国诞生这段时间里，不停地流血，再流血。

为何？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必须如此。毛泽东思想就是为了解释这个问题而诞生的。

所谓新中国，就是流血留出来的。与其说浴火重生，不如说浴血重生。

如果把中共看成一个巨人，那么毛泽东思想便是巨人的灵魂。

正是因为有了灵魂的指引，巨人才能把自身的力量运用到适当的地方。

毛泽东用政治家的身手加上诗人的气质，指挥一帮精英南征北战，流血牺牲，塑造了巨人的灵魂，因此毛泽东成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刘少奇通过自身的理论实践水平装扮了巨人的灵魂，成为这一理论的发现者。

在理论方面，除了这一思想的创立者毛泽东，就数把这种思想形式化的刘少奇的功劳最大。毛刘联盟建立，意味着垄断理论话语权。

在政坛上，掌握话语权，就是掌握真理。

这种话语权不仅在军事上打退敌人，而且在党和政府中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因此在当年，毛泽东第一，刘少奇第二。

党内的优势延续到政体上，还是毛泽东第一，刘少奇第二。等到毛泽东的经济政策搞不下去，刘少奇成为新一任国家主席，便在政体上赢得权力。发展到最后，毛泽东是党的主席，而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只是走上前台的刘少奇并没像毛泽东设想的那般解决问题，他打算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那恰恰是毛泽东不愿意看到的。

毛泽东思想产生了很多积极作用，各种书籍里都说得很明白了。

凡事都需要一分为二。这里说说不利的一面，不利的一面就是把毛泽东送上神坛。历史的发展无数次证明了，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如果这个人建立一种组织，力量将得到大大的增强；如果再给这个组织安上灵魂和思想，它不仅力量加倍，还将影响后世。

共产主义的创立者是马克思。马克思的思想行为概况起来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影响了这个世界。但是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他的影响仅仅是理论方面，通过他人的革命实践来改造这个世界。

马克思之后是列宁。他的思想行为汇总为列宁主义。列宁指导了俄国革命，并且取得了成功，初步建立起一个苏维埃政权。但是这个政权是软弱的，并不强悍。真正让苏联强悍起来的，是钢铁一样坚强的斯大林同志。斯大林虽然有一个强大的组织，却并无统领一切的思想。有听过斯大林主义么？没有。

接下来该谈谈毛泽东思想了。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完全不同，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就是一个理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智力活动的结果，就算后来导致了第一国际，那也是先有理论后有实践，用理论指导实践。列宁比马克思更为激进一点，也是边理论边实践。毛泽东思想则是另外一回事，先实践，然后才形成理论。中国共产党流血流了二十年之后，才流出自己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

等到这个从残酷的实践中锻造出来的思想帮助中国大地再次找回尊严之后，许多人就把它当成绝对真理来对待。一系列的阿谀吹捧就来了，像刘少奇、像林彪，就是吹捧队伍里的杰出代表。在这个过程中，这个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毛泽东同志赢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也被推到历史的悬崖边上。所有敢于表达不满的声音都将被无情镇压，在镇压这些不满的声音的时候，毛泽东原本光辉的形象开始有了污点。

这个世界并没有一个真理能解决所有问题，没有一个人能解决所有问题。毛泽东思想不能，毛泽东本人也不能。当一切问题都要用毛泽东思想来解决，当所有事都需要毛泽东一个人做决定，那么灾难将不可避免地到来。不仅是死去的那些人，包括对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在内而言，也是一种灾难。对于大饥荒、以及随后的历次运动，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记忆犹新。

这一系列造神运动的背后，刘少奇的贡献最大。

毛泽东思想的诞生，刘少奇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毛泽东一人独大，刘少奇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毛泽东被神化，成为全人类的太阳，刘少奇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种理论化、组织化、原则化的吹捧，远比柯庆施那种“相信毛泽东要到迷信的地步”、林彪的那种“天才论”“顶峰论”严重许多。盲目的跟风叫嚣，大家很容易一眼看穿。像工程师一样构建的理论，想要批判却很难。

在个人吹捧上，刘少奇也不逊色。中共七大，刘少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他把“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还把“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规定为党员的一项义务。这份报告 105 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名字之后还会伴随着一个“最”字，比如说“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他不但敢于率领全党和全体人民进行翻天覆地的战斗，而且具有‘最’高的理论上的素养和‘最’大的理论上的勇气等等”数一数，多少个“最”字。如此有才气的言语，后来的林彪等人是写不出来的。而且毛泽东啥时候变成科学家了？毛泽东固然伟大，但终其一生和科学家三字联系不大吧？

所以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同志才说：父亲对于毛泽东凌驾于全党全国人民之上是负有重大责任的。这话是经过诸多振痛之后的反省。

评：刘少奇和康生，一个温和严谨，一个阴狠毒辣，用不同的方式推动了延安整风运动。康生的狠毒，留下怨恨的种子。刘少奇的温和严谨成了造神运动的根源。

造神运动这项工程，刘少奇算总设计师，还有众多参与者，作用如同工程师。具体是哪些人呢？

可以参照陈毅在文革中的讲话。陈毅说：“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现在怎么样？当年赫鲁晓夫吹捧斯大林，后来怎么样？刘邓那些人没有反过毛主席，那时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陈毅提到的这些人都是造神运动的参与者——在文革时代，都遭了殃。

四、刘少奇为何惹那么多人不满

中国有句俗话：不遭人嫉是庸才。反过来理解，只有精英才会遭人嫉妒。刘少奇之所以遭人嫉妒，只因为他是精英，只因为很优秀而已。刘少奇是精英么？当然是，而且是精英中的精英。建国之初，一位身处高位，且即将走向最高位置的人，想不惹非议非常困难，特别是这个人又干了很多事，露出很多破绽的情况下。对此西方有人说，人只要干事就会犯错，犯了错的人就会被抓住尾巴。看来在这一点上，东西方有共同的想法。

那么是不是可以解释为，有那么多人对刘少奇不爽，只是羡慕刘少奇的才华、嫉妒刘少奇的权力、怨恨刘少奇的影响力？如果是这样，就不用写这些东西了，故事另有原因。

对比一下同时期的周恩来就能发现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刘少奇和周恩来同年，算是同一代人。论才能、人品、乃至相貌，周恩来都不输给刘少奇。工作这一块，周恩来也没少干，而且更为庞杂，除了党务这一块，他基本上啥都干，连特工都领导过，得罪人的或不得罪人的工作都是一肩挑。然而很少听到对周恩来不满的声音，即使高岗活动那会，主要目标也是针对刘少奇。即使后来街坊间传闻柯庆施要当总理，也是传毛泽东的意图，而非柯庆施对周恩来的进攻。周恩来经常检讨，也只是向毛泽东检讨，然而刘少奇的对手好像从来没有间断过。

延安整风之前，刘少奇有名气没权力。白区地下党么，再高的职位也管不了几个人，工作范围也就是组织一下罢工，写文章和某人论战一下。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工运领袖这个角色并没有多少分量，和大革命时代没法比。就算时不时以中央大员的身份到某个局搞工作，也是干一段时间就走，来不及扎根。那个时候的刘少奇以挑战者的角色，勇敢地向张闻天等人发起挑战，成功取代张闻天成为党内日常事务的主持者。

整风之后，刘少奇虽然成了党内第二号人物，相当于组织上有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说真的，当时这个权力形同摆设。因为当时的主要业务是打仗。打仗是军人的事，指挥军人打仗的工作由党内第一号人物毛泽东来干。刘少奇的工作也就是处理一下日常事务。此时的刘少奇只是隐在毛泽东身后的一位理论家，一位具有实干精神并且干了很多实际事务的理论家，并不显山露水，位高权不重。

刘少奇真正耀眼是在建国之后。他和周恩来成为除毛泽东之外新中国最重要的两个支柱性人物。这个时候，这位起于工运，战争年代一直埋头于党务的第二号人物成了擂主，挑战者一个接一个出场。这种考验从高岗一直持续到林彪同志，终于被人挑倒了。

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在没有人敢于挑战毛泽东的情况下，为啥有人要挑战毛泽东一手护持的

刘少奇？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最简单的回答就是，有人想争夺权力取而代之。简而言之，就是为了权力。也对，可以这么说，毕竟高岗同志就是这样子。如果这样就把问题了结，显然不太负责。

权力只可以解释高岗，却无法解释林彪。从现有资料来看，林彪上位并非是靠自身的积极钻营。而林彪也不是毛泽东心中理想的接班人，林彪最终取代刘少奇成为接班人，更像是毛泽东的一个情非得已的选择。

不仅无法解释林彪上位，更无法解释邓小平的转变。高岗失败之后，毛泽东提拔邓小平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用意是协助或者说制衡刘少奇、周恩来。然而若干年之后，邓小平离毛泽东越来越远，反而是和刘少奇越走越近。还有彭德怀，庐山写信基本上是冲着刘少奇去的，写信的本质并非是所谓的权力之争。

在进一步叙述之前先声明一下，这里没有所谓的解密材料，也没有内幕信息。这里只是根据他们的各自经历进行一些分析总结。在此本人不自量力，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接近真相。争取做到，即使偏离了真相也不会误导大众。

要解释这个问题，就应该从建国开始说起。

这是大方向，可以说是历史和现实共同决定的。然而在下面小机关中的各个部门，就需要中国人自己解决问题了。党的一套班子，政府的一套班子，从无到有，选人才、选地方、制定法律法规这一大摊子事都需要有人干。谁干呢？主要是刘少奇和周恩来在干。刘少奇主管党内日常事务对应的是各级党组织，周恩来管国务院对应的是各级政府。

前面说过，建国之初还在打仗，国内剿匪和国外战争同时进行。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国内领导人的心思还在战争上，真正安心解决各个部门建设问题的，正是主持党内实际事务的刘少奇同志。应该说刘少奇干得还不错，很好地完成了任务。经过一系列的人事安排，国家初具雏形，该有的机关单位都有了，各个部门上都安排了人，需要人干活时有人干活了。等到五四年第一届人大召开时，国家的基本框架基本定下来了。

但是这项工作有两个巨大的破绽。

第一个破绽就是，各级官吏的位置上，白区干部的比例相对较高，苏区干部的比例相对较低。因为苏区干部主要在军方，都在前线打仗，不在前线的要准备上前线。白区干部相对比例较高，白区本来是搞地下党的，全国解放了，又不需要上前线，各个地下省委书记啊、市长啊什么的自然要从地下转移出来，要安排工作，然后成为各级领导干部。这个比例低，并不是说苏区干部的数量和白区干部的数量相比。

然而苏区的实力远远高于白区，数量也高于白区。别的不说，单就那么多军人来说怎么安排？军人在打仗时无所谓，仗终究是要打完的。等他们打完仗回来就会不满，不满就会发难。代表人物就是高岗同志。

现在就扯出来一个问题，为啥苏区同志会对白区同志不爽？既然大家都是共产党员，既然大家跟着同一个领袖，既然大家为了同一个理想去奋斗，既然通过大家的努力搞定了蒋介石建立了新中国，既然建国之后大家都要为人民服务，那么谁当这个官有区别么？

粗看一下确实没啥区别，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区别很大。高岗同志到处宣扬苏区党和白区党的区别，也就是苏区干部和白区干部的区别。大家以此判定高岗在搞分裂，事实上高岗是对的，苏区干部和白区干部在人生经历乃至思考方式上确实有很大的差别。

这要从他们的各自经历说起。通俗意义上讲，在大部分情况下，人的思维判断来自于过去生活经验的积累。虽然大家同属一个政党，团结在一个领袖的周围，但彼此经历的差异造成思考方式的差异，这种差异导致很多误判。

苏区干部，特别是军人，基本上都是贫苦农民出身，很多人参军入党并非是想追求共产主义真理，或者被马克思列宁主义给征服了，仅仅为了吃饭而已。对他们而言，马克思列宁和老天爷差不多，那些理论不如一碗红薯稀饭来得实在。共产党恰好可以给他们饭吃，不仅给他们饭吃，还可以带领他们打土豪分田地，种庄稼养活老婆孩子，真是太好了，不跟共产党跟谁？难道跟着国民党继续给地主种地不成？

尽管苏区这些军人干部打仗很勇猛、很机智，消灭了很多敌人。但是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呆在苏区的荒山野岭里，见识有限。对于机关单位应该如何运作一窍不通。

白区干部则不同，知识分子比例比较高。因为长期在敌占区和各种人物过招，处事比较老道（不老道的都被抓去枪毙了）。因为时不时要和各种机关打交道，甚至要到各种各样的单位搞卧底、搞潜伏，对各种国家机器比较熟悉。

苏区经过战场考验的干部，大致会成为刚毅机智的军人。白区经过斗争考验的干部，大致会成为灵活务实的官吏，这群人组合在一起可以形成官僚集团、各个利益共同体，就像他们曾经推翻的国民党政府一样。

让苏区干部去建立一个机关单位，他们要么很为难，觉得狗咬刺猬无处下口；要么觉得很轻松，随便整整就算了。让白区干部去建立一个机关单位，他们可以照葫芦画瓢，画出一个大致框架。

刘少奇大量使用白区干部，除了战争因素的考量，也是对白区干部更为了解。

等大量军方干部扛着枪回来，发现各个部门除了已经有人之外还有点似曾相识，揉揉眼睛一看，

怎么这些机关单位跟老子闹革命推翻的那些东东差不多呢？咱们新中国不是应该与众不同吗？怎么还跟国民党那些单位差不多，怎么回事嘛？

这就是第二个破绽，或者说失误。

这个失误就是没能安抚苏区干部。在这点上刘少奇和毛泽东就差远了，毛泽东搞过很多次斗争，不仅是建国之后的各种运动，战争年代也是通过无数次考验。井冈山时代几起几落不说了，和张国焘斗，延安整风，每一次都是大手笔，但是在运作这些大手笔的时候，总是能团结大多数。张国焘叛变了，仅仅是个人的叛变。国际派靠边站了，但共产党的战斗力更强大了。之所以如此，皆因为能争取大多数。建国之后的历次运动固然残酷，但国家和党依然稳如泰山。

刘少奇处理对手的问题，从高岗到彭德怀乃至后来的林彪，都不理想。其实刘少奇对面站着的远不是军内那几个巨头，而是巨头身后的那些人，那些平凡、沉默、悍不畏死，久经战火考验，用生命维护国家完整的那些苏区出来的干部。

广大苏区干部虽然一度窝在山沟沟里打游击，靠黑面包、南瓜汤来维持生命，穿的也是粗布衣服，跟他们讲该怎么当一个科长可能是瞎子点灯——白费蜡。这样一群人都是出身于社会最底层，是最穷苦的阶层，历来都是被统治的对象。这群人在有文化素养的人眼中是粗人，在精密的官僚组织中非常碍眼。然而这群人也许是世界上最为坚韧的一个群体，正是靠这些人的坚韧，古老的中华民族才得以重生。

换是和平年代，这些看似没啥素质的粗人以农民或者工人的身份分散在土地或工厂里干活，靠自己的身体给社会创造财富。就像现在这般，不被重视，赚点钱养家糊口。然而当时可不是这样的，当时这些人汇聚成一股钢铁洪流，刚刚在战场上冲破一切障碍。现在他们需要工作，接下来就是对工作不满。

白区干部看苏区干部不爽，看看这帮大老粗，大字不识几个，怎么能办事？苏区干部看白区干部不爽，看了这帮派头十足的家伙就想去揍他们，就像当初揍国民党那帮混蛋。这种相互看不顺眼的现象在当时并不是个别现象。刘少奇借助白区同志办事的时候，并没有很好地安抚两派人的对立情绪。

当初的高岗对刘少奇发难，能掀起那么大的风浪，就是因为这种对立情绪的存在。后来彭德怀在庐山写信，引起那么大的反响，除了当时客观情况确实很严重外，潜在原因就是这种对立情绪。毛泽东表态之前，军方基本上支持彭德怀，反对者基本上来自行政系统。

五、毛泽东的人事安排

难道说刘少奇看不到自身的弱点在哪里么？这个问题没有准确的答案，因为没有也不会有这方面的资料作为佐证。

作为一个长期坐在二把手的位置上，按常理最终将走向最高领导岗位的人应该清楚自身的处境，知道哪些人不怎么买自己的账。或许他根本不在乎，办事而已嘛，有能力的上，事情办好就行了，顾虑太多反而误事。

然而客观、公正一点说，刘少奇的那些破绽是无法避免的，就算他想去化解和军人的那些隔阂也未必能如愿。

根据中国的老传统来看，韩信和萧何从来没有真正融洽过。乱世韩信压过萧何，治世萧何胜过韩信。文和武好像是某种天生的敌对，要不然像廉颇和蔺相如上演将相和的故事也不至于成为经典。之所以是经典，是因为太少了。

刘少奇也不是不想和军人搞好关系。只是军人只忠于另外一个人——老领导毛泽东。毛泽东可以把名望和地位给刘少奇，但枪杆子始终没有给他，将帅中凡是跟刘少奇走得近一点的要么靠边站要么倒霉，比如粟裕，比如贺龙，所以说刘少奇工作有他的难处。

这种难处恰好是人事框架造成的。

要了解刘少奇的工作难处之前，首先要了解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毛泽东是如何给刘少奇定位的。自从毛泽东真正掌权之后，党、政、军就组成一个稳妥的三脚架，稳稳地支撑着这位伟大领袖。

战争年代比较特殊，党和政都是次要的，军才是主要的。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放在摆平军人上面。军人可以在战场上建功立业，但党内地位并不明显，比如实际负责前线指挥的彭德怀，总有一帮理论家的党内排位高过他。作为各方面力量比较强劲的周恩来，党内地位从来没有升至第二位。刘少奇作为党务代言人，实际上也只是依附毛泽东而存在，军内影响很小。我们知道，刘少奇的作用除了解决党内实际问题，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平衡一下军头。党政军么，三者基本平衡是必须的。没有了么？还有。

作为一个重新缔造了中国的领导班子，不能仅仅从人事方面分析，还要放到历史长河中比较。说起中国的人事历史，那叫源远流长。整一部二十四史一大堆，绝大部分都在记录人际关系。除去早期的神话时代不谈，中国的人事分配起于春秋。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之类的牛人基本上是从那个时代开始的。春秋霸主和战国雄豪们都有自己的班底，商鞅、管仲、范蠡等人都是班子里的杰出代表。秦始皇一统天下的时候，文有李斯、武有王翦、蒙恬等人。

随后的汉帝国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领导班子，就是汉初三杰，韩信、张良、萧何，这三个人

是刘邦的王座下的三条腿。韩信管攻城略地，张良负责出谋划策，萧何的工作则是组织运作。这套班子堪称经典，成为所有后来成功者学习的样板。

论功劳，韩信最大，大汉天下很大一部分都是他打下来的。没有韩信，刘邦和项羽很可能就像象棋盘上那样划分楚河汉界。然后项羽搂着虞姬唱歌跳舞，刘邦背着吕后找个宫女啥的乐呵着。张良搞谋略的，换句话说，就是阴谋家，还是顶级阴谋家，一出主意就是要人命的那种。一旦天下平定，韩信这种人就要悲剧，因为战功和能力，这种人就成了领导眼中一个巨大的危险，赏无可赏不说，总担心哪天造反分裂天下。后来的高颖、蓝玉、年羹尧都是同一种命运。连庐山之上的彭德怀，叶剑英都说，现在主席在你就这样，将来谁管得了？

其次就是张良这种人，永远要防。这种人搞建设能力不怎么样，但破坏起来，能量惊人。因此张良后来隐退了，就像前辈范蠡一样。这种人功成之后都会身退，不隐退一般不会有好果子吃的，比如说范蠡的同事文种就跑慢了。后来帮助唐肃宗出谋划策，平定安史之乱的李泌，也是功成身退；帮助朱元璋打天下的刘基退了；帮助朱棣靖难成功的姚广孝做了同样的选择。相反萧何这种老老实实搞组织的，危险和不确定因素很小的人，往往可以身居高位。

刘邦论功行赏，萧何所得胜过韩信、张良，萧何的结局也强于韩信、张良。之后的故事就类似于已经成为历史餐桌上的家常菜的其他历史故事。唐帝国建立之后，掌控国家命脉的是长孙无忌等人，而非李靖。宋建国之后，皇帝后面的大当家是赵普，石守信、高怀德等人只能喝杯酒之后回家抱老婆去了。大明帝国建立之后，朱元璋做了和刘邦相同的选择，即推选埋头干活的李善长为最大功臣，徐达、刘基等人靠后。

熟悉历史的毛泽东对这些了如指掌。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组成的早期领导班子，并不比历史上的那些班子差，如何实现班子分工协作就成了一件大事。可以简单对应，说刘少奇扮演组织者（如萧何、赵普、李善长）的角色，说周恩来扮演谋士（如张良、刘基等人）的角色，说朱德代表军方系统。然而事情没那么简单，要复杂很多。

俗话说历史在前进，人事关系正在细化复杂。

朱德贵为红军总司令，但是和古代统帅们不太一样，他很少直接指挥战争，更多的是协助毛泽东统筹全局。打仗的事，由将帅们在各个根据地搞。

周恩来有足够的实力扮演谋士角色，主导西安事变、推动国共和谈、周旋于国际国内大大小小的派别之间，这种手笔放在整个历史上也不差，而且亲自创建、领导特科，信息来源极为丰富。但是周恩来远远超出了谋士的角色，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谋士的工作量可以和周恩来相比，没有一个谋士面对的困局可以和周恩来相比，没有任何一个谋士能像周恩来这样长期居于高位且善始善终。就算那个号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丞相都不行。

刘少奇倒是很好地扮演了一个组织者的角色。在这个班子中，刘少奇实力最弱，但地位最高。

中共的力量有两个来源，一是暴力，就是搞暴动拉队伍，就是教材上写的那些，打土豪分田地。那些得到土地的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就去当兵。当兵之后打更多土豪，分更多田地，然后很多人当兵。就这样构成一个暴力循环。等到把全国的土豪全部打光光，新中国就建立起来了。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力量源泉，即对暴力的控制，说白了就是党指挥枪。

这是毛泽东在秋收起义之后，三湾改编时制定的原则性策略。这个策略保证了党对军队的控制，最大程度上保证党和军队协同一致。对比一下国民党就知道这条原则的优势有多大。国民党也是兴起于暴动，而且暴力活动不少，并且很强大。因为对暴力的控制不力，所以军头叛乱时有发生。军头都这样，军头下面那些人更别提了，鱼龙混杂。一开会大家就是要钱、要枪、要人，军事行动时却又各怀鬼胎、互相猜忌。国民党败就败在这条上——对暴力控制不力。中共这边就好很多，基本上没有军头叛乱的事，士兵比较淳朴，偷鸡摸狗的事基本不干，上了战场绝不含糊，对得起“人民子弟兵”的称号。

把原本实力最弱的刘少奇的地位安排到最高，目的就是制衡。这是中共人事安排的经典套路，也是在中国历史中人事安排的经典套路，即压低实力超强的人的地位，给实力不那么强的人以虚名。建国之前的刘少奇就是这样一个位置。

然而建国之后，情况变了。原本弱小的行政系统一跃而成为主流。看看当年关在草岚子监狱里的地下省委书记、市长一大把，值不了几个钱。建国之后，这些原本不值钱的头衔就变得相当抢手。当年从草岚子监狱里出来的六十多人，多数成为栋梁，位居省部级干部乃至中央委员。原本地位高而实力相对较弱的刘少奇的实力极大加强。或许这也是毛泽东的安排，他对那帮打天下的军人有所防备，而且不太相信他们的建国才能。这个安排属于抑武扬文的正常范畴。

然而在党指挥枪的框架下，没有指挥过枪的刘少奇走上前台之后，就不得不面对一帮打天下凯旋而归的军人。这些军人在战场上是条好汉，进入了行政系统则不见得能行。说到底，打仗和当官是两回事。能打仗未必能当官，正如能当官未必能打仗（把现在当官的送上战场大多数都要耸）一个样。因为打仗和当官根本就不是一个思维模式。战场上，只要干净利索地彻底解决对手就行。官场上，最好的办法是把所有人都糊弄好。

这个安排相当于把刘少奇推向前台成为擂主，承受一波又一波的挑战，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在政党需要治理国家时，作为党内二号人物，要么把刘少奇隐蔽起来，所有无聊琐事由一号人物毛泽东一肩挑；要么把军权也给他，让他成为名正言顺的一把手。如果选择折中，只能这样了。

应该说建国之初，毛泽东对刘少奇寄予厚望。除了依靠他领先的文官系统压制军人，还希望他能够在建设方面帮助自己一把，正如战争年代依赖彭德怀、林彪等人一样。然而很快他就对刘少奇

有些许不满。当毛泽东雄心勃勃地审视国家建设时，发现所谓的新中国并无太多特色，国家体制还是那种行政方式，一部分来自传统，一部分来自苏联模板。刘少奇时不时发表些讲话，讲咱们现阶段要过度、要允许剥削存在，怎么听都有点回到国民政府时期的感觉。所以毛泽东才对高岗委以重任，就是要表达对刘少奇和周恩来不满，给他们点刺激。当高岗越过了那条底线，毛泽东毫不犹豫地将他抛弃；彭德怀在庐山写信，毛泽东依然挥刀断臂。可以说毛泽东还是比较珍惜这出政治二人转的。

接下来毛泽东亲自指导建设。第一次人大召开，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些都是毛泽东时代的标志性事件。然而正是在这段时间内，整个中国开始逐渐狂热起来。此时的刘少奇选择紧紧跟随，一步也不落下。可以说刘少奇也是比较珍惜这出政治二人转的。

即便如此，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这个政治联盟在建国十年之后不可避免地要解体。

因为大饥荒来了。

六、大饥荒对两人关系的影响

一九五四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决定设立国家主席，毛泽东毫无悬念地当选。同时朱德当选为副主席，刘少奇为人大委员长。在国家主席的职务定位上，毛泽东提出：“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可以解散国会，我们的主席不能解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相反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倒可以罢免主席。国家主席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并服从于它。”一是和国际接轨，二是有自己的特色。也就是说中国的国家元首并不是国家的最高领导——最高领导是毛泽东。

党指挥枪，党领导政。

两年之后，毛泽东在北戴河一次党内会议上先吹风，表示不想当国家主席了。又过两年，第二次人大之前，中共通知大家，说毛泽东同志不当下一任国家主席了。这个消息还引起了一阵风波，党外人士还以为共产党内部出现地震什么呢。说实在的，毛泽东不适合当国家主席，因为他的个性太随性了。他在延安时代可以当着记者的面捉虱子、在游泳池和赫鲁晓夫同志约会、穿睡衣去参加陈毅的追悼会。

毛泽东之后，还有好几个人可供选择，比如说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可能性最大的是朱德、刘少奇。

大家以为朱德会转正，因为朱德是国家副主席，转正水到渠成嘛。以朱老总的威望，当国家主席绰绰有余。然而接下来朱德亲自表态，推荐刘少奇继任。于是在一九五九年一月，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任国家主席。朱德干起了之前刘少奇的工作，成了人大委员长。

这一年毛泽东六十六岁，刘少奇六十一岁，两个人都已过花甲之年，早已从当年激情澎湃的革命者转变成心机深沉的政治家。

提到一九五九年，总是让人想到庐山事件。这一年意味着很多，刘少奇走向前台，对中国政坛影响不下于庐山事件。

从此之后，两位奔向古稀之年的大人物从一元化走向两元化，开始了从合作到对立的过程。以此为起点，往前看，他们已经相识了三十八年，合作了二十五年；往后看，三年之后，他们的政见分歧浮出水面，又过三年两人摊牌。从此一直纠缠，直到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这一天。

刘少奇成为国家主席时，全国的形势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大跃进已经进入冲刺阶段；人民公社也已经不可挽回地在快车道上狂奔。半年之后就出现了非常恶劣的庐山事件。

随后的三年，就是史无前例的大饥荒。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进入了死亡方程：没有食物导致饥饿，因为饥饿导致浮肿，因为浮肿导致代谢系统紊乱，浮肿消失还是没粮食，再浮肿，如此循环，

直到最后非正常死亡。

大饥荒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惨痛的流血事件。

大饥荒直接导致了毛泽东和刘少奇走向对立。当毛泽东让出国家主席时，他预料到刘少奇当选么？史料中没有直接答案，但答案趋向于肯定。虽然他什么都没说，也没有暗示什么，但是他应该知道是刘少奇上台。一个是历史传统，毛泽东不在，刘少奇代理。朱德虽然德高望重，毕竟年龄大了，已过古稀之年。而且朱德淡泊名利，正渐渐淡出权力的核心。另外就是周恩来了，周恩来在国务院总理的位置上抽不开身，他也不大愿意出这个头。纵观周恩来的一生，他既不愿意成为领袖，也不愿意成为领袖旁边的那个人。他和领袖中间总是隔着一个人——时势使然还是人为选择？其他如邓小平等人当时的资历还不够。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一生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国。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莫斯科。当时中苏两党关系还没有真正恶化。毛泽东在莫斯科对赫鲁晓夫说：“我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了。”

赫鲁晓夫问：“有人接替吗？”

毛泽东：“有。我们党内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第一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那里学习，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原则性很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

可见毛泽东对接班人的问题还是心里有数的。

应该说刘少奇上位，也是毛泽东的心愿和布局。而且刘少奇的态度、做派上比较严谨、凡事一丝不苟、原则性很强，适合主持国家礼仪。更重要的是，刘少奇这样一个纯粹的党内干部出任国家主席，不会从根本上（军队）威胁到毛泽东。毛泽东以为让刘少奇处理好政务就行了，不要涉足军队。然而那个时候想把军政分开很难，因为很多人从军队出来直接进入政府工作。大饥荒时代的五虎上将，都是从军队专业过来的。在庐山上，彭德怀写信固然忧国忧民，但矛头也是冲着刘少奇去的。而彭德怀当时的威望在军内正处于顶峰，身份是国防部长。

毛泽东让刘少奇走向前台，就是希望刘少奇能够出头解决严峻的局势，拿下彭德怀，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刘少奇表示支持。

两年之后，也就是六一年，大饥荒最严重的那年，毛泽东进一步表达了对接班人的看法。这一年，蒙哥马利访华。九月二十四号，是咱们的中秋节。这一天，毛泽东准备再次会见英国陆军元帅，顺便一起吃个饭，蒙哥马利也很高兴。两个老人彼此说了一番客套的话，然后谈了一些问题，很开心。

在开心的氛围下，蒙哥马利趁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蒙哥马利提出：“我认识世界各国的领导人，我注意到他们很不愿意说明他们的继承人是谁，比如像麦克米伦、戴高乐，等等。主席现在是否已经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

毛泽东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蒙哥马利又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

毛泽东说：“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

毛泽东这一次和之前不同，考虑让刘少奇成为这个国家真正的掌舵人，主宰几亿人的命运。这也是历史上打算让位刘少奇的历史证据。但是这话有一个前提：我死之后。然而更多应该是一种勉励。毛泽东仅仅年长刘少奇五岁而已，而且他的身体素质更好一些。

这话还有弦外之音——蒙哥马利听不懂的弦外之音，要联系当时的大环境来解读。因为六一年是大饥荒最为严重的年头，是最需要刘少奇的时候。此时的毛泽东和刘少奇还是一体的，两个人还比较珍惜几十年来的合作成果，政见分歧还没有表现出来。毛泽东支持刘少奇走向前台，就是让他在国家主席的位置上解决经济问题。

在毛泽东看来，如果刘少奇把问题顺利给解决了，接下来可能真的成为最高领导。即使毛泽东不死，也可能成为最高领导。既然如此，为啥又有后来文革的天崩地裂的那一幕幕呢？原因很简单，刘少奇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对。问题就是这么戏剧性，刘少奇解决了问题，但方式却不对，他不是用毛泽东希望的方式解决问题，而是和毛泽东希望的方式相反的刘少奇方式。不要说走上最高领导的岗位，最后连性命都丢了。

所谓政见，也就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已。

所谓政见不同，也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同。

既然都是解决问题，有必要因为方式不同而拼个你死我活么？在普通人看来是没有必要，在政治家那里却非常有必要，特别是在最顶尖的政治家那里更有必要。因为政治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成为最顶尖的政治家之前，身后必然有一大批粉丝和支持者、利益集团等。政治家代表的并不是他自己一个人，而是一大群人的观点和整个集团的利益。就算自己不愿意和对手拼命，粉丝们也会想办法置对方于死地。这些在文革中仔细讲。

大饥荒意味着啥呢？对广大百姓而言，意味着灾难。对政治家而言，也是灾难。政客结盟，为的是利益。政治家结盟，除了利益之外，还有另外一重含义：历史责任。说白了就是留名青史。当文天祥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时候，当谭嗣同高呼“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时候，都是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他们原本可以不死，但他们选择死，选择气节、大义、民族血性，把名字刻在史书上。古往今来，政治家的终极追求就是这几个字——青史留

名。

特别是中国人，没有神可以信，能做的只能把名字写在历史上——以光辉正面的方式。

青史留名这东西听起来很虚，那是因为咱老百姓离那个境界很远。比如说国破家亡而又肩负重任时，你就需要考虑究竟要选择当文天祥还是洪承畴。比如说那位兼具才华、相貌、私德的好男人汪精卫先生，一念之差把一切都葬送光了。同理，大饥荒时代的农民只需要考虑肚子。如果处在毛泽东或刘少奇的位置，就需要考虑历史定位。如果两人政见不和，那就是火星碰地球。输的一方，将要在一段时间内为大饥荒买单，将输得一无所有。当我们惋惜两位大人物为何不能坐下来好好沟通一下时，其实不知道，他们都在准备为各自的政见而殉道，在为自身的历史定位而奋斗。

大饥荒是一个巨大的污点，任何一个政治家都不想如此巨大的历史污点落在自己身上。对毛泽东和刘少奇那个级别的人而言，不管合作了多少年，不管曾经关系多么亲密，涉及到历史定位时绝不含糊。因为他们和咱们这些老百姓不同，除了需要衣食住行之外，还要考虑自己在历史上的定位和评价。

所以就两人的争端而言，除非当年有办法让他们穿越到未来看一看，否则将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场巨人之间的较量，受难的将是巨人脚下的凡人。

七、困局

在第三篇里，我们说过，刘少奇在庐山事件上充当了政客。之所以说他当了政客，是因为他说了违心的话。庐山之上的刘少奇和彭德怀一样了解实际情况，早在他成为国家主席之前，整个一九五八年，刘少奇大部分时间在全国各地视察。五八年底，问题已经很严重了。这点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清楚。正是此刻，刘少奇走向前台。但我们不能说刘少奇就是政客，因为他是一个政治家。因为接下来他干了只有真正第一流政治家才能干出的事。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留下名言，说他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如果刘少奇也写一篇类似的文章，也可以写下类似的句子。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也是受任于危难之际。当时的国家形势非常严重，严重到何种程度呢？参照《大饥荒篇》。诸葛亮奉命去江东，仅仅要说服一个想抗战却对抗战尚有疑虑的孙权，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却要解决几亿人的饿肚子问题。

要说刘少奇上台之后就找到灵丹妙药，那也非常不现实，因为政治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

刘少奇是五九年初上台的，大饥荒从五九年持续到六一年。刘少奇真正调整政策是从六零年底开始的。中间飞五九年、六零年这两年在干嘛？在继续大跃进。也就是说在这两年里，按照惯性，刘少奇的身份还是毛泽东的学生，按照三面红旗的路子走的，即使有想法也没有付诸实践。当然，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比方说五九年弄出了庐山会议，等到把彭德怀批判完毕，已经是六零年了。批彭，意味着反右。反右，意味着继续左倾，意味着继续跃进。代表性的例子是此时的张仲良正在甘肃山寨秦始皇，鼓足干劲，正大搞特搞引洮工程。等到实在跃进不动了，又过半年，已经是六零年下半年了。

后来有一批人坚持认为，庐山会议原本是纠左的，因为彭德怀的信变成了反右。这话前面已经驳斥了。没有彭德怀的信，庐山会议也不可能纠左。神仙会上说成绩和缺点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鬼都不相信是在纠左。然而庐山会议在某种程度上确实给大跃进扇了一扇子。如果没有庐山会议，经济调整或许会早一点。早半年也好啊。当然这是假设。

正是在这两年的时间里，使得前台掌舵的刘少奇意识到：之前的政策不行了，再不改变，将要跌入历史的黑暗深渊中。转变来自六一年，具体来说是那四十四天。

正是那四十四天，使得刘少奇把思想变成行动，决定冲破一切。

那四十四天，刘少奇干啥了呢？呵呵，说起来并没啥了不起。既没有发明伟大的思想，也没有总结出什么理论，更没有做出任何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到乡下去转了转，和社会最底层的人打了一阵子交道，切身感受一下最下层的生活，仔细听一听最底层的声音而已。

如果非得总结一些意义出来：那就是运用自身的权力把所见、所闻、所想通过政策的方式表达

出来。

如果还要把这些意义渲染一番，那就一个词——与民谋利。

好吧，咱们来探寻一下刘主席的脚印。

八、非凡的四十四天

公元一九六一年，国家主席刘少奇外出视察。这一年他六十三岁了，按照传统观念，这个年龄的老人应该在家享受天伦之乐。对刘少奇而言，才刚刚开始人生中最辉煌的旅程。

旅程是这么开始的：坐着小汽车到处颠簸。在全国各地兜圈圈，六一年四月份从广东颠簸到湖南老家。一路上山还是青山、水还是绿水，还是祖祖辈辈见识过的山水。然而，此时已经是国家元首的刘少奇没心思看这些。他看到田园荒芜，想到食物匮乏。

四十年前，刘少奇离开老家，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那个看似触手可及的梦。为了那个梦想，曾经行走天涯，无数次出生入死。很多志同道合的同志都丢了性命，而他有幸活下来，并且有幸成为这个国家的当家人。

四十多年了，当年那个热血澎湃的年轻人已经成了白发苍苍的老者。一千多年之前，有一个叫贺知章的人经历了类似的情况，感叹曰：“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然而同样少小离家老大回的刘少奇可没这份心情。因为他不是生活在盛唐时代的诗人，他是危难之际的国家元首，身上有很重的担子。

在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刘少奇回过两次老家。二二年去安源罢工之前和二五年五卅运动之后回过老家住几天。前一次他在家乡遇见了老乡毛泽东，后一次遇到另一个老乡赵恒锡。赵恒锡还特意把刘少奇给招待了一番——在监狱里。老母亲惊得不轻，刘少奇出狱之后，老太太专门从乡下赶到长沙跪在儿子面前，要刘少奇不要干这么危险的事了。刘少奇则说：别的都可以听您的，唯独这事不能依您。比剧本还要感人，不是么？只有在民族危急关头才会出现这种画面。此后直到六一年四月份，刘少奇第三次回家。

此时的刘主席可不是回家探亲，更谈不上荣归故里或衣锦还乡。他甚至没有回老家看看，而是直接去了一个叫王家湾的地方。对他来说那是一个比老家还重要的地方。为啥呢？因为那里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养猪场，号称“万头猪场”，在大跃进中比较有名，属于先进单位。他要去看一看，为啥一个拥有万头猪的地方，老百姓却营养不良？

至此不禁想到晋武帝，听到老百姓挨饿，惊呼，为啥不吃肉呢？后人以此认定晋武帝白痴弱智。然而公正一点说，一群人天天围着晋武帝说天下太平、形势一片大好，想喝酒有酒、想吃肉有肉吃，然后听说没粮食了，自然联想到用肉来顶一顶。刘少奇第一站选择这个万头猪场，是不是也想到晋武帝的典故？他肯定也很疑惑。

四月二号这天，刘少奇来到万头猪场。从吉普车下来，首先看到一个破木牌，上面写着这里有一万头猪。当他走近，闻到臭烘烘的猪粪味，心里还有那么一点踏实。毕竟臭味和猪是联系在一起

的。走进去之后，就傻眼了，偌大一个地方，几头瘦猪而已，在早春的凉风中瑟瑟发抖。猪粪没人清理，所以臭烘烘的。

既然先进单位都如此不堪，一般地方还用说么？！刘少奇何等聪明，一眼就看出问题的所在。他也不含糊，立刻拿出老革命家精神：在猪圈旁边的一个空房子里支起一个帐篷，搭起一个小床，想找点稻草铺床却没找到，这样的临时办公室就弄好了。这可不是在作秀，因为周围既没有摄像头也没有新闻记者，仅仅一些随从而已，相当于古时候的微服私访。和小说、戏剧里那种绚丽多彩的微服私访不同，即没有奇遇，也没有任何曲折的情节，甚至相当枯燥乏味，乏味到咱们一般人未必能忍受。

他在干啥呢？就是走走看看，如同乡下老头子一样，走走看看。他看见清瘦的百姓，他看见浮肿的百姓，他看见衣衫褴褛的孩子在田里挖野菜而他们本该在学习或者玩乐的……他走在小路上看见了风干的人粪，用脚搓一搓，仔细看一看，发现里面尽是粗纤维，那是野菜吃得太多的缘故。

唉？唉！唉……

刘少奇在那个简陋的办公室里住了六天，干的就是这些事。当然，他可能也在看书、看文件、写文件、乃至发布命令。这几天里，走一走、看一看这些才是主要的。他躺在那个简陋的床上，应该想到很多很多吧？

这里是家乡，刘少奇对这个地方是最熟悉的，因为他就生长在这里。在他童年的时候，正是清末民初，军阀割据，号称民不聊生的时代，那个时代的农民也不过如此吧？他的心很痛。当初那个叛逆的少年已经成长为国家元首。如果时光可以折叠，年少时代那个热血澎湃的刘少奇应该对此时这个身为国家元首的自己感到不满吧？

俗话说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数口之家尚且如此，国家领导人就更不好干了。

怎么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不，要改变，不论付出怎样的代价。

此时很少有人知道国家主席住在破败的养猪场旁边，住在破败的养猪场旁边的国家主席却实地了解了这一切。可见当时的官僚化严重到何种程度，如果不是官僚化严重，何需国家主席亲自下来实地考察？！

刘少奇在猪圈旁边徘徊了将近一周之后，觉得差不多了，应该和同志们打交道了，那就干活吧，那就改变这一切吧！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二号，国家元首刘少奇去了长沙县广福公社的天华大队，住在一间简单的砖房里。他将在这个简陋的房间里度过十八天。这十八天里，他的行动将对此后的政策选择产生重大影响，很多人的命运就此改变。为啥选择天华大队呢？和万头猪场一样，这个大队是一个模板，是

其他地方学习的典范。要找工作，自然要从模范入手。

自农业合作化开始之后，天华大队就成了一面旗帜，三面红旗下的典范。此前中央曾有一个调查小组过来调查研究过一两个月，结论是，这里的人民很幸福，正在通往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上，正在感谢党和国家的政策。

就在刘少奇入住天华大队的前几天，《中国妇女》杂志上，还登载了一篇文章，专题介绍天华大队和大队书记彭梅秀的事迹，文章说：“由于以彭梅秀为首的党总支委员会认真贯彻了党的政策，领导群众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天华大队由贫穷走上了富裕。今年过春节时，食堂都杀了猪，有的食堂还杀了羊，杀了鸡，网了鱼；此外有白糖、饼干、白酒、海带、云耳、粉丝等副食品 13 种，每人都有一份。过年固然热闹，平日生活也不错，每个食堂，栏有猪，塘有鱼，蔬菜满园。社员家里还喂有鸡鸭，自留地里种有零星作物。余钱剩米，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在这个山窝里已成为现实。”根据这些记载，天华大队的农民们好像正在扛着三面红旗进入共产主义。

文章是官样文章，那年头特有的，并无多少参考价值。因此刘少奇也不信，还要实地调查一番。

其实要调查相当简单，只要去公共食堂、解开锅盖看看，看看大家吃啥菜、菜里有多少油就可以了。如果说那年代物质比较匮乏，好吧，菜和油不说，看看能不能填饱肚子。如果说大米和白面依然奢侈，那就看看有没有红薯或者土豆。老百姓，特别是之前的乡下老农民，靠红薯和土豆再加一点盐或咸菜就可以生活了，最多也就是瘦一点，也不至于浮肿病，也不至于进入死亡方程。对一个小小的农村大队而言，要调查生活，真的不需要中央来一个工作小组，调查研究两个月那么长时间，真的不需要。刘少奇就是这么干的，很快就了解了真相。因为根本就不需要了解，看看眼前那些淳朴清瘦的面孔、那些浮肿的人就明白了嘛。

——但是要解决问题并不容易。

按照惯例和程序，首长解决问题之前首先找干部做思想工作。第二天，也就是四月十三号，国家元首亲自出马召集大队干部来开会。这样的场景绝对不常见。一个大队也就几个村子，土地加在一起不过一两千亩，再算上几个小山头，能有多大？中国的领土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

在这个会议上，行政级别最高级的刘少奇告诉行政级别最低级的大队干部们：咱们就是摆一摆观点，不搞辩论、不戴大帽子、不批斗，就讲一讲问题出在哪里，咱改。

接下来轮到大队党书记彭梅秀发言了。虽然她只是一个大队书记，和国家主席的级别差了十万八千里，然而这次会议是要解决大队的问题，国家主席之后就她最重要了。她说：“主席讲得很清楚，我还是赞成办食堂，食堂的好处很多，从前妇女百分之五十的时间是搞家务，出工很少，办食堂以后，大家都出农业工，部分人进了工厂，比原来增加了收入，所以我主张：有条件的地方还是坚决办，积极办，但应自愿。”意思是咱们还是继续办吧，办食堂好处多多。当然咯，她也有难处，

国家政策么，不是一个小小的大队书记能左右得了的。她的话也可以理解为惯性使然。

刘少奇：“到底是把自愿摆在前面，还是把积极办好摆在前面？”

彭梅秀就说：“把积极办好摆在前面。我们食堂8户人家都愿意办。这两天开会讨论‘六十条’，没有找妇女队长参加，她们很有意见。”

彭梅秀只是一个大队书记，和国家主席刘少奇之间差了很多级。这也许是彭梅秀一辈子唯一一次见到国家主席。但是她毫不含糊，说了不少话。

根据王光美回忆：“在天华大队住下后，少奇同志先听彭梅秀同志的汇报。她讲得头头是道：田地多少，人口、耕牛多少，灌溉面积、粮食亩产、总产、征购任务多少，食堂、托儿所办得如何好，社员生活怎么怎么好，总之样样都说到了。但对于民情、灾情、退赔等等，她不是避而不谈，就是轻描淡写，说什么拆房子不多，已经安排好了，平调款也基本退赔完了。她还坚决主张继续办社员公共食堂。中间少奇问她一句：‘队里有没有得浮肿病的？’彭梅秀回答说：‘没有。天华没有人得这个病。’少奇本来是随便问问。我们在宁乡、韶山一带看到不少因为吃不饱、营养不良引起的浮肿病，就在天华大队我们住的王家塘，也有一户得了这个病，我们一起来的同志已经到他家看过了。现在彭梅秀竟然否认这一点，这引起了少奇同志的疑心。”

要不是刘少奇在养猪场住过几天，已经了解大致情况，估计还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情况还是不错的。估计之前中央那个考察组就是这么得出结论的。

前文提到刘少奇对大饥荒负有领导责任。他曾经积极拥护三面红旗，积极推动大跃进，积极推动办食堂。这些都是事实。但是问题到来，需要解决问题时，刘少奇同样极有成效。下来之后直奔现场，先去猪圈，再去食堂，衣食住行一律从简，三下五除二就触及到问题的核心。对比后来者们，这样的极为简洁有效的办事方式已经看不到了。现在领导下基层，不要说实地考察，能在前呼后拥、休闲娱乐之余看看报告就不错了。如果刘少奇也是这种工作方式，那么之后的一系列政策就不可能展开，他的伟大的政治家素质也不可能展现。

这是第一个回合，刘少奇和大队干部过招。接下来是第二个回合，双方阵容是国家主席和小队长。如果说大队书记在国家主席面前只是芝麻官，那小队长就是比芝麻还小的官，大队书记的下属。至于有多小，发挥想象吧。

还是老一套，国家主席先得给人家保证，不管说啥都不会成为右派。接下来就是：食堂到底要办还是不要办？是办大的还是办小的？怎么个办法？食堂办起来，也有些事情方便一些，恐怕缺点就不少，而且缺点相当多，不方便的地方恐怕更多些。现在就是办不办，办起来如何办，怎么更方便，各种意见都可以讲。就是这一堆问题。

接下来就轮到这个国家级别最低的官吏们发言了。

狮子湾生产队队长杨玉成说：我个人的意见，一个是办小，一个是不办。办小是为了便利生产，不办也是为了便利生产。

烟竹塘生产队队长常菊寿说：我的意见是办小食堂，一队数堂，这样便利生产。不办食堂，老弱残有困难。

大屋场生产队队长常寿先说：我个人意见要办，但要办小点。不办食堂，出工难得齐，开会安排农活不方便。

总结一下发言：这些是小队干部的意见，认为食堂应该办，但应该小办。这还是比较委婉的说法，毕竟嘛，对面坐着的可是国家主席。不久之前，国家主席还积极倡导办公共食堂的。在古时候相当于皇帝，弄不好就弄个啥罪名来了，还是小心翼翼一点好。看到了吧，大队干部认为大队应该继续在一起办大食堂，即若干村子在一起吃大锅饭；小队干部则说要办小食堂，即一个村子办一个小食堂，吃不是那么大的大锅饭。堂堂一个国家元首，听点真实的声音竟然如此困难！

刘少奇是何等精明之人，一眼就看出其中的门道。因此他立刻展开第三个回合的较量。

既然小队长认为应该小办。那么比小队长更小的是啥看法呢？在级别上比小队长更小的官已经没有了，只有老百姓了。第三个回合的双方是国家主席和老百姓。

国家主席把老百姓请到以野菜为主食（不要误解为绿色食品哦）的食堂里，让大家摆一摆各自意见。

社员说：“拿我个人讲，食堂还是有好处的。在食堂喂猪，可以保我自己的口粮。但住在食堂，我原来的屋空在那里，那里的自留地不能种。从前种自留地、搞副业，猪、鸡、鸭、蛋、芋头、豆子都很多，现在这些东西都没有了。”

社员说：“我们当社员的，总望过好日子，这个月望下个月好，今年望明年好，多生产一点多吃一点，也多支援一下国家。从前我们屋场四户人家，沟粪子不打多，至少有三千担，现在讲卫生，沟粪子没有了。各种各样的副业发展不了了。现在我们十一户的生猪，还顶不上原来一户人家的生猪多。猪不能发展，就没有肥料。现在油吃得少，人粪也不肥，讲一句不好听的话，像猪粪一样。我搬了三次家，因此很多家具搬得没有了。许许多多的事情说不尽，真伤心。”

如此这般，基本上都是这些。老百姓不懂那么多大道理，也无需操闲心，他们只管自己，管自己不死掉，奢侈一点就是——不挨饿。因此他们只说自己，说以前生活怎样，有多少红薯、芋头、豆子，养了多少猪、鸡、鸭，有多少猪肉，有多少鸡、鸭蛋，逢年过节都吃啥等等；至于现在，大家都懂的，无须多言。

看到这些话的时候，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就是咱们这个民族最基本的力量。在咱们中国，有史书出现的那一刻，所谓精英，所谓权贵，所谓王侯将相一直在做一件事：就是如何驯服农民，如何让农民归顺。数千年以来，中国农民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坚韧，承受能力最为顽强的一个种族。等到一个个王朝崩溃，精英腐化，王侯将相变成一团狗屎的时候，咱们这个民族都是靠最基层的农民浴火重生。

中国近代史也是一样，那些各种流派的大师专家学者，那些从世界各地回归的所谓精英，在民族危机面前束手无策的时候，当他们主张亲日、亲苏、亲英美的时候，最终的最终还是要靠这些农民再一次融汇成钢铁洪流，使国家再一次自立。作为钢铁洪流的引导者，毛泽东因此得以走上神坛。然而自立后的国家再一次陷入深重的灾难中，农民们再一次选择默默承受。

这就是老百姓的声音。没有说支持国家政策，也没有反对国家政策，也没有对领导人不敬，也没有说自己受过的伤害，更没有在抱怨。只说从前和现在，一目了然。还需要什么主义么，吃饭而已，吃饭才是一切主义的根本。他们承受了一切，却并没有要去追回什么，这就是中国的老百姓：淳朴、坚韧、善良、宽容。数千年以来一直都是这样，他们用他们那粗糙的、瘦弱的甚至丑陋的身躯支撑着中华民族。当这个世界其它古文明灰飞烟灭，而中华民族能够承受一次又一次的灾难冲击，最终延绵不绝，原因无它，就是这帮粗糙的、瘦弱的、甚至是丑陋的，同时又是最为坚韧、善良、宽容的群体支撑着而已。

现在已经无法知道刘少奇心里想什么了，应该也是五味杂陈吧！国家元首刘少奇原本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住过的房子刘少奇也住过，他们走过的路刘少奇也走过，他们的生活方式刘少奇了如指掌。因为接下来的行动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他已经决定彻底解决问题。

刘少奇找到一个叫段树成的人，是原来的党总支副书记——总书记彭梅秀的政敌（呵呵，大队也有政敌呵），因为在工作上和彭梅秀有分歧，受到彭梅秀的批判，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被撤职了。彭梅秀听说刘少奇找段树成谈话后，很不高兴，站在路上骂人，说“刘胡子”（胡须，可联系到胡荏，引申为没事找茬）一来就把天华大队搞乱了。一个大队书记敢如此叫嚣，只能说明一点：她的背后有一个巨大的利益共同体，她是背后有人撑腰的。如果刘少奇的身份不是国家元首，会不会被揍一顿扔出去了事？就像河南人民就地批判下来视察的中央同志一样。

段树成告诉刘少奇：“天华大队的粮食产量、养猪数、工分值等等都是虚报的，实际没有那么多。社员口粮一天只有七八两，不够吃。全大队患浮肿病的超过100人。”这些已经很恐怖了，还有更恐怖的。

段树成还说：“这里是先进单位，对外开放参观，上面给补贴；因为办公食堂，山上的树已经砍得差不多了；大队有一个篾席厂，是大队干部的吃喝点，干部经常晚上去吃喝，当然不得浮肿

病。”还能找到比这个更为恐怖恶心的事么？

中央那些人无论怎样想跃进，也不会通过这种方式来搞。所谓上面补贴，应该指公社和县一级，也可能是地委，这些人、这群官僚，怎么说他们好呢？联系到当今现实，那些总能在新闻里兴风作浪，抢头条的二代们，多半也是这样的官僚教育出来的。

现在说起大饥荒，大家把错误一股脑推到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或刘少奇等人身上了事。很少有人注意到中层官僚在中间起到的恶劣作用。为了所谓的个人前途、头顶的乌纱帽，连最基本的人性都没有了，竟然能想出通过补贴搞典型这种欺下瞒上的手段，真是高啊！

这大概是集五千年官僚厚黑之大成了吧？面对这群不要脸至此的官僚，是否可以考虑把朱元璋同志从阴间请回来？

离开天华大队，刘少奇决定回老家了。回老家之前，他还要到县委开会。县委书记一听到国家主席要来，马上乐呵呵地忙碌起来。国家元首啊，也许一辈子就一次的机会哦，招待好了说不准就是个机遇呢。把吃住招待安排一番，压抑着兴奋去迎接国家主席了。在县委大院里，县委书记看见几个人从吉普车下来，一个身穿蓝布衣、头戴蓝帽子的老头子从他身边经过，他也没有在意，因为他在等国家主席嘛。他没有在意老头子，却在意老头子身后的一位女士，就是王光美。县委书记认识王光美，立刻打招呼：“这不是光美同志么？刘主席呢？”

王光美指了指刚才那位老头：“喏，这不是！”

有眼不识金镶玉啊，真是！县委书记恨不得扇自己两耳光。当然他没有扇，即使要扇，也得先把国家主席招待好之后再扇。刘少奇也没要他招待，第二天就回乡下老家了。

刘少奇再一次睡在自己的老宅里。四十年前，他还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就睡在这里。那时候，老妈妈以及相关人等逼迫他娶妻生子、继承父业——继续种地当小地主。不堪忍受之下离家出走。四十年后已是今非昔比，然而躺在老房子里依然觉得难以踏实。

四十年前，年轻的刘少奇还可以闲来无事练点武术。四十年后，已经成为国家元首的刘少奇却连片刻的清闲也没有了。他的时间表很紧凑：会见大大小小的官员，看各种各样的文件。然而那些官员和文件让他很失望。官员告诉他说，困难确实是有，但困难的原因是这几年自然灾害太严重了。文件也是官员们写的，官员在文件上写到：困难确实是有，但困难的原因是这几年自然灾害太严重了。说的和新闻媒体没啥区别，京城里所有的宣传机构上都是这么宣传的，没必要跑到这里吃剩饭。

尽管有了万头猪场和天华大队的经历，刘少奇还是不放心。于是拿出杀手锏：找到一个四十多年的朋友——当年的放牛娃李桂生。老朋友相见，自然闲扯一番。两位老人家回顾一下童年往事，什么你偷过张家的枣子我摘过李家的梨之类的，哈哈一笑，无限开心。

当然刘少奇找李桂生可不是寻开心的。闲扯之中，刘少奇就说：“桂生啊，人们说去年干旱厉害，咱们那个安湖塘里的水应该干枯了吧？”

李桂生说：“没有啊，还有半塘水呢！”

刘少奇接着说：“应该不会吧。还记得咱们放牛那会，有一年也是干旱，安湖塘都干得见底了，每亩粮食还能收几担子，这两年粮食咋就减产这么多呢？”

李桂生同志又说了：“那个老伙计啊，照我看，去年粮食减产并不是因为干旱。干旱影响了一点，但不是主要因素。主要是‘五风’刮得太厉害了。”

李桂生已经垂垂老矣，且其貌不扬，既不当官也没啥才华，倒是敢于一语惊人，不愧男儿身啊！这大概是刘少奇听到最直接的话了，估计是李老头认为自己和眼前这个老伙计的关系很铁吧。不论如何，李老头子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很值得我们钦佩，足以让千万个拿国家俸禄的人羞愧。随后李桂生领到食堂参观。刘少奇在那里看到脏碗筷，看到食堂里唯一的菜——竹笋叶。他又看见瓶瓶罐罐里，所有的调味料只有一种——盐。李桂生告诉他：食堂炒菜只放盐不放油。

六十三岁的刘少奇从炭子冲步行去了赵家冲，去看望年迈的亲姐姐刘绍德。七十岁的老姐对他说：“老弟啊，你在中央做事，要给人家吃饭咯！”听听这话的语气，含有五分训斥哦。当世或许也只有她敢这么对刘少奇说话了。老姐弟久别相逢，理应热火朝天的，特别是弟弟当了国家主席的时候。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应该居家欢庆才是。红楼梦里，贾元春回贾府，那是何等笔墨。贾元春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妃子而已。村妇刘绍德竟然教训起国家主席刘少奇起来，听起来何等别扭啊！

对此刘少奇只能默然以对。因为他的外甥女鲁新秀告诉他说：两个月里，她所在的食堂已经死了十一人。她还告诉主席舅舅：她爸爸也死了，是吃糠粑粑太多，拉不下屎给憋死的。糠，就是五谷杂粮外面那层坚硬的外壳，一般是用来喂牲口的，且不能喂得太多，多了牲口也不吃。糠粑粑，就是把糠捣碎之后参合少量面粉做的馒头。少吃点没啥，吃多了就会腹胀不消化，便秘。

此情此景，情何以堪！

了解真相之后，剩下就是行动了。单拿出来看，刘少奇的行动并无太大价值，也就是跟大家说，既然大家不想吃食堂，那就不要吃了吧；还有一些其它的政策，诸如那个地允许私人承包一点吧。既然是国家主席发话了，那还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嘛。如果这样简单，六十多岁的人了，何必千里迢迢从北京颠簸到湖南受这份罪啊。为啥呢？因为当时的宣传力度和政策执行力度太强了。

可以这样设想一下，接连好几年，整个国家宣传机构都在宣传公共食堂的“优越性”。那个时代的人民还比较淳朴，对国家政府满腔热情，但理性不足。官员也差不多，讲究人事关系，强调对上级服从。虽然大家都不想吃这个大锅饭，却没人愿意挑头解散食堂。怕，怕右派帽子，怕左派打

击。食堂已经成了整个中国的一块“心病”，也成了刘少奇的“心病”。

为了触碰这个心病，刘少奇拿出六十岁老人家说话的劲头，不停地啰嗦。在天华大队，刘少奇在食堂问题上如是说：“食堂是社会主义的阵地，这是对的，这句话没有错，但这是社会主义的阵地之一，不是最主要的阵地。食堂是强制组织起来的，就不是社会主义阵地，是平均主义阵地。至于说食堂是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这句话不对。在食堂问题上，我们违背了群众的大多数，我们和多数群众的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吗？不是，群众不是反社会主义，仅仅是领米回家做饭吃，怎么能说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呢？群众一个是忍，一个是用怠工消极抵制我们，促使我们觉悟。”

这一大堆话之后还不行，继续啰嗦：“从实际出发，‘实际’是什么，大家不清楚，中央不清楚，省委也不清楚，县委也不清楚，公社也不清楚，大队也不清楚！从‘实际’出发，那个“实际”若干是假的。不讲以前，一直到现在，报纸上登的东西有些还是假的。现在报纸上天天报道的许多消息，什么生产队生产搞得怎么好，肥料搞得怎么好，种田搞得怎么好，等等，有些是假的！在这次退食堂当中，社员有什么意见，要让他讲，要讲一点民主嘛！一个70岁的老公公不是说‘这一下上面睡醒了’吗，这个‘上面’是什么呀？从你们公社算起，到县委，到省委，到中央，都是“上面”，过去都在睡觉，都不了解实际情况。”

如此等等这样一大堆话，现在看起来都烦心，真不知道当时听众是不是也觉得很烦。幸好当时是春天，要是夏天或者冬天，没有空调啥的，就更烦了。刘少奇就这样不停地讲，反正他是国家主席他最大，不听也得听，听烦了也得装作很受教的样子。讲了老半天，觉得差不多了（估计也累了），最后得出结论：食堂不讲散，讲退。愿意退的，自己退出去。愿意在食堂吃饭的，可以还在食堂吃饭。刘少奇建议天华大队党总支，由群众自愿选择退留。不久，天华的十几个食堂陆续解散。解散一个大队食堂就费这么大的劲。

在老家，那就更费劲了。好说歹说一大阵子解开乡亲们的心结，又发现另外的问题，解散食堂之后锅碗瓢盆都不够用了。大家本来也穷，吃饭的家伙还是有的。自从公共食堂搞起来，那些玩意都收走了，能在食堂利用便利用，不能利用的都拿去炼铁了。于是专门找县财贸部的同志开会，说给老乡们搞点锅碗瓢勺过来。

一日在乡下行走，听到一女子在哭，刘少奇上前问其故。女子曰，两年前共产风，生产队把她家从地主那里分得的房子给拆了，盖了养猪场。她没了房子，从此寄人篱下，两年内搬家八次。此次房主再次催逼搬家，她实在无处可去，故而哭泣。刘少奇再次召集干部，调查、讨论、研究这个问题。因为在大跃进的过程中还拆除过一批草房。把房顶的草拿去沤肥料，木头拿去当炼铁材料，铁钉啥的也为国家的钢铁事业做贡献了。

——芝麻大的一点小事，也得国家元首亲自出马。放在其他时候，小队长就搞定了。官僚化的

行政制度，害人不浅呐。

单独考察刘少奇这四十四天的行程，就是到猪圈转转，找基层干部开点会，找老农民聊聊天，另外看了童年时的玩伴。临走前告诉大家，食堂要么就散了吧，土地的事承包一点下去。这些本身都没啥大不了，特别是对一个国家元首而言，看起来小事一桩嘛。联想到曾希圣在安徽大规模分地，刘少奇这些活动好像更显得微不足道。

然而——联系到当时的大环境看，已经非常了不起。曾希圣和刘少奇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影响力也不在一个档次，刘少奇代表了一大批人。和曾希圣偷偷摸摸的分地不同，刘少奇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公开赞成解散食堂，这是啥行径？拿现在的官方评价是：这给私有制经济撕开了个口子。放在当时的环境中，这叫和三面红旗对着干。

如果不知道和三面红旗对着干有啥后果，可参照彭德怀在庐山时的遭遇。彭德怀的信里面可没有涉及到反三面红旗的内容。庐山事件的前前后后，刘少奇是主要的参与者之一，非常清楚。一句话，这么做的后果很严重。刘少奇在决定解散食堂的时候，对这些问题的方方面面考虑得很清楚，而且考虑了很多遍。

说他做这个决定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决心和毛泽东拼个鱼死网破，那是瞎扯。

或许在猪圈旁边，或许在天华大队的砖房里，或许在老宅里，开会时、谈话时、或者夜深人静时，刘少奇一定想过这样两个问题：毛泽东的态度和他本人的处境。

在这四十四天里，刘少奇抽空去了一个地方，清水塘。那是啥地方呢？就是一个小水塘。但是在四十年前，这个小水塘旁边还有一间旧房子。在那间旧房子里，他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那时候他刚从莫斯科归来，回来湖南搞工运。当时中共在湖南的领导人就是毛泽东，随后在毛泽东的安排下，刘少奇去领导省港大罢工，从此一飞冲天。这一次他再次回到清水塘，应该不仅仅是怀念两个人长期合作的情谊那么简单，还应该为了理一理两人的关系。四十年前，两个人在这个水塘边畅谈理想和信念，要推翻这个世界的和平。四十年后，两人分别是这个国家坐第一、第二把交椅的人，国家却并没有按照他们当年的愿望前进。而此时，四十年前的旧房子早已消失得不留痕迹，他怎么找也找不到，是不是暗示了什么呢？

毛泽东的态度无非两个：赞成或者不赞成。往好处想，赞成；往坏处想，不赞成。

一九六一年那会，谁也不知道毛泽东的态度，刘少奇也不知道。但是他会去想：想一想他和毛泽东的合作历程，想一想毛泽东的政策，想一想他所理解的毛泽东。

刘少奇当上国家主席，和毛泽东的提携乃至保护是分不开的。没有毛泽东的提携，就没有刘少奇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没有毛泽东的保护，刘少奇也可能已经被轰下台了。走上前台解决经

济问题，某种意义上也是毛泽东布的局。那么毛泽东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还在坚持原来的政策么？还是希望调个头？真的很纠结啊！

第二个问题就是自身处境的问题。国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虽然领袖是毛泽东，可是刘少奇是毛泽东的主要帮手啊。毛泽东制定政策的时候，刘少奇是主要参与者之一。政策出台之后，刘少奇又是主要的拥护者和执行者之一，从责任的角度上讲，无论如何也脱不了干系的。自从走向前台之后，他就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如何解决困难？

如何解决困难呢？刘少奇非常困惑。他小心翼翼地隐藏着这种困惑。五九年和六零年两年，他还是按部就班，按照既定路子走，也就是领导国家继续跃进，继续人民公社，然而形势并没有好转，大家的日子越来越难过。就连领袖毛泽东，也不再吃红烧肉，女儿饿得浮肿；就连刘少奇，也尽量不吃油；其他高级干部也是能省则省，如许光达的兄弟饿死在来京探亲的路上。然而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形势依然恶化。刘少奇的困惑越来越严重。

如果局势再这么走下去，抛开天下大义不谈，抛开天下百姓的苦难不谈，抛开国家前途不谈；仅仅从个人前途的方面讲，也许不用两年，刘少奇就得默默下岗，以一个失败者的形象跌入历史的垃圾箱中。那时候刘少奇的历史定位是啥？一个靠吹捧毛泽东攫取荣华富贵的政客而已，比康生之流强不了多少。那是他刘少奇想要的么？当然不是。

所以他需要改变。既然改变，就要背离三面红旗，就要背离之前的政策，就要背离之前的毛泽东。那么现在的毛泽东如何呢？还是之前的那个毛泽东么？他赞同变一变么？如果毛泽东赞成，一切都好办，以他的威望和能力，领导这次政策转变将容易很多。

然而如果毛泽东不赞成呢，这是一个风险，一个必须承担的风险。这个风险就是和毛泽东对抗。历史已经证明，和毛泽东对抗的人，最后无一例外地失败了，刘少奇能打破这个规律么？也就是说，一旦和毛泽东上演对手戏，有胜算么？刘少奇应该盘算过这一点。说真的，他没有把握。任何人在面对毛泽东这样的对手时都没有把握。不到万不得已，刘少奇绝对不想走到毛泽东的对面。现在恰好是万不得已的时候。因为假如他不冒这个走向毛泽东对立面的风险，下场会更惨——被历史淘汰。

所以毛泽东固然可怕，比起被历史淘汰而言，还是两害相比取其轻。况且也不见得就走向对立呢，也许毛泽东让他出面，就是要调整经济政策也说不定。如果是那样的话，就太好了，那么他将以最小的代价进入史册。换句话说，即使毛泽东还没有改变，那么他还有足够的时间去说服毛泽东改变。最坏的打算，走到最后一步，已经成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也是今非昔比，通过调整经济进入正轨，实力大大增加，不见得就没有胜算。如果整个政府机关倒向自己这边，到时候可以通过实力促使毛泽东改变。

在下决心解散食堂和允许部分土地承包之前，刘少奇应该仔细思考过这些问题，而且不止一遍。

此时他的心境应该和庐山会议之前思索如何表达意见的彭德怀的心境差不多——那就是不能再拖了。和彭德怀不同的是，他已经准备好对策。彭德怀写信之后就没动作了，然后任由别人对他开火。刘少奇不同，他做好了准备：有条不紊地出牌，从七千人大会到四清运动，刘少奇一直在努力出牌。然而遗憾的是，尽管在文革之前，局势发展和刘少奇的预期差不多，他还是低估了毛泽东的威望和实力。

调查结束之前，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如实汇报了所见所闻，然后就回北京了。这一天是五月十五号，从四月二号到五月十五号，前后共四十四天。

对刘少奇而言，这四十四天应该他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一段时间。在他漫长的一生中，取得过不少成就，有过不少高光的时刻。比方说，从一无所有到成为工运领袖，相当于白手起家到闻名全国，这就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成就。比方说，在白区时代，能够坚持十年而没有把命给丢了，就是了不起的能力。比方说当选为国家主席之时，举国上下搞庆祝，就是高光时刻。比如说第二次当选国家主席，在和毛泽东的冲突进入白日化时仍然当选，意味着个人实力和威望已经迈入一个全新的高度。这些都是了不起的成绩。在我看来，这四十四天才是刘少奇一生中最为光辉的一段时间。因为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做了一辈子最为重要的决定。这个决定对中国日后的局势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没有这个决定，刘少奇的身份只是早期工运领袖。拥有这个身份的还有很多，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项英、邓中夏、邓群、王荷波等一大堆名字。另一层身份是干过国家主席，随着时间推移，这个职位上也将有一串长长的名单。刘少奇之所以与众不同，只因为这个决定而已。在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人能因为一个决定影响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时代。

完全可以把这个决定称为——刘少奇决定。

现在已经无法探知刘少奇究竟啥时候下的决心，只能说那四十四天里的某一个时间段，刘少奇的精神意志上升到顶点，智慧之花猛然绽放，完成人生中一次根本性的蜕变。因此有理由认为，那四十四天在刘少奇的一生中是无与伦比的，是人生的顶点。

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有这么一个时刻，困惑你多年的问题猛然明晰。这个问题或许有点玄乎，有点像佛家讲的顿悟，也有点像西方宗教里的启示，好像没啥科学依据，但却是真实存在的。比方说王阳明龙场悟道，就是在一个穷山僻壤中，猛然想通了困扰半辈子的问题，突然明白——心即是理，从此成为一代宗师。比方说穆罕默德在创立伊斯兰教之前在山洞里受到神的启示。很多人对此不以为然，加以批判，我相信这是真的。如果王阳明和穆罕默德的例子不够有说服力，那么请看下面这个例子，爱因斯坦。尼泊尔时代，爱因斯坦还是一个专利局的小职员，正在思考一些问题，突然间他通过人在电梯这个封闭系统联想到广义相对论的核心——等效原理。爱因斯坦说，那是一个

启示，那是他一生中最为激动的时刻。同样的情况，海森伯在发现量子矩阵力学时也做过类似的描述，大意说那一刻仿佛看见了上帝之美。说这些有点跑题了，主要是想提醒大家，人生中某些特殊的时刻非常重要，需要谨慎对待。咱不是王阳明，不是穆罕默德，不是爱因斯坦，但是每个人都有困惑不是？

当然这个现象可以套用马克思主义学说，是量变引起质变，因为想得多了，所以豁然开朗，融会贯通。听起来科学多了，但是究竟啥时候才会量变引起质变，不好意思，没提，还得通过个人去把握那内心深处强烈而神秘的瞬间感受。把握住了，就知道啥时候量够了，引起了质的变化。没把握住，那就继续等吧。

所以这就应了那句俗话：人终究要靠自己。林立果想靠林彪实现野心没靠住；江青想靠毛泽东登天也没靠住。归根到底，不是林彪或者毛泽东不可靠，而是他们自己不可靠，只是好像他们最终都没有明白这一点。

九、第一轮较量

（一）刘少奇的经济手腕

看一看建国之后的历次运动，毛泽东拿下的重量级人物，从最初的高岗到最后的林彪，基本上都没有还手之力。高岗牛气哄哄地到了北京，干了不少看似牛气哄哄的事，毛泽东一变脸，立马完蛋。彭德怀和林彪在军界的影响力没人会怀疑吧？号称红军之狮和红军之鹰，毛泽东一出马，猛狮断爪、雄鹰折翅。毛泽东批判彭德怀的时候，彭大将军能做的只是一遍又一遍地解释再解释，解释完了然后再检讨，检讨完了就没有然后了——完蛋。林彪更是上升到了看似离顶峰只有一步之遥的位置，面对毛泽东的不满，能做的也就是拒绝检讨而已，最后实在扛不住了，便在匆忙之间葬身大漠。

有例外么？如果要找一个例外，就是刘少奇。

因为刘少奇坚持了四年，抗打击能力最强。虽然最终也是惨痛落败，但他却留下了种子。在他失败后的第十个年头，他留下的种子生根发芽，因为邓小平继承了他的事业。

我们说刘少奇是第一流的政治家，不仅仅是他勇敢地在铁板一块的公有制经济中撕开一个口子，还因为他的手腕和谋略。光有勇气是不够的，正如彭大将军，敢于顶住天大的风险，却没能拯救百姓于水火，因为他的政治手腕不够。刘少奇的勇气后面是手腕。通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手段之后，大饥荒结束了。

刘少奇的手腕和谋略体现在两个地方。第一个是经济，这是基础。

刘少奇上台之初，经济很烂，问题很多。一般来说，国家出现经济倒退，要么战争破坏，大家没办法搞生产；要么经济泡沫破裂了，大家没活干；要么就是这个民族太懒惰，不想干活，没办法搞。然而都不是这些问题，当时的中国是另外一个模样：开国之后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大环境是和平的，有利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结束，效果还不错；而且国民情绪空前高涨。这是政治家梦寐以求的建设环境。可是为啥弄出一个史无前例的大饥荒来了？很多人不明白，而且一直都不明白，毛泽东就是其中一个。

一开始刘少奇也不明白，后来终于明白了：就因为环境太好了。

这不是瞎扯么？答案是，一点也不扯。中国有句古话：水满则溢，月盈则亏，也就是物极必反。因为大环境很好，因为一五计划建设得不错，因为全国老百姓的积极性很高，所以干了很多不该干的事。上至毛泽东下至大队书记，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内，整个国家机器都在要求农民干了过多的活。农民要干很多事，除了吃喝拉撒这些基本生理需求之外，除了种地、喂牲口等本职工作之外，还要炼钢啊、干工程啊什么的，还要服徭役啊，还要高喊伟大领袖万岁啊什么的……太

勤劳了，干得太多。

不仅干得多，而且管得死，说大家必须参加公社，必须吃大锅饭，必须在一起干活，而且不准自己种菜、养鸡、养猪。一句话，因为环境好，所以干得多、管得死。因为干得多、管得死，所以导致成千上万的农民吃喝拉撒等生理功能不畅。

套用一句不太好听的古话：这叫滥用民力。在中国独具特色的王朝循环史上，滥用民力也是跟着循环的。比方说秦始皇修长城，比方说汉武帝无休止的征战，比方说隋炀帝搞京杭大运河，比方说朱棣天天去打仗，都是在滥用民力。大跃进本质上也可以理解为民力滥用。只有千斤力气，却去挑万斤重担，不扭腰才怪。

刘少奇所谓调整经济，就是把各项指标降低点，让农民少干点；解散食堂，把地分出去一点，就是不要把百姓管得太死。就这么简单，一点也不神秘。如此简单的事却造成了新中国历史上十几年的狂风恶浪！政治啊，总是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

（二）政治谋略

战争年代，讲政治军事；和平年代，讲政治经济。战争和政治的关系可以用那句名言概括：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可以概括为：经济是不穿裤衩的政治，政治是穿了裤衩的经济。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政治和流血联系在一起；和平时代，政治就和裤衩联系在一起。

前面分析到，刘少奇决定撕开公有制经济的缺口——解散食堂和分地——已经做了决定，即如何应付毛泽东。虽然他不愿意和毛泽东搞对立，却做好了对立的打算。这就是一流政治家和彭德怀、林彪那种军人政治家的差别。

刘少奇如何应对毛泽东呢？就是假如毛泽东不同意部分私有制，那就说服他同意。如果道理上不能说服毛泽东，那就通过组织实力去说服。

刘少奇五月中旬从湖南回北京，回京之前他给毛泽东打了报告，然后开始了自己的变革。变革成功与否，最关键的一个就是毛泽东。所以接下来他的最大任务就是获得毛泽东的支持。这个任务可以说是他自己派给自己的。当然他代表的也不止他一个，还有很多人。不论如何他要变革，要获得毛泽东的支持，而且是无条件的。

现在我们知道，刘少奇最终没有得到毛泽东的无条件支持，两个人从七千人大会开始，政见严重对立。然而在七千人大会之前，刘少奇并不知道毛泽东的态度，甚至一度从毛泽东那里获得过积极信号。

七千人大会对中国的影响非常之大。这场大会之前还有一个前奏——第二次庐山会议。毛泽东时代，一共有过三次庐山会议。五九年庐山会议，因为彭德怀事件闹得妇孺皆知。七零年那次庐山会议，又因为林彪弄得满城风雨。这两次会议大家都很熟悉。在这两场会议之间，还有一场庐山会议，即第二次庐山会议，却是神神秘秘的，犹抱琵琶半遮面。这次会议同样非常之重要。和另外两次庐山会议一样，这一次也是一帮人八月份上庐山。

第二次庐山会议的背景非常复杂：中苏关系已经破裂，全面论战，可能爆发战争；中印边境冲突日趋严重；越南战争又在升级，中国又要援助；因为中国搞核武器，有消息称，美国有意轰炸中国的核基地，这些都是现实威胁。每一个威胁都比今天的南海问题或者东海问题严峻。然而这还不算最大的威胁。因为美、苏、印这些威胁虽大，却不能威胁到中国的生存。最大的威胁来自蒋介石。蒋介石放话要反攻大陆。一九六一年，如果蒋介石真的有力量反攻大陆，那是一个绝佳的时机，因为大陆这边极为困难。国民党过来，如果转变策略，实行行之有效的土地政策，肯定能吸引一批人追随。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才是中共最大的威胁。

诡异的是，尽管有这么多威胁，第二次庐山会议讨论的却不是这些，而是农业和工业的调整问题。蒋介石以为中共讨论怎么对付他，派遣了大批特务，结果一无所获。蒋介石绝对想不到的是，这次会议主要通过了两个文件：《工业七十条》和《农业六十条》。

《工业七十条》确定国家对企业实行“五定”，即定产品方案和生产规模；定主要原材料消耗定额和供应来源；定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定协作关系。企业对国家实行“五保”，即保证产品质量、品种、数量；保证不超过工资总额；保证完成成本计划；保证完成上缴利润等等。就是这些东西，听起来如此简单，然而当时并不简单。这些看似简单其实不简单的条例把国营企业的生产秩序稳定下来。

最具意义的还是《农业六十条》，归纳起来有几点：一，减少公社的管理层次，同时明确了公社、大队、生产队的责、权、利；二，强调自留地长期归社员使用，自留地的农产品，不算在集体分配的产量和口粮以内，国家不征公粮，不计统购；三，大队占用生产队的劳动力，一般不能超过生产队劳动力总数的 3%；四，生产大队对生产队必须认真实行包产、包工、包成本和超产奖励，即“三包一奖”制。

主要就这些，就是把农民脖子上的绳索给松一松。正因如此，大饥荒得以缓解。

就在刘少奇到湖南调查时，其它人也在调查。一股调查风在刮起，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周恩来前往河北邯郸，重点对武安县伯延公社进行调查；朱德前往河南、四川、陕西、河北等省进行调查；陈云到上海青浦县进行调查；邓小平和彭真率五个调查组在北京顺义、怀柔进行调查。此外，中央还组织了一批调查组，前往各地农村调查，如习仲勋率领的河南长葛调查组，谢富治率领的河北邯

邯郸调查组，杨尚昆率领的河北徐水、安国调查组，陈正人率领的四川简阳调查组，胡耀邦率领的辽宁海城调查组，钱瑛率领的甘肃天水调查组，王从吾率领的黑龙江双城调查组，平杰三率领的山东泰安调查组，廖鲁言率领的山西长治调查组等。

调查回来即开会，会上大家均支持以刘少奇、周恩来为首进行经济调整。

这个会议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成是以刘少奇为首的政治局成员和毛泽东交换意见。交换的结果似乎是积极的，这就是刘少奇运用组织手腕的结果。因为在大会上，虽然毛泽东是最高领袖，在客观形势面前，在绝大多数人赞同刘少奇的情况下，毛泽东即使有不满也得保留。

一句话，刘少奇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有很多盟友。

庐山会议结束一个月之后，完成湖南调查工作四个月之后，也就是九月二十四号，农历八月十五，刘少奇收到一个积极的信号。

前文说过，毛泽东和蒙哥马利在武汉吃饭，毛泽东告诉英国元帅，说他的接班人是刘少奇。在一般人看来就是接班。然而站在刘少奇的立场上看，这个信号的积极之处并不在接班，而是在支持。意味着毛泽东支持他调整国家经济。只有支持经济变革，才可能接班。如果不支持，谈何接班？因此一般人听毛泽东的话听到的是接班，而刘少奇听到的是支持经济变革。

客观一点看，刘少奇听对了却又听错了。对的部分，是毛泽东说这话确实表达对刘少奇的支持；错的部分是，毛泽东虽然支持刘少奇，却不是支持刘少奇搞经济变革，在毛泽东看来，中央政策并没有问题。我们还可以回顾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在苏联和赫鲁晓夫的会谈。谈到国家主席接班人的问题，毛泽东说：第一个是刘少奇，这个人原则性很强。因为毛刘合作几十年，刘少奇一贯的原则就是坚定不移地支持毛泽东。毛泽东把原则性很强（一贯支持自己）推上前台，是为了让他经济变革？

经过一系列调整之后，到六一年底，全国局势基本稳定了。虽然还是穷得稀里哗啦，但那个万恶的死亡方程式已经消失了。政府不再过分征收粮食，并且补充了一些食品，诸如红糖等简单的副食品。红糖这玩意对现代人来说可能微不足道，吃了极容易发胖，又可能导致三高指标升高。然而在大饥荒时代，一碗糖水就能救一个人的命。在那个时代，百姓不再饿死，就已经是天大功劳，所以刘少奇的威望空前提升。身为国家主席——这是他应得的。

不论如何，刘少奇听到毛泽东和蒙哥马利的谈话还是欣喜不已。毛泽东的支持，变革意味着成功了一半，接下来需要再接再厉。当然，这仅仅是一个暗示而已。刘少奇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依然做了两手准备：希望从情理上和组织上说服毛泽东。

这两手准备，将在七千人大会上亮相。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给予毛泽东充分照顾。情理上，

刘少奇照顾了毛泽东的面子，没有否定三面红旗，说三面红旗政策是对的，说之前对彭德怀也没有问题。说到经济建设，也没有否定成绩，说成绩和错误是七比三，实际应该反过来。组织上，刘少奇揭开大跃进的盖子，使得继续跃进已无可能。毛泽东没想到刘少奇会来这一手，于是憋了一口气（江青语）。从此二人你来我往，各自出牌，直到彼此离开这个世界。好吧，就让我们来看一看那场神奇的大会。

（三）七千人大会

会议，是中共的法宝。许多搞不定的事，通过一系列会议就能神奇落实。比如说遵义会议，就神奇地把红军从死路带回到生路。当然，会议有时候起到相反的功效，比方说庐山会议。上山之前，彭德怀还是民族英雄，几十天之后下山，就变得和茅坑里的石头一样臭。

对许多共产党员而言，会议就是精神粮食，如同基督徒到教堂做礼拜一样虔诚认真。

若问共产党一共开过多少次会议，恐怕已经没法统计了。这些会议中的绝大多数都进了历史的垃圾桶，但也有一小部分影响深远，比方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凡是那些有影响的会议，都有鲜明的特点，比方说第三次庐山会议，关于是否重新选国家主席，导致了毛泽东和林彪的冲突。七千人大会，也有自身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人多，这些人员包括：包括中央政治局领导和中央各个局的领导，包括各部委的领导，包括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领导，包括市级领导，包括县级领导，包括重要矿山、企业的领导，加在一起共七千一百一十八人。所有这些人于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号集中到北京开会，史称“七千人大会”。

七千人大会的最大特点就是算账。当然所有会议都是在算账，比方说，遵义会议是算博古、李德的账，庐山会议是算彭德怀的账。七千人大会却不一样，虽然也是算账，但算账的方式不一样。在谈算账的方式之前，先看看算账的原因，书面语叫做会议背景。

最根本的原因当然是大饥荒。没有三年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县委书记们、县长们、矿长们、厂长们是没机会和中央领导在一起开会的。这些人在农民、工人面前还是很不错的，然而在中央首长面前，不过是七品芝麻官或者更小一点。

直接原因就是河南信阳事件。在大饥荒篇章里已经介绍过信阳事件，即使在大饥荒年代，信阳事件依然令人震惊。当时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讲话中说：“我到光山（信阳地区的一个县）去看过，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确实是这样，这不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攻击我们，这是真的。”1998年邓力群回忆说：“我的一位老朋友彭大章（中南海秘书室的负责人之一）从信阳调查回来，对我讲：老邓啊，问题真严重啊！说时神色惨然！后来先念同志也去

了，回来讲，他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

就连向来处变不惊的毛泽东在获知信阳事件后，当天立刻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命周恩来抓紧制定一个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亲自审阅修改后传达。

第三个原因应该就是高层分歧，主要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周恩来虽然行动上和刘少奇相去不远，但是态度上则是跟随毛泽东的。邓小平虽然跟随刘少奇，当时他的能量还不足以影响刘少奇和毛泽东之间较量的天平。应该说这个时候的分歧还只是潜在的，还没有表现出来，但是已经无法改变。

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为首的一帮人虽然要对经济进行调整，但还不至于要背离原来的政策。在刘少奇看来，《农业六十条》还不够，需要加大力度。

如果仅仅是微调，毛泽东是支持的。毕竟大兴调研之风是毛泽东提倡的，信阳事件之后，毛泽东亲自修改了周恩来制定的《十二条》，一定程度上给了农民一点权力，甚至允许农民留一点自留地，种点菜啥的也不再是资本主义尾巴。需要一个会议再次把思想统一起来，步伐协调一致，然后确定要怎么调整，但是不能超过一个限度。他希望刘少奇能够像以往一样配合自己去完成目标。

对刘少奇来说，仅仅微调是不够的。因为在他看来，小范围调整没办法从根本上扭转大饥荒的局面，必须加大力度方能解决问题。所以他也需要一个会议，把官吏们集中起来宣扬自己的观点。他希望毛泽东能够像庐山会议上一样再往前迈几步。

领袖和国家元首可以说各有各的打算，这种会议如果能达成一致观点才算怪了呵。

庐山会议就在这种情况下起航了，也就是算账开始了。算账方式有啥不同呢？在其它会议上，基本都是上级找下级算账，这一次不同，允许一部分下级算上级的账。比方说在安徽大组里面，大家群起表达对曾希圣同志的不满，搞得曾希圣灰溜溜的，吃饭都没人陪。

（四）幕后筹备

七千人大会和第二次庐山会议一样，属于组织内部会议，不对外公开，外界虽然知道中共在召开一场史无前例的大会，却不知道大会的内容。

俗话说，台前一分钟，台后十年功。谈大会的内容之前，先谈一谈大会的筹备工作，因为这样一个大会包含了很多东西。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审视七千人大会时，会发现很多不可思议的事。如此重要的一个会议，从筹划到召开，竟然只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那个时代的通讯能力是和现在没法比的。这两个月内，从主要领导人开会意向到意向转化为通知，再到把各个县、企业等相关人士全部召集到北京，效率

惊人的高。更为奇怪的是，通知各个地方官员到中央开会却没有任何开会的具体内容，只是说你们都来北京吧，来讨论一下问题。这么做可以解释为保密，实则不同。最初的七千人大会没有任何议程，主要任务就是讨论通过中央的一个报告，通过总结经验，统一大家的思想，反对分散主义，推动征购，就是泛泛而谈。之所以如此，皆因当时在中央内部也是矛盾重重，无法形成统一思想。

抛开思想不谈，先谈谈物质。名义上是七千人大会，实际来北京的可不止七千人。来到北京的不管官位有多小，但是在各自的地盘里，大家都是领导，带个司机、秘书啥的也很正常，加在一起多少了？这些人天南地北，不少人还说着家乡的普通话，拿出来骂人不见得有几个人听得懂。这么多人一下子来到北京，吃、喝、拉、撒、睡这些问题不是靠思想可以解决的

半个世纪之前的北京城，在规模、建设、服务各方面都和现在没法比。那个时候还实行计划经济，而且在计划经济最困难的时期——毛泽东的女儿浮肿、刘少奇的姐夫饿死的时期，北京城有多少宾馆、供应多少粮食都是有规定的。而且北京不比别处，那是京城，还有一些外国来宾，都需要招待，一下子多出这么多人，怎么办？慢慢办。

大会筹备工作是邓小平搞的，负责具体后勤安排的是杨尚昆同志。当时杨尚昆五十五岁，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正值精力鼎盛的时候，日夜不停、开足马力地干活。当然他一个人是干不完的，他需要助手。

杨尚昆有三个主要助手，号称三位巨头。三巨头分别是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吕展、北京市委副秘书长殷玉昆。这三个人在当时的北京城里肯定是挂不上号的，能混上三巨头美名，皆因为七千人大会，叶子龙负责会议组、吕展负责警卫组、殷玉昆负责生活组。这三个方面相当困难。

具体一点说呢，吕展的工作最杂乱，叶子龙的工作技术含量最高，殷玉昆的工作最难。

先说这个警卫组，主要是负责大会安全保卫工作。所谓保卫，最基本的就是保证安全。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代表广大人民，万一在北京代表人民时遭到人身伤害，那是十分影响政府形象问题的，丢掉饭碗事小，搞不好还要被审查。放现在，搞定安全就可以了。

那个时候的保卫工作和现代差别很大，除了保障安全还要保密。当时没啥先进的技术设备，不像现在这样可以在任何需要的地方安装林林总总的摄像头、窃听器什么的，那些玩意还没有大规模普及。而且很多人比较有来头，比方说国际友人，肯定要以礼相待，即使有证据也不一定能工作；比方说军方人士，不鸟你也没辄。因此保密工作就比较难。

这些还没完，除了保安、保密之外，还要保证会议供电，当时北京的饭店基本上都是一路供电，来个短路就会影响会议进程；还要保证食品安全，吃不好来个食物中毒，或者集体闹病什么的，影响多不好；还要保障交通顺畅，因为那时候开会和现在不同，毛泽东是个随性的人，时不时突然决

定某时某地讨论某个问题，必须保证代表们按时到达。还有其它的保证，比方说当年人民大会堂的上面是木质结构，万一来个电路短路着火了啥的，影响也是不好的，因此每次开会都要专人照看。

落后啊，没办法，就得靠人力补充。幸好那时候大家觉悟高、积极性强、精力充沛且不辞劳苦。

这些都是警卫组的责任，交给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吕展来管。万一出了差错，相信吕展以后的日子都不会好过，责任之重大对得起三巨头的名头。吕展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再看另一个巨头叶子龙管的会议组。

所谓会议组，主要负责落实参加大会的人员名单、大会的预算、接送、招待，还有一项比较重要的工作，就是搜集大会讨论的意见，组织撰写简报，向领导汇报大会的情况等等。听起来不算太难，实际上是一项技术含量极高的工作。

这么说吧，七千人在一起讨论，要顺利进行，就要分成不同的小组。分小组容易，要把不同的人分到合适的小组则是一个技术活。把安徽省的县委书记分到河南省里，那绝对要受处分的。而且把不同的人安排在不同的组里往往可以得出不同的结果。

领导需要什么样的结果，秘密就在分组里面。开会分组和战场上排兵布阵有着同样的奥秘。战场上，如何使用炮兵、装甲兵会直接影响战场的走势。开会也是这样，首先要摸清不同的人的政治观点，然后再相机而动。比方说需要批判某个人，就把他安排到一个反对派的组织里。在那里，那人将被置于密集的火力网之下，直到投降求饶。如果需要表达某种观点，可以把持相同观点的人安排到一个组里，形成一种强烈的诉求，发出响亮的声音，就如同在战场上集中使用炮兵的效果一样。其中奥妙，非一般人能掌控。

另一个难题是，必须保证各组的动态尽快传达到领导那里。这个环节本身不难，难处在于向领导传达信息的同时，又得保证不影响各组成员表达自己的观点。比方说四川一帮县委书记在表达对李井泉的不满，你不能直接说我要把你们的观点拿给领导了，那样谁还敢说话啊？谁不知道李井泉很牛啊？因此操作不慎，就会让领导摸不透底，后果很严重。

传递分多个层次，有常规传递，有给中央常委的快速传递，还有直接给毛泽东的特殊传递，极为快速有效。至于如何实现这一点，只能说那是一项高端技术，长期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技术。一般人不用去学这项技术，想学也学不到，学到也没用。

最难的是北京市委副秘书长殷玉昆管的生活组。难在哪里呢？答案很简单，当年生活极其困难。生活组，主要负责安排落实大会人员住宿的宾馆，一日三餐等。也就是吃喝拉撒睡，都要生活组来安排。

这种级别的会议，本来应该中央安排的。然而当年物质匮乏，而且人手不够，就把这项任务扔

给北京市委。北京市委在自家地盘里办事就方便多了。哪里可以住人，能安排多少人；哪里供应食物，供应哪些食物，以及如何供应食物，办起来效率比中央高。

名义上七千人开会，包括司机和秘书在内应该有一万多人。有人坐飞机来、有人坐火车、有人坐大巴到，何时到、住在哪里都是非常繁琐的工作。这一万多人中间，全国各个县都有，任何一种方言都有人会讲。有些人喜欢吃辣、有人喜欢吃甜、有人喜欢又辣又甜，要把这些人照顾好，谈何容易呵？然而在将近一个月的会议期间，还包括春节，大家都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非常开心，怀念、记忆一辈子。对此不得不佩服当年搞接待的能力。当然也可以理解为，这些人都是地方干部，到中央如同刘姥姥进大观园。实际不是这样，比方说有个县委书记在吃饭时要了一个辣椒，接下来吃饭，不管坐在哪里，面前总有一个辣椒。如此细心周到的服务，叹为观止啊！应该说大家当时是以心换心，所以彼此印象良好。

写这些是为了啥呢？就是想说说当年的组织效率。

把目光放在前台的同时，也看一看幕后。

整个大会期间，很多工作人员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劳动。很多工作人员是临时找的，不在编制之内，大会不管饭，干完活之后骑自行车回家吃饭，无怨无悔。

虽然如今已经很难完全统计他们的名字，即使统计出来也没办法写出来。但是不应该忘记他们，他们都是这场大会背后的无名英雄。正是这些无名英雄在背后的默默奉献才有了前台英雄们的叱咤风云。

——在此向他们致敬。

（五）报告暗藏的机锋

大会之前两件事比较难做，一个就是前面说的筹备工作；另一个难题就是起草报告了。报告本身可谓暗藏机锋。

六一年十一月十二号，毛泽东提出召开七千人大会，月底离开北京，南下考察，十二月十八号回京。毛泽东离开北京四天之后，也就是十六号，刘少奇南下广东疗养，比毛泽东晚一天，也就是十二月十九号回京。刘少奇回京第二天便主持一个小型中央会议，筹备七千人大会问题。

报告本身毛泽东没有过问，主要是刘少奇和邓小平来搞。刘少奇在京，起草报告由刘少奇主持；他不在那段时间，由邓小平负责。当然报告本身也不是邓小平或刘少奇亲自写的，由中央的秀才们写的，具体就是陈伯达、田家英、吴冷西、胡绳这几个人，都是党内有名的理论家，俗称笔杆子。陈伯达、田家英就不用说了，毛泽东的秘书。

吴冷西当时的职位是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他本来只干新华社的活，毛泽东让他去人民日报的。一开始他不愿意去，后来还是服从安排去了。去《人民日报》上任之前，毛泽东给他的告诫是：“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的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可以说吴冷西也是毛泽东深深信任、器重之人。胡绳也不差，当时是《红旗》总编辑，曾参与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

这么几个笔杆子当时都是毛泽东身边的人，对毛泽东的思想和策略非常了解。所以他们起草的报告走的还是传统路线，即以三面红旗为核心的比较规范的政治报告。这样的报告肯定四平八稳，对于绝大多数会议都没问题，但在七千人大会上肯定不行。因为七千人大会不一样，不是求稳，而是求变。求稳的话就不用把这样一批人召集到北京消耗国家资源了，所以邓小平和刘少奇都不满意，于是报告一改再改。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或许更早一点，刘邓二人捆绑在了一起。战争期间，讲刘邓，是刘伯承和邓小平；现在又讲刘邓，是刘少奇和邓小平。

当然也不能苛求这几个大理论家。这个报告过于抽象了，领导都没有具体指示啥的，只能按部就班来。他们认为按毛泽东的想法，肯定是成绩多讲点，多鼓一鼓干劲。刘、邓却希望多讲一点缺点，特别是刘少奇。一边是领袖，另一边是国家元首，任何一边都得罪不起。理论家们只是干活的，夹在中间也难做。

根据当事人吴冷西回忆：“12月22日，刘少奇看完第一稿专门到钓鱼台找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和胡绳谈话。他“劈头就说，报告的起草，还是1959年庐山会议上讲的那两句话，一是成绩讲够，二是缺点讲透。具体意见主要有：（一）过去四年的缺点、错误要摆开讲，有多少讲多少，放开手讲，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药，要使人出一身大汗，这才能接受教训。（二）这几年的错误，中央负主要责任，要在报告中代表政治局作自我批评，否则下面不服。一年来中央逐步改正错误，要求各地、各部门也改正错误，不能自行其是。（三）关于分散主义要列举表现事实，每个省、每个部都要有例子，一个也不能缺，这种现象太多，太普遍了。（四）这几年的错误，同党内的过火斗争，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只反右不反“左”、后半段否定前半段、会后又在党内普遍进行反右倾斗争，有很大关系，党内民主不够，使许多错误不能及时改正。少奇同志特别嘱咐我们：秀才们不要怕这怕那，束手束脚，要敢讲老实话，讲过头了也没有关系，反正是草稿，中央政治局还要讨论，错了政治局负责。”

刘少奇这一番话起了作用，理论家们再接再厉，再次一轮又一轮地改稿之后，刘少奇那里终于通过了，但在毛泽东那里又出了意外。报告一共三个部分，陆续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于十月十

号上午看完前两部分，写了批示。

毛泽东的批示如下：

田家英同志，告少奇、小平、伯达同志：

此两部分已经看过一遍，觉得好，但还没有细想，提不出不同意见，须要看第二遍，才有可能想一下。第三部分还没有看。因此建议：推迟3天做报告。在此3天内（1月11，12，13），扩大工作会议的同志们，先分组讨论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那个问题及别的问题（例如总理报告的二十二大问题）。请考虑一下是否适当？

这个批示中波涛暗涌啊！其中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疑点：毛泽东为何不看第三部分了？为何建议刘少奇推迟三天做报告？

这两个答案现在不难推测。一般而言，比较重要的大会，领袖不可能不看政治报告。何为领袖？最后拍板的啊。不看怎么拍板？不看第三部分报告的原因有两个：满意和不满意。

说满意，因为刘邓都是老助手了，工作向来比较靠谱可信。看了前面一点就知道后面也不会错，那就怎么办吧之类的。很显然这不太靠谱。如果真是这样，就不会有第二个问题了，应该立刻让刘少奇把报告发放给大家好好学习、分析、研究，以便解决问题，何必推迟三天耽误时间呢？要知道共产党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历来讲究兵贵神速的。现在解决民生问题，生死攸关，怎么可能白白浪费三天时间？

那就是不满意咯。直接说不满意也解释不通。因为毛泽东的身份是党主席，党指挥军队，党领导政府，这是不可改变的原则。如果毛泽东不满意，他完全可以跟刘少奇说，这个不行，还是改一改吧，咱们政策还是应该、如此这般。三天时间足够把报告改一改。就算刘少奇不同意，毛泽东也可以亲自修改，因为他本来就是最高领导，有权这么做。然而他没有这么做。

既不是满意也不是不满意，那究竟是因为什么呢？答案还是不满意——但有两种可能性。

按照毛泽东的风格，批示最后一句——请考虑一下是否适当——已经表达不满。看看他的电报和批示，很多重要问题都是这种口吻。他的意思应该是让刘少奇在接下来的三天里把报告改一改。这一点刘少奇是心知肚明的，因为他对毛泽东太了解了，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乃至思维方式，非常了解。毛泽东虽然暗示修改报告，却没有暗示再保守一点或激进一点。

此时刘少奇已经吃了称砣铁了心求变，报告里谈的变革远远没有达到刘少奇希望的程度。刘少奇没有把报告修改成他想要的那种样子，其实也在试探毛泽东的态度——对自己究竟支持多少。毛泽东这种表态让刘少奇很犯难，因为当时他也拿不准毛泽东的态度，究竟是更保守一点还是更激进一点。在没有摸清毛泽东的底牌之前，刘少奇把意见藏在肚子里。这就是政治家和军人玩政治的不

同。彭德怀不管三七二十一，一股脑把心思写在纸上，而刘少奇留了一手。万一毛泽东选择保守，意见写下来之后再修改，相当于扇自己巴掌。他可能被迫放弃自己的观点，也可能失去表达观点的机会，所以他采用了迂回战术。

那么毛泽东究竟是要保守一点还是激进一点呢？站在事后诸葛亮的立场上放马后炮，当然是保守多一点，应该多讲点成绩多鼓劲，但在当时却不好拿捏。之前的毛泽东虽然也是这个风格，但是大家基本上知道大方向在哪里，这个仗应该怎么打或政策怎么制定，为何在这个节骨眼上含糊不清了？有两个可能性，一是想考验一下刘少奇，看看刘少奇究竟是啥态度，刘少奇的态度代表很多人的态度；二是他自己当时还没有做决定，通过一系列考察之后还在思考。既然如此，索性不做决定，先摸摸大家的底。

刘少奇已经不想再等了，所以会议的进程并没有像毛泽东建议的那样有所更改。他将他的意见放在肚子里，一直藏到一月二十七号那天才倾吐出来，给代表们造成极大震撼。按照原计划，一月十一号，代表们拿到了报告，然后炸开锅，第一波高潮来了。

还有一个问题，毛泽东为何在批示上强调第三部分没看？这是那个批示中最暧昧的一句话。答案是：他是想置身事外，表示他对这个报告不晓得。这也是毛泽东的风格，他自己没有形成明确的想法之前先摸摸大家的底，然后才综合起来做一个判断，判断下一步该怎么走。历史上的毛泽东，都是充当最后仲裁者的角色，这次也是一样，他要超然物外到最后当仲裁。这也是他胜过蒋介石的地方。蒋介石总是亲自卷入各个派系的争斗中，时不时来一场大战。而毛泽东总能做到超出派系之外。这是领袖的境界问题，这里先不谈。

为了达到置身事外的目的，毛泽东建议报告不经过政治局讨论了，直接下发。因为经过政治局讨论的话，他就要参与讨论，即使不参与，也会有人汇报，就要面临表态的问题。当时的局面非常复杂，在没有形成大致的统一认识之前，领袖轻易表态可能导致矛盾激化。

所以就有那个奇怪的现象，在如此重要的会议上，在政治局常委没有论证报告的情况下，代表们已经在讨论了。当然这么做也有道理，因为导致大跃进的一切政策都是政治局通过的，结果弄成了如今的局面，这次改一改方式也没啥不好，所以刘少奇也认同这个办法，把报告直接下发了。

（六）第一波高潮

东至海滨、西至高原、南至海岛、北至漠北的代表们，代表不同的地区、民族，使用不同的语言，共聚北京。这一刻非常不容易，在中国几千年的史书上，像这样的时刻极为少见，更多的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的人们因为种种纠缠不清的利益兵戎相见。特别是中央和地方利益不一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兵刃解决问题。像现在这样，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九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不同

信仰、不同民族、不同言语、不同生活方式的同胞们能够收起刀枪棍棒坐下来讨论问题，还是第一次，其意义不亚于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

在这种团结向心力面前，高层政治家的纷争可以说是第二位的。有了这种无与伦比的团结，一切才有保证。

这是咱们这个民族经过数千年以来分分合合的纠缠，百年无尽屈辱之后的重新觉悟。但愿从今以后，这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百花常开；但愿从今以后，这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的人民健康长寿；但愿从今以后，这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月儿常圆，不再有屈辱和灾难。代表们于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号这一天在北京看到了刘邓起草的报告，然后这个报告变成炸弹，在代表们中间炸开了。

这些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领导进京之前，根本不知道中央葫芦里卖什么药。为了应对中央，很多人做了两手准备，真的一手和假的一手。也就是备两份资料：一份是歌功颂德的，另一份是实事求是的。到时候看中央态度，想听动听的给动听的，想要实际情况给实际情况。拿到报告一看，呵，这一次来真的了，又要实事求是了。而且定下调子说，这次开会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想说啥就说啥。

好吧，窝在心里的火气再不喷射出来还待何时？那就说吧，哭穷的哭穷、诉苦的诉苦、分析的分析，各个组里都是热火朝天。一个县委书记说，我家没米下锅，孩子还没消肿呢；另一个一听眼泪汪汪说那算啥，我家饿死人了；又有人说，哎呀，不要吵了，大家来解决问题的嘛，尽说那些琐事干嘛？于是大家擦干眼泪继续翻开资料开始分析。

毫无疑问，这些人中有一部分是官僚，有人多吃多占，有人打过右派，有人盘剥过百姓，但是大多数人还是尽心办事的，要不然国家已经瘫痪了。

大家吵吵嚷嚷，发泄心中的怨气，所以七千人大会又称为出气大会。这些气大致可以用四个问句来概括：犯了什么错误？为什么会犯错误？如何改正这些错误？谁负责？

先看第一个问题——犯了什么错误？

错误是极其明显的，每个人都带有一大堆资料：在省委书记的资料里，是省里人口减少多少，粮食缺口多少；在市委书记的资料里，是全市人口减少，住房缺多少，多少人现在还浮肿；在县委书记的资料里，全县还有多少人没饭吃，还有多少人外出没衣服穿。如此等等，太多了。只是衣食住行等方面，如果还算上炼钢浪费，砍伐树木、污染环境、强制拆迁房屋、强制征用土地……那就算不完了。

换成日常的话语，叫对百姓犯罪。

用政治术语来说，叫办事不力，辜负领导的栽培和人民的信任。

换成经济术语来说，叫国家 GDP 直线下滑。

历史评价：耻辱。随着时间的流逝，大饥荒将深深地影响着历史。若干年之后，教科书上关于大饥荒的描述可能是这样的：一群无私的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领导一个强力组织（中国共产党），引导一个积极乐观的群体（民族意识觉醒后的中国农民），造成了空前的灾难（大饥荒）。

将会有很多人从政治、经济、历史、哲学、文化等不同角度来研究大饥荒。这是一个比《红楼梦》更大的课题，将有一个学派叫大饥荒派，将有一种学说叫大饥荒学说，将得到很多的学术成果，诞生很多著名的专家、学者、教授，将会有很多政策来防止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

既然犯下如此严重的错误，总应该纠正吧？当然要纠正，大家来到这里就是纠正错误的嘛。在纠正错误之前首先得明白为啥会犯错。

原因无外乎那些。一个是自然灾害。那三年的自然灾害确实比往年猛烈。一些地方淹了，另一些地方干了，造成一部分地区的粮食减产。这是事实，但非主因。

其次是苏联逼债。这个也不是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就是政策失误了。当时的主要政策是三面红旗，三面红旗在当时还是不可动摇的。哪怕是刘少奇，也没有表示过要动摇三面红旗。因为在当时的认知水平下，动摇三面红旗，相当于动摇一切，以后的工作就没法干了。中国真正摆脱三面红旗，应该是在实施改革开放之后。所以不要指望那个时候否定三面红旗，因此大家只能在三面红旗周围找问题。

找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缺乏经验。确实，白区或者苏区干部，很多人虽然出身农民，却很少有种地的经验。他们基本上都是没有地，或者地很少，而且十八九岁就去搞革命了。革命是一条不归路，要么成功要么成仁，基本上没有种地的可能。解放之后，他们一下子变成各个部门的领导，但思维还没从斗争中转变过来。

比如说山东省委书记苏童，人家把三亩地的麦子放到一亩地里说这是一亩地产的，他相信了。以周恩来为例，吴芝圃去河南放卫星，请他参观，他去了。以刘少奇为例，刘少奇出身小地主，本来应该接父亲的班继续种地的，没想到投身革命，四十年之后成为国家主席。然而五八年九月份在江苏视察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参观中稻丰产试验田，他问公社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斤？回答说可以打一万斤。刘少奇不但相信了，还反问：“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的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看到这一幕是不是哭笑不得？以毛泽东为例，人家告诉他亩产一万多斤，他跑去找钱学森论证。结果钱学森说：从物理学角度上，如果技术条件满足的话，是可以的。

结果毛泽东以钱学森的话为依据，到处宣传。殊不知钱学森也和他一样，对种地是七窍通六窍——一窍不通。

这是经验的问题，然而问题并不是缺经验就能解释清楚的。领导不懂种地，但是在中国，啥都缺，就是不缺懂种地的。四九年建国，到五九年十年中，就算每年汇报一级，十年时间应该上报到中央领导那里去了吧？然而这事没有发生。相反，当毛泽东对农业没底时，主管农业的谭震林对他说没有问题。当毛泽东对炼钢表示担心时，计委同志告诉他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这一切意味着中间出了差错。差错是啥呢？往浅了说是骄傲自满：老子天下都能打，还搞不定种庄稼？事实是，还真搞不定。往深了说，官僚，官本位思想：老子当了领导就是老大，表示老子很牛叉，就是管理你们这些屁民的，你们要听话，好好干活，废话少说。几千年的思想沉淀么，没有这种官本位思想反而不正常了。即使现在还不是一样：地位高就表示能力强，不仅是当官的本领强，连种田都强——虽然从没种过田。看看各个高校内部，任何一项科研成果前面几位都是几个地位高的老头子。翻遍整个科学史也找不到哪个时代的科研靠老头子，只有在中国才能见到这种盛况，这种只应该出现在戏剧界的盛况。

当然没有谁承认自己是官僚，他们每个人都为国家出生入死过，当官之后自认为很勤政。勤政不代表能把事情搞定，对不对？勤政不代表能搞定客观规律。如果勤劳能解决所有问题，中国科学界早就拿诺贝尔奖拿到手软了。

官本位思想是不能承认的，骄傲自满是可以承认的。所以大家纷纷自我批评曰，我骄傲自满，脱离了现实。另一个原因是思想上的，就是左倾。谈大饥荒的教训，肯定绕不开庐山会议。正是庐山会议导致了反右，导致了各个省次一级的庐山，导致各个市、乃至县、村一级无数个山寨版庐山事件——即把很多人打成右派。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给右派平反势在必行。然而平反牵扯到一个人——彭德怀。因为在庐山事件上，彭德怀是标志性人物嘛。比如说陕西省三原县县委书记白玉洁，在第一次大会上的位置比较靠后，把望远镜给带来了，以便观察主席团上的那些大人物，同时还在寻找一个人，彭德怀。白玉洁回忆：少奇的报告里说对大跃进，对三面红旗讲了他的看法，困难严重讲了他的看法，我考虑到毛主席不同意那报告的观点，所以收回去了，另起草报告，这个我已经有了感觉，但是还不彻底，还留神的是，看给彭德怀平反了没有，给彭总平反了，彭总能到主席台上就能彻底纠左，彭总到不了就彻底不了，没有彭德怀，主席台上没寻到嘛。

——一个县委书记都能想到，其他人更是不言而喻。

然后是第三个问句，如何解决问题？在我们看来，如此严重的大饥荒简直是一团乱麻，要解决基本上是狗咬刺猬——无处下牙。放到今天，唾沫都能汇成海洋了。当时也不差，也是唾沫横飞，

解决问题很有趣。

具体来说就是反一个主义，叫分散主义。

那年代有很多主义，要多少有多少，但是这个分散主义依然非同小可。啥叫分散主义呢？要从苏联说起。建国之初，苏联很多地方就是中国的模板。苏联那时候搞计划经济，而且搞得很认真，说，计划即法律。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刻板的计划经济迅速官僚化，失去了活力，没能很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加上中苏关系恶化，中共开始寻找出路。

出路就是决策层决心突破苏联的框框，走自己的路，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即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也就是把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五八年六月，国务院下发文件，要求在近期内将中央管辖的轻工业企业下放 98.5%，重工业下放 96%。这就是所谓的分散主义，就是把原来属于省市级的权力下放到县级。

注意，权力是下放给地方政府，而非下放给企业，跟市场八竿子打不到一起。

这样一来就造成地方的权力过大。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经济体系，林林总总的小派系，却是大同小异，即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现在出了问题，又来反分散主义，相当于说地方没干好，把权力收回去。地方干部当然觉得憋屈。努力干活，好好炼钢，出了成绩是你领导的，有了责任让我们扛，我容易么我？自然是闹成一锅粥。

分散主义该反么？该。经过一番争吵、论证、指挥，领导也确实这么做的，反了分散主义。为了反分散主义，高人们给它罗列了一系列罪名：1、各自为政，目无中央；2、乱提口号，擅作主张；3、破坏计划，不顾国法；4、谎报封锁，风头至上；5、监守自盗，以邻为壑；6、生活特殊，像个国王；7、欺上压下，独断专行；8、资本复辟，亡党亡国。除了最后一项，其余基本属实，该反。反分散主义，就牵扯到另一个问题——责任问题。

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即谁来负责？

别的问题都好说，吵吵嚷嚷，口水唾沫横飞，争吵到最后总会有个结果。至于哪一个结果并不重要，领导还是领导，饭碗还在手上，衣食住行不用发愁，最多也就是不像之前那般风光了。这个责任问题就不一样了，追究到哪个头上，那是要倒霉的。况且这可不是小责任呐，死了那么多人，谁都扛不住的。那个吴芝圃不是牛气哄哄么？追究到责任之后，还不是可怜兮兮地说，引颈就戮也心甘。

为了避开责任，大家开始说了。有人说，既然分散主义要反，那么高指标要不要反？反分散主义，相当于上层踢下层的屁股。高指标则是上层给下层的任务，要反，上层领导自然脱不了干系。又有人说，既然分散主义要反，那么庐山会议左倾要不要反？说庐山会议之后党内生活不正常，说

高层思路不对。这个牵扯到彭德怀平反，很敏感。个别胆大的则开始怀疑三面红旗的正确性。还有相当一部分狂人认为，现在问题根本不是问题，还应该继续跃进，再跃几下就过去了。确实，到时候人死光了，啥问题也没了。

这些人分别加入激进派、观潮派、秋后算账派，你来我往、不亦乐乎，完全不知道这么争吵是在浪费全国粮食，如此争吵肯定不是办法。你让代表们去吵，吵个三年五载也不会有眉目。要看高层的行动了，当然高层行动也很快。

（七）大人物的态度

前面讲过，中共开会时有一套行之有效的信息传递方式。各个组的意见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上传。下面吵翻天的局面自然躲不过上层的耳目。下面之所以争吵，原因就两个，一个是今后该怎么办，第二个原因，也是主要原因，就是责任如何落实。这么一个巨大的历史责任，不仅可以压垮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派系，甚至可以压垮一个阶层。

报告发到代表手上之后第六天，也就是一月十七号这天，刘少奇行动了。他主持了一个会议。一共二十一人参加这个会议，主要成员都是老熟人了，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彭真、陶铸、李井泉、柯庆施等人，都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或者政治局委员，级别最低的是湖北省第一书记王任重，中共中央候补委员——都是实力派人物。

这么一群大人物在上面开会，目的是要解决下面的困惑。然而他们只是级别高一点，面临的问题和下面的那些情况一样，这些人也是争论得不可开交，从十七号争论到二十四号，将近八天，占了此次会议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这八天里，他们主要就是争论责任问题。

为了解决问题，刘少奇先从报告本身入手。刘少奇就说了，既然这个报告引起这么多意见，咱们来看看是不是报告本身出现问题了，要不要考虑修改一下，或者干脆不要了。

大家纷纷议论一番，虽然个别人对报告本身持保留态度，大多数人还是认为报告写得不错，有水平、有思想、有才华。连向来不太喜欢表态的陈云都说：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报告，鼓得起劲。那么就这么过了。

既然报告不需要推翻，那就找报告中的核心问题。解决了核心问题，其它事都好办。那么核心问题是啥呢？是不是就是反对分散主义？因为在这次大会中，大家提出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就是反对分散主义。

提到反分散主义，争论又来了。

陈云说：什么叫计划经济，就是要集中统一。半计划就是无计划。——反分散主义。

周恩来说：必须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鼓实劲而不是鼓虚劲，报告就是这个精神。言外之意——不反掉分散主义，鼓劲也没有鼓到实处，是不起作用的。

李先念说：集中统一，要讲北京话，讲标准话。——反分散主义。

李富春说：中心问题就是集中统一，什么叫集中统一？统一思想，统一方针政策，统一行动。——反分散主义。

刘少奇说：我们现在有些现象，类似南斯拉夫的企业所有制，自己搞原料。企业所有制，侵害了全民所有制。阎锡山搞过村公有。这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也能接受。请大家考虑一下，我们不反，修正主义来得快，搞不好也要出修正主义。刘少奇还说：商业满天飞，全国最少一百万人，是国营企业？社会主义商业？半社会主义商业？还是南斯拉夫？什么叫全民所有，省、市、企业、部门的商业是什么性质，如何管？这里面有个南斯拉夫性质的问题。

——又上升了一个高度。从实际角度出发，论证了反分散主义的必要性。在刘少奇看来，分散主义不反掉，甚至会出修正主义。

邓小平还说：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两条道路斗争，存在资本主义复辟可能，是个理论问题，有现实意义。……是1958年以前中央领导更集中？还是1958年以后？我脑袋里是1958年后分散，不是整体。真正的集中是少而精。最集中时，最民主，最能发挥积极性。——尽管说法婉转了一点，意思一个样，反分散主义。

以上诸位都是反对分散主义的，因为他们都是在中央工作，反分散主义，即可以把权力集中起来，又能因势利导，顺势把责任疏导到下面。暗示之所以出现大饥荒，是因为下面执行中央政策出了问题。地方大员也不是吃素的，看看他们的反应就明白了。

柯庆施：现在考虑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就是要集中统一，可是写法如何写？言外之意，中央就是强调集中统一，也不要从反对分散主义入手，因为那不是主要矛盾。报告里上海的例子，我不赞成改，就是后面改一句话，东西不都是上海用了。——柯庆施时任华中第一书记、上海第一书记，地方大员，很显然对反对分散主义有意见，当领导面不好说明，只能旁敲侧击。

陶铸：集中的原则没有问题，问题是分散主义怎样产生的，是下面搞的，还是个结果？分散主义如何反？——陶铸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地方大员，对反对分散主义有意见。

王任重：在湖北对反对分散主义的反映比较强烈。湖北省省长张体学曾明确表示，当前主要矛盾不是分散主义，是主观主义。几年来，发生的问题，是高指标，“左”倾蛮干。问题是出在主观主义上，不是分散主义。反分散主义，不反主观主义，分散主义也反不了。计划大，指标高，还能

不出分散主义？现在反分散主义，可不要反到县以下去。

客观地说，张体学的意见很有些道理。王任重大概受本省同志的影响，或者说从本省的情况出发，提出：湖北对过分集中和分散谁是主要的，意见不一致。要办供给制，一下都办。对 1959 年毛主席的六条指示是地方反对，还是庐山会议吹掉了？过去几年的缺点错误，是省委负主要责任，还是下面负主要责任？地委同志不赞成把反对分散主义搞到县以下。——一句话，就是对反分散主义不满。

彭真的观点很独特：分散主义首先是中央，不是地方。各部门逼中央签字。中央各部门有各式各样的分散主义。第二才是省、市委。分散主义，不能通通地归结为资产阶级思想。北京市的来料加工，有的是给中央各部干的，有的是给天津干的，有的是给军委干的，这都是资产阶级思想？计划缺口很大，只给三分之一的材料，这能叫无产阶级思想？我们给人家的材料就是不够，你叫马列主义，他叫资产阶级思想，叫目光短浅，市侩习气，政治庸人！你那么马列主义呀！照报告里说的这些内容，势必要把这里这些人的责任都搞清楚。——彭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市委书记，算是特殊的地方大员，因此观点独特。

听彭真这么一说，柯庆施立刻插话：如果这样讲，我们就要求中央审查，看我们这些人是不是这样的人。态度亮出来了，不买账。如果地方不买账，中央也没办法。地方这些人也是政治局的，虽然资格没有中央那几位老，却也不容忽视。何况中央那几位也没最后拍板权。上面还有一位领袖。领袖跟柯庆施、陶铸这些人关系非同一般。

基本上就这样，在中央工作的上级，同意反分散主义，把权力上缴的同时暗示责任在地方。地方的大员们，虽然表面上尊敬领导，说话委婉客气，但是对反分散主义有意见，认为还要反主观主义和高指标，那样意味着中央也有责任。虽然讨论了无数种可能，说了无数冠冕堂皇的话，核心没变，就是责任问题。

人嘛，都是趋利避害的。虽然他们都是政治家，心系国家，确实想解决问题，并不表示他们愿意个人买单，因为付不起那个账。

如果柯庆施回到华东开会，或者陶铸回到中南开会，效果也是一样，肯定是柯庆施、陶铸这样的领导强调反分散主义，下面的人也说要反高指标。

其实这一切一句话就能概况：这个大会既然开了，就要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要交代，就要落实责任问题。然而这个责任太大了，没有人愿意承担，也没有人承担得起。对此大家都心知肚明，因此争论到最后决定把报告再改一改，采取折中的态度，大家一起负责，也就是说全部自我批评检讨。只有大家团结一致才能承担起这个责任。换成个人，即使挫骨扬灰也是担不起的。其实这只是暂时和解，渡过难关而已。未来的四清运动，乃至文革，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谁为大饥荒负责。

既然说到责任，就绕不开毛泽东。这帮人虽然足够大了，还不是最大，在他们上面还有一个人，就是毛泽东。在下面他们是领导，然而在毛泽东那里他们是下属。对下属，他们讲分散主义，把责任引向地方。对领导毛泽东，他们又该怎么办？

到现在为止，毛泽东除了写下那个批示之外还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仿佛置身事外一般。在现在看来，大饥荒，毛泽东应负领袖之责，然而半个世纪之前却不是这样的。那时候毛泽东高高在上，基本上是不会犯错的。如何定位毛泽东，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考虑，不同的考虑导致了在此后的岁月里不同的命运。

最勇敢的当属彭真：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我们对毛主席不是花岗岩，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的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帐。书记处最大的错误是没有调查研究。

这段慷慨陈词，不仅成了七千人大会上的亮点之一，也成了彭真一生的亮点之一。彭真彻底过了一把英雄的瘾，成了惟一个在大会上指名提出毛泽东犯错误，并且应该进行检讨的人。这段话日后成了中共历史上的一段经典发言载入史册。

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当英雄注定是要付出代价的。

接下来毛泽东忠实的粉丝陈伯达同志向彭真开火了：我们不要做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也胡说八道过，要检查。我们还是要根据毛主席的指导思想办事。我编辑主席的语录有很大收获。他告诉我们，如何管理中国。要根据主席的指导思想来检查自己的工作，是不是符合主席的思想。彭真同志昨天关于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主席的工作？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中央不能集权。农民是相信中央，相信毛主席的。乱搞一气，不是主席的政策。

看来，当英雄真的不容易啊！因此英雄那么可贵，我们需要英雄，历史也需要英雄。没有英雄的现实是无聊的，没有英雄的历史是懦弱的。

对彭真而言，陈伯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后来的人。比方说江青，就把彭真折腾得不轻。比方说在场的柯庆施，他虽然没有直接批判，但是作为刘少奇永恒的对手，他在上海培养了一批人才，如张春桥、姚文元。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将见识这些人的威力。

然后是邓小平。邓小平就说：我们到主席那儿去，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

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邓小平的话和彭真一个意思，即毛主席也是有错误的，也是可以批评的。只不过他说得很艺术，引用了毛泽东自己的话为自己开脱。正是靠这份“艺术”，若干年之后文革兴起，刘、邓一起倒下，刘少奇身死而邓小平留下有用之身，最终东山再起。

刘少奇：有些地方不承认天灾，或者只承认三分，七分是人祸，像河南、甘肃。西北有些县的同志，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中央应首先负责，第二是省级，再是他们。我看，这个话许多人心里有，只是没有讲，现在他们讲出来，就是提高了。——角度不一样，意思相同。此时显然不是刘少奇表演的舞台，他需要一个更大的舞台，所以没有把真实态度完全亮出来。

遇到大事总少不了周恩来的表态。

周恩来和以上三位不同，他说：在目前困难时期，要顶住，承担责任，全世界都指望我们。主观上的错误，要着重讲违反毛泽东思想，个别问题是我们供给材料，情况有问题，应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如果不违反“三面红旗”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确成绩会大些。调查工作进行后，情况正在好转，但不能过分乐观。经验现在还不能完全总结，还是初步总结。主席讲过，不经过反复，不能取得教训。现在不是弱了，而是强了。过去几年是浮肿，幸亏主席纠正得早，否则栽的跟头更大，要中风。现在的问题是要争取时机，不怨天，不尤人，发愤图强，埋头苦干。不吹，不务虚名，要谦虚谨慎，骄傲总是危险。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挽住狂澜。现在要全党一心一德，加强集中统一，听“稍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这是当前工作中的主要问题，不解决，寸步难行。如粮食上交 130 到 150 亿斤，就很难。1959 年认识钢材，1960 年认识煤炭，1961 年认识木材，我们这些人真笨。不一心一德，集中统一，就不能解决问题。如果这一点思想不通，辩论三天三夜也可以。

——周恩来的话很明显，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不要扯上毛泽东。这是周恩来的一贯策略。

现在看起来，周恩来这话让人费解。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要说周恩来所见所想没有刘少奇、邓小平多，那也不现实。以周恩来的才华、智慧、以及掌控的社会资源，均不比刘邓差。周恩来这么说，更多表达一种政治态度，其中的原因后面再分析。这里只需要支持，若干年后，当刘邓被当成走资派，被打翻在地时，周恩来的身份仍然是毛泽东的合作者。而此时的英雄彭真，已经在刘邓倒下之前摔得脊背着地。

周恩来之所以提出另一种论调，至少在当时，还是很有考虑的。大会本来就是集权，权力集中到哪里，自然集中到中央。中央领袖是谁？毛泽东。中央权力自然要集中到毛泽东手中。如果此时去追究毛泽东的责任，那么意味着集权本就不应该。刘少奇人应该也想到了这一层，想到了还要去做，只因为他准备大干一场。选择决定命运，正是在这一瞬间，不同的选择决定了他们日后的政

治命运的不同。

现在有一个有趣的说法，比方说，周恩来当时如果采取和刘邓同样的立场，以后会怎么样呢？以周恩来的威望和办事能力，加上刘少奇和邓小平能阻止文革么？这是一个假设，不太容易得到答案。个人认为，答案倾向于否。如果周恩来选择和刘少奇一起，也许文革会晚一点来，但终究还是要来。

（八）舞台上的刘少奇

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号，人民大会堂。

这天北京城将近零下十度，很冷。代表们的心却暖起来了，终于能见到毛泽东了，终于可以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会议了，最重要的是——责任问题弄清楚了。

通过前面的一番折腾，大致问题都落实了，虽然未必客观，却有了说法，也就是有了交代。最重要的是责任落实下来了，集体负责，都有责任，都没有责任。

这样看起来是和稀泥，然而想不到更好的办法了。问题已经出现了，唯有解决而已。比方说河南的问题，吴芝圃愿意以死谢天下。真把吴芝圃给杀了也解决不了问题。杀了吴芝圃，下面的路宪文、马龙山等人也得杀掉吧，和他们同一级别那么多人难道也全部杀掉？杀掉之后国家谁管理？而且中央和吴芝圃有关系的领导也难脱干系吧，怎么办？和吴芝圃同一级别的李井泉、曾希圣等人怎么办？不可能全部杀掉，就是说吴芝圃想死也不能让他死，因为责任是集体的。

落实责任——是大会前半个月最大的收获。落实了责任之后，压在所有人心中的那块石头也就落地了，接下来该见领导人见领导人，该享受享受，该干活干活，心里暖洋洋的。

让代表们意想不到的，刘少奇已经准备给他们心里再添一把火，把他们已经回暖的内心加温到火热。

从一月十一号开始，半个多月过去了，一万多人在北京吃喝拉撒睡了那么久，七千多人吵了那么久，也该碰碰面了，来个总会面了。把全国这么多人叫过来，领导不发话说不过去啊。于是中央决定二十七号那天来个第一次全体代表大会，这也是此次大会最为重要的一天。

很多人第一次有机会见到这么多高级领导，感觉很兴奋，很幸福，同时也有所期待。当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大家使劲鼓掌啊，掌声持续时间长达十五分钟——平时见一个也困难啊。

下午两点会议正式开始，然而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会议。

按惯例，大会开始前要有一个开幕式，说咱们为啥要开这个会议，要解决哪些问题。同时领导

人还会送给大家一点精神福利，说同志们工作辛苦了，代表祖国人民感谢你们之类的话。按道理说这是本次大会的第一次全体代表大会，也是毛泽东等人第一次跟所有与会代表见面，最高领袖也是全国人民的偶像应该唠嗑点啥吧，大家都期待着毛泽东能说点什么。

然而毛泽东却是单刀直入：“同志们，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今天开幕，请少奇同志报告”。把代表们的精神福利给省略了。

而刘少奇也没有客套，甩开湖南腔滔滔不绝地讲开了，而且一口气讲了三个小时。中间没看稿子、没有休息、没有提示，除了被掌声打断之外没有任何停顿。在开会史上，这是一个相当异常的现象。绝大多数的会议报告都要经过政治局或书记处讨论，领导复核，然后拿稿子去念，然后听众们带笔和本子，小心翼翼地记录着领导的话。然而此次刘少奇完全打乱了这一切。

一九六二年刘少奇六十四岁，参加革命四十多年，当选为国家主席三年，离倒霉还有四年，离生命的终点还有七年。

刘少奇的观点出乎意料：大家以为他只是把之前的报告上的观点总结一下，没想到一下子加了这么多料，惊讶之余又很兴奋。

前面说过在起草报告时，刘少奇没有拿出全部观点，开会时也没有亮出全部观点。因为那时候写出来或者说出来仅限于在高层内部，他没有搞清楚毛泽东的底牌。换成以往，他会等到毛泽东出牌之后再小心翼翼地跟进。面对大饥荒，他选择无论如何留一手，以免失去表达观点的机会。当着全体代表的面讲出来，才能最大限度地传播。代表们会把他的观点传播到全国。直到此时，刘少奇方亮出本色：不再是毛泽东的政治助手，而是一个有别于毛泽东的政治家。

如果说刘少奇在湖南调查的某个时候精神上“顿悟”，那么这篇演讲就是刘少奇一生中最为精彩的三个小时——他用三个小时把自己写进历史。

在这三个小时里，刘少奇用他的智慧做了一篇可以称之为“虎头蛇尾”的报告。通篇概况起来是这么几个台阶：承认问题的严重和政府工作失误，突破毛泽东划下的框框，这叫虎头；认为大跃进的成绩第一位，坚决支持三面红旗，这叫蛇尾。先来看看虎头和蛇尾。

虎头之一：承认问题的严重性。

刘少奇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当前的困难表现在：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1959年、1960年、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40%，或者还多一点。1962年的工业生产也难以上升。这就是说，去年和今

年的工业生产都是减产的。由于农业生产、工业生产都是减产，所以各方面的需要都感到不够。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

这是全场最为精彩的片段之一，之前的报告里都没有如此直接的表白。当年那个时候，正是历史上左倾最为严重的时刻之一，有意见要保留，想挑点毛病必须拐弯抹角，绕三路十八弯之后才能漏一点。刘少奇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如此说话自然反响强烈，大家一听，将信将疑：难道这次要来真的？

虎头之二：困难的形势是怎样出现的呢？为什么没有增产，吃、穿、用没有增加，而且减少了呢？原因在哪里？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到底天灾是主要原因呢？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来我调查了一下。那地方有几个水塘，我问他们：1960年这个水塘干了没有？他们说：没有干，塘里的水没有车干。塘里有水，可见那里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就全国总的情况来说，我在书面报告中是这样讲的：我们所以发生相当大的困难，一方面是连续3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所引起的。至于某一个省、某一个地区、县究竟怎么样，你们可以根据情况，讨论一下，实事求是地作出判断。

这就是著名的两个三七开之一：出现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是一个比较靠谱的评价，靠谱到直到几十年之后才被认可。几十年来，大饥荒一直被写成三年自然灾害，可以想象当年刘少奇提出这个论点时，代表们心中是何等震撼。

然而在任何时候，故事都是这样的：要在语言上与众不同容易，要把与众不同的容易付诸行动很难。正如现在若干自认为站得高、看得远的同志，整天叫嚣体制改革却从来拿不出具体步骤，搞得跟三闾大夫屈原似的。调子定得高，口号喊得响，却没有可行性。当年刘少奇也面临这个问题。如果仅仅是这两板斧，那么很遗憾，他将完蛋。因为按照这个调子下去，接下来还是要追究责任。

关于责任问题前面已经有了共识——集体负责。

这里继续追究必然追出新的政治运动，最可能的就是继续左倾运动，经济建设也不用再搞了。庐山会议前车之鉴还在眼前么。后来林彪在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后感慨：咱们这些带兵的丘八干不过拿笔杆子的。说白了，政治水平不够而已。刘少奇的目的恰好是要搞建设。要搞建设，把罪过的调子拉这么高是不行的。不仅在毛泽东那里通不过，就是在下面那些官吏那里也通不过。想想嘛，这些年来大家辛辛苦苦地干活，现在好了，你宣布人家都是错的，等于说人家都是笨蛋。人家都是笨蛋了，还怎么让笨蛋干活？换句话说，即使笨蛋听了你的话，顺你意去干活，那接下来再出错也情有可原，人家是笨蛋嘛！

换成一个政治水平不够的，大概到此为止，一阵激动过后闹得不可开交。庐山会议最后之所以闹成那个样子，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彭德怀捅了马蜂窝之后没给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刘少奇不一样，他有足够的政治手腕：来个大转弯，从虎头转向蛇尾。

蛇尾之一：另一个三七开：成绩和缺点是三七开。

刘少奇说：总的讲，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呢？书面报告上是没有这样讲的，那里只说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到底是多少，比重怎么样，书面报告上没有作判断。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这个问题，可以由各省委、各地委、各县委，实事求是地讨论一下，作一个初步的判断。

有七分成绩么？不信。相信现在也没人信，鬼都不信。死了那么多人还有七分成绩，要是成绩掉到五分以下呢？还要死多少人！即使刘少奇本人也不见得信。如果他相信这个，也就不会不顾一切去调查、调整、去跟毛泽东硬碰。

难道这么说只是忽悠人？可以这么理解，有忽悠的意思与必要。毕竟不忽悠的话，后果很严重。不忽悠又能怎么样？全杀掉或者拿下？开玩笑。刘少奇口头报告的最终目的是争取，把代表们争取到自己一边来，支持自己接下来的政策调整。忽悠只是一个手段而已，除了忽悠之外，这段话里还有两个信号：安慰与暗示。

可以理解为安慰：集体承担责任，既往不咎，回去好好干活吧。虽然错误很多，但是成绩更多，比错误多好几倍。也就是说你们不必过于畏首畏尾，干部还是你们当，活还是你们干，领导待遇照常。

同时也是一个暗示：三分错误的小辫子留在这里，干不好的话，呵呵，你们懂的。——这是毛泽东管用的手法，现在被刘少奇学到了。

事实上蛇尾之一还有另外一个作用，为蛇尾之二做铺垫。

蛇尾之二：全力维护三面红旗。

刘少奇：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但几年来在执行中有偏差，主要是更多地注意了多快，注意好省不够。

刘少奇：对大跃进的解释也有一些片面性，比如说，产量每年翻一番，要从一个历史时期来看。

刘少奇：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还看不那么清楚，不那么明显，人民公社可以增加积累，将来要实行机械化，这些一大二公的好处，要再过若干年，才能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对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特点，不能只根据现在的情况去断定，而应该看它将来的发展前途，人民公社是有前途的。我们说，人民公社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旗帜，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也会采取这种组织形式。现在看来，人民公社还是应该办的，问题是不要一下子全面铺开，不要搞得太急。

这条蛇尾太致命了。

问题的根子就在三面红旗，还要去维护三面红旗，还要拼了老命去调整？这是怎么了！当刘少奇决定解散食堂的时候，当他同意土地承包时，就已经在实际行动上背离了三面红旗，而言语上却又说得如此坚定！为什么？答案能找到两个。

第一个答案是，时代局限性。这个听起来像空话套话，但确实如此。观察刘少奇的一生，直到文革被打倒之后，刘少奇也没能从理论上突破三面红旗。不仅是刘少奇，其他人也没能突破。离三面红旗距离最远的是邓小平那句猫论——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唯结果论。三面红旗不仅是毛泽东的毕生心血，也是那一代人的毕生心血，是把几十年的革命斗争的经验移植到经济建设上的结果。这是极为重要的一点，将在毛泽东篇章那里详解。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大饥荒有其必然性，因为那是计划经济的死角，那种几十年之后才能看清楚死角。当时大家能做的就是分散权力或集中权力。然而不管分散或集中，权力都在政府内部。当权力分散到地方，惹来大饥荒。后期权力集中，又惹出各种运动。

分权或集权都没错，只是对象错了。分权应该分到体制之外，就是今天说的市场。遇到较大的风波，政府适当集权，如金融风暴来临，或者大面积传染性疾病（如非典）等，政府加强调整。仅仅在体制内部分权或集权就是在做无用功。

当然半个世纪之前的领导们并没有这种观念。

即使在当今，政府做得也不到位，该分的不分，该集的不集，惹出很多不必要的怨气。唉，又跑题了。

虽然刘少奇已经很优秀，做得很不错了，但不要指望他能在五十年前有更进一步的突破，因为他不是神，所以他被夹在虎头和蛇尾之间。几年之后，说他搞修正，某种意义上并没有冤枉他。只不过在今天看来，那年头应该多搞点修正而已，只可惜当时大家都不明白。

对任何一个思变者而言，必须有理论依据，要不然必然遭遇强大的阻力，特别是在变革对象依然强大的情况下。想成功，必须获得权力最大的那位的全力支持。商鞅变法取得巨大成功，是因为得到秦孝公的全力支持；秦孝公死，商鞅被五马分尸。王安石变法失败，宋神宗动摇了。张居正取得成功，只因为皇帝幼弱，皇帝的年轻妈妈对张居正很信任、很依赖。戊戌变法失败，皇帝没实权，有实权的慈禧老奶奶反对。

对此刘少奇心知肚明，所以他必须充分考虑到一个人。

第二个答案是一个人，毛泽东。这一次的口头报告，刘少奇算是亮出了所有的底牌。但是毛泽东究竟是啥态度，他依然不知道。好比两个人下棋，一个人的棋路已经完全亮出来了，另一个人还在思考。

总结一下刘少奇此次报告的最大收获：一个是一番慷慨说辞在代表那里赢得满堂彩，这些人相当于整个国家机器；另一个收获是突破了毛泽东的框架，具体来说就是那个七分成绩三分缺点。虽然远远没有到位，至少突破了毛泽东给大跃进写下的公式：九分成绩一分问题。翻译成白话，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话不准确，我说的才是对的。通过突破毛泽东的方式赢得满堂彩，相当于降低毛泽东威望的同时提升自身的威望，一箭双雕。

在此之前：最高层只有一个声音，来自毛泽东，刘少奇只是配合；此后最高层有两个声音，分别来自毛泽东和刘少奇。而大家对刘少奇的声音更为认同。通过这个转折，相当于天空中由一个太阳变成两个。

前面提到过，刘少奇摸不准毛泽东的态度，做了两手准备：即通过情理和组织的双重方式说服毛泽东支持自己调整经济。现在清楚了，情理一手，就是两个虎头，以实实在在的困难摆在毛泽东的面前；组织上的一手就是通过突破毛泽东的方式在组织内部增强自己的威望。这两手他玩得都很成功，此后组织力量渐渐偏向刘少奇。几年之后摊牌时，毛泽东必须依赖军方控制局面。

政治斗争的最高境界是胡萝卜和大棒一起上，而且很巧妙。直到此刻，刘少奇依然摸不准毛泽东的态度，他希望获得毛泽东的支持，坚决捍卫三面红旗，对毛泽东也是一种安抚，包括对彭德怀的那一大段说辞，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可以理解为安抚毛泽东。然而刘少奇很快就会明白，在毛泽东的世界里，从来都是他去安抚别人。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刘少奇说的和做的不一样。在虎头和蛇尾之间是一个巨大的断层。刘少奇把他自己夹在断层之间。为了解决困难，刘少奇决定调整经济政策，必须亮出虎头——即困难多多。然而他没有一个可行性的理论做指导，没办法再次寻求三面红旗。大家都站在红旗下，他想寻求支持者，也没法走太远。如果让刘少奇放手去干，若干年后，他可能根据实践，在他人的帮助下总结一个“刘少奇理论”出来，遗憾的是历史没有给他这么一个机会。

此次大会，说刘少奇打着红旗反红旗，或者说打着红旗反毛泽东，并没错，因为他找不到更好的理论，必须借助三面红旗。但他的改革调整必须背离三面红旗和毛泽东，所以一直处于一个矛盾的境地。刘少奇一生以理论家称著，最后却被夹在历史的狭缝中，牺牲了自己，同时牺牲了很多同志。除了说是时代的悲哀之外，似乎找不到更好的解释了。

（九）林彪在一九六二

刘少奇通过三个小时的口头报告极大地提升了自己的威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刘少奇的声音能够一统天下。即使在毛泽东没表态的情况下，依然有不同的声音，最强音来自林彪。

两天之后，也就是二十九号，第二次全体大会，林彪讲话。

一九六二年，林彪五十五岁，年轻毛泽东十四岁，年轻刘、周九岁，年轻邓三岁，位居中共中央六个副主席之一、中央政治局七常委之一，同时兼任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长，名副其实的实力派人物。其它六个政治局常委，基本上都是政治空壳，没有一个掌军。主席台下，不少人是从军队转行的，都在四野干过，曾是林彪的下属。林彪身体不大好，平时不怎么干事，也不怎么说话。

这一次他决定开口。说真的，林彪的发言并无新意，只因为是林彪说的就显得与众不同，这里顺便解读一下，澄清若干误会。

林彪的讲话，概况起来就是——老一套。

林彪说：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大实话。

林彪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我们应该采取这条路线，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需要多、需要快、需要好、需要省的，是能够多、能够快、能够好、能够省的。我们需要鼓足干劲，能够鼓足干劲；需要力争上游，能够力争上游。我们不能有相反的做法，不鼓足干劲的做法，不争上游的做法，少慢差费的做法。总路线本身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各个组成部分是缺一不可的，如果我们抓到一个方面，丢掉了其他方面，那就不好了。这几年我们工作中产生的一些缺点，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间的毛病。

林彪说：关于大跃进，事实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可以大跃进、应当大跃进的。所谓大跃进，是从比较来说的。我们不能以一种主观的过高的指标来衡量我们是不是大跃进，而是要根据现实的可能，同我国的历史状况来比，同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来比。从这种实事求是的观点来看，即使目前这几年的指标低一点，作为整个历史阶段来看，我们还是大跃进，这一条是无疑的。大跃进是正确的。

林彪说：人民公社，具有很多优越性。在开始阶段，我们还没有完整的经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人民公社这种制度，把过去初级化、高级化的优点都集中起来了，同时又增加了新的特点，毫无疑问，这种组织，在今后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它将随着实践经验的增加被证明是正确的，是能够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快、更好地发展的。我们的的确确找到了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道路。

这是林彪对三面红旗的态度。九一三事件之后，这段话被误解为阴谋家的言语。改革开放之后，这段话又被一系列曲解，以讹传讹。这里没有为林彪平反的意思，然而实事求是地讲，林彪这段话就是一般表态而已。当时绝大多数同志都是这么表态的，都是拥护三面红旗。态度最激进的刘少奇不也是拥护三面红旗的么？就算态度严肃点吧，何曾见过林彪嘻皮笑脸地说话、作报告？

话说回来，就算党内民主风气浓厚，别人可以反对三面红旗，林彪不可以反对。林彪身份特殊，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基本上算军队代言人。如果掌控军权的林彪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军人干政的罪名基本上就坐实了，估计就要当彭德怀第二（这也可以理解为两人的不同：换成彭，估计拉都拉不住，而林彪做了更为谨慎的选择），当然林彪也没有蠢到那份上。就算足够民主，彭真可以反对，陈云可以反对，林彪也不能反对。我们也不能因为九一三事件就对林彪的表态泼脏水。一九六二年的林彪还是军界极具威望的统帅，还没有想到有朝一日要逃走。如果说因为一个人在七一年做的事而去诬陷他六二年的所作所为，政治追求可以理解，政治之外只能说——悲哀——思想、逻辑、文化多重悲哀。

和所有人一样，林彪拥护大跃进，那么对大饥荒有怎样的认识呢？很显然，还是老一套，没有任何新意。

林彪说：两、三年以来，我们国家在某些方面发生了一些困难。这种困难，是多方面造成的。特大的自然灾害，连续的自然灾害，有些地方遭受到毁灭性的自然灾害，这给了我们不可逃避的困难。我们工作上也有一些错误，可这只是工作上的错误，而不是路线上的错误。

林彪说：我们在物质方面，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方面，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们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的收入。我们有失的一方面，也有得的一方面。这种失的方面的作用，暂时还看不清楚，我们应该相信，我们所得到的经验，将要发挥很大很大的作用。

林彪说：就像小学生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很大了。一个小孩子，从上小学起，一直到上大学毕业，十七、八年的时间，他什么也没有生产出来，相反地，尽吃、尽穿。但是他学了以后，就会起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付出那一点物质和时间，不让他学那么一下，他就不行。

林彪说：我们的军队现在不打仗，也经常要打枪、打炮，打了不少的炮弹、子弹，飞机、坦克、兵舰上花了不少的汽油。人就在那里练，而且弄得很疲劳，半夜起来练，练了之后还不是那个人？一点物质都没有增加，相反还消耗了很多物质。付了学费，学到了本事，本事就能够转化为物质，不是转化为原来所消耗的那个相等的物质，而是几倍、几十倍、几百倍增加了的物质。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

这些话概况起来就是，自然灾害导致了目前的困难，咱们物质损失一点，精神却提高了。损失那些物质，就当交学费了，以后我们会得到超额回报的。后人据此认为林彪说这些话时居心不良，没安好心，属于阴险小人之行径。

——很多年来这些脏水几乎当成主流观点加以宣传，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直到很久以后国家还在宣称三年自然灾害，刘少奇也是到四川转悠之后才了解了问题的严重性。林彪当年是个病秧子，见了光就不爽，听见水声就拉稀，基本上就是呆在一个恒温的房子里听点报告，而且不能听太多，听多了累，不可能像彭德怀那样跑出去调查，也没有刘少奇那种力量、水平或政治谋略。他的信息都是从报告里听来的，那就是他得到的全部事实，他根据这些事实说话，也没啥好指责的。

当然，林彪可能从某些渠道得到大饥荒的信息。他是国家副主席，又是政治局常委，而且是军方代言人，有足够的信息渠道。然而林彪的性格是谨小慎微的。

那么为啥会有这些困难呢？林彪认为大家脱离了毛泽东的领导。

林彪说：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

林彪说：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

林彪说：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

林彪说：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仔细分析一下这些话，总结起来就是下面不听上面嘛。站在毛泽东的立场来看就是这样：下面在搞分散主义。这个大会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反对分散主义啊，所以说林彪这些话和其他人依然没有不同，只是看问题更像从军事角度切入。

既然现在有困难，那么应该如何解决困难呢？林彪给出的办法还是老一套：两个字，团结。团结在毛泽东的周围。

林彪说：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我想，事情千千万万，项目多得很，而最大的、首要的，是党的团结。

林彪说：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那就是——实事求是。

这么说并非标新立异或者哗众取宠。事到如今，应该理智一点，避开之前的宣传误导。不能因为林彪在一九七一年干的事，就判断这个人就是为了九一三事件而生的——不是那样。

看看周恩来的发言，跟林彪的发言对比一下，就是一盘双蛇鱼头的另一个半边——一个味道，这里就不列举了。现在看一看被认为是刘邓路线的另一个代表——邓小平的发言。

邓小平说：第一，有好的指导思想。这就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这个思想，从历史上证明了是好的。

邓小平说：第二，有好的党中央，这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来，27年的历史证明，我们的党中央是一个好的党中央。

邓小平说：第三，有大批好的骨干，包括大批新的积极分子。军队团以上的主要骨干，大多数是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锻炼的，地委一级的干部大都是抗日战争初期入党的，县委书记多半是抗日战争中期入党的，当然也有一批新的。这些骨干，是经过风浪的，是很可宝贵的。现在，我们的干部又有了12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包括正面的经验和反面的经验。正面的经验是很重要的，反面的经验也是很重要的。刘少奇同志的报告中讲到，我们有了反面的经验，就增加了“免疫力”。我们的干部，经过历次革命斗争的锻炼，又有了12年建设经验，是我们党的好的骨干。

邓小平说：第四，有好的传统、好的作风。我们党的好传统、好作风，就是毛泽东同志所概括

指出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作风，联系群众的作风，自我批评（当然也包括批评）的作风。总的来说，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实事求是的作风。

四年之后，邓小平被当做全国第二号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被打倒。然而七千人大会上的邓小平，这些发言和林彪有多少本质区别？

同样，朱总司令的发言，也是吞吞吐吐，因为他对形势并不明了。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态度，可以理解为政治选择。朱德和林彪的发言，则应该是政治觉悟一般的军人的正常体现。

考虑到林彪的身体状况和生活环境，不能指望他在政治上比刘少奇做得更多。战场上，林彪是大师。到了政治舞台，也许他不能算太差，但站在刘少奇这种大师级的人物面前，还是丘八一个。你可以指责他谨小慎微，如此而已。谨小慎微也是有原因的，原因之一：他的身体状况不允许跑出去调查，不了解实情，没有发言权；之二：他是军人，不能干预当时的政策，即必须全力维护三面红旗；之三：林彪看问题，是站在军事上看。换个角度？不好意思，他只擅长军事，连生活都很外行，就算他想烧一把火也没那实力。

在政治舞台上，哪个不是谨小慎微？除非到了必须抉择的时候才豁出去了，如彭德怀在庐山，如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说白了林彪就是一个军人而已，离开了战场，他不见得就比一般人强多少。没必要要求半个世纪之前的军人预知未来，没必要拿顶级政治家的水准要求一个军人，也没必要因为军人后来犯了错就贬得一文不值。

林彪讲完话，毛泽东起身鼓掌，曰好。

这个举动被认为林彪善于揣摩毛泽东心思的证据，其实正好证明毛泽东和林彪看问题的角度是一致的。我们在《大饥荒》的篇章里，解析“致命的三面红旗”时已经指出，三面红旗如果顺利实施，中国将变成一个半军事化国家。换句话说，三面红旗本身就含有“以治军的方式治国”的理念。所以说在对待三面红旗的问题上，毛泽东和林彪的看法一致一点也不稀罕，都是军事视角嘛。

但林彪的态度确实增加了毛泽东反击的底气，因为林彪是军方代言人，他的意见就是军队的意见。毛泽东正是通过林彪的发言摸到了军方的立场。正因如此，毛泽东才敢于在组织上占劣势的情况下发动文革，但不能因此说六二年的林彪就怎么怎么样。

（十）毛泽东的反击

开会，尤其是重要会议，其实就是领导们的表演舞台。何为领导？把那一堆抽象枯燥的词语换成白话，也就是他说话时大家好好听，听到之后记在心里，记在心里之后回去行动。你讲话没人听，你的政策没人理会，那不叫领导，那叫傀儡。平时嘛，娱乐、休闲啊什么的，都是平常活动，但开会不能出差错。所以每一次的重要会议，领导们都会仔细穿好衣服、整理好头发，把心气和精

神调整到最佳状态去表演。

七千人大会上，国家领导刘少奇虽然把自己置于一个矛盾的境地，却通过大胆犀利的言语赢得一片掌声，风光占尽，大有直上云霄之势。

作为领导的领导——领袖毛泽东，又该如何表演呢？确切说，他不是在进行表演，而是在反击。他要通过自己的方式，把同志们的心再次吸引到自己这边来。要不然，所谓领袖就成了名义上的“太上皇”——空架子。

毛泽东的反击策略有两个：一，占领理论制高点；二，抓基层干部。这两手，是毛泽东长期以来成功的法宝。有了理论制高点，就可以理服人、掌控话语权，和蒋介石斗，扛起民族大旗；和张国焘斗，打中央招牌；自己登上领导岗位，那就横扫天下。抓住基层干部，相当于抓住整个组织体系，遇到要紧事，召开扩充会议，扩进来的人都是毛泽东的支持者。干好这两手，意味着事半功倍，意味着成功，意味着无穷的力量。

既然毛泽东决定召开这样一个大规模的会议，首先就应该研究一下他的动机。其实动机和三年前的庐山会议一样，就是团结、鼓劲的。三年前，大跃进受挫，毛泽东信心满满地召开神仙会搞团结。经过三年的惨痛教训，毛泽东还没有找到好的办法。三年来究竟发生了什么？干部究竟怎么了？为何败得如此惨痛彻底？毛泽东不明白。但是会议必须召开，不开，混乱将继续。所以仅仅召开大会，却始终沉默不语，摸清大家的心思，然后再发表自己的观点。三年前他可以信心满满地教育广大干部，继续干，现在他没有这份信心了。然而他惊奇地发现，和三年前的庐山会议一样，七千人大会的走势再次超出了他的预期。

三年前是彭德怀，三年后是刘少奇。

刘少奇发表那番语惊四座的演说前并没有和毛泽东沟通，相当于对毛泽东搞突然袭击。后来江青说“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憋了一口气”。此话甚有道理，这口气很大程度就是指刘少奇搞突然袭击。当然，刘少奇已经决心改变，有理由那么做。为了实现改变，他选择绕开毛泽东。现在又有一个假设：假设刘少奇和毛泽东沟通一下会怎么样？一般情况下，这种假设不会有答案。但是这个假设，答案可以猜测：否。因为刘少奇的策略是矛盾的。代表们因为当时听得爽，还没有体会到虎头和蛇尾之间的断层，毛泽东却看得很明白。

毛泽东感觉很不爽：好哇你个刘少奇，有底牌不亮出来，跟我玩突然袭击！毛泽东恼火的不仅仅是刘少奇的观点，还有刘少奇表达观点的方式。此时的刘少奇已经超出了毛泽东的掌控，走向毛泽东的对立面了——尽管刘少奇还在幻想获得毛泽东的无条件支持。

三年前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选择拿下彭德怀。拿下彭德怀，让所有敢于反对的声音闭嘴，所有人无条件地响应号召。那时候大饥荒的征兆已经出现，大家还没有见识到它的威力。经过大饥荒

三年的施虐之后，毛泽东谨慎很多了。尽管如此，他依然要把广大干部团结在自己身边。下命令是自己的活，执行命令却要下面的人去干。刘少奇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赢得人心，正如刘少奇十分了解毛泽东一样，毛泽东同样十分了解刘少奇：如此严谨的同志，表现如此反常，表明他已经下了决心。毛泽东明白，刘少奇已经不再是昔日的忠实助手，如今已经羽翼丰满，要自立门户唱戏了。

第一招：理论制高点

毛泽东要想胜过刘少奇，必须拿出更为深刻可行的东西出来。然而这一次有点难。如果按照刘少奇那个报告的思路更进一步，或许会赢得更多掌声。但毛泽东是不会那么干的，原因是，刘少奇那虎头和蛇尾之间的巨大矛盾。毛泽东绝不会让自己陷入矛盾的境地。他做重要决定之前，都有完善的理论依据。

三十号的会议上，就一件事，毛泽东做报告。毛泽东也是口头报告，既然刘少奇是口头报告，毛泽东更没道理念稿子了，要不然气势上就弱了半级。大家对毛泽东这次讲话非常期待，因为他们都是老党员，知道共产党在历次的艰难关头，毛泽东总有办法解决问题。现在大饥荒肆虐，大家再一次希望毛泽东能拨开云雾见青天。

代表们的脑袋里回忆着过往的一幕幕。

第一幕：秋收起义之后，队伍接近解体。毛泽东对余下的队伍进行整编，确立“党指挥枪”这条决定性原则，然后带着队伍去井冈山，为日后共产党提供落脚点。

第二幕：遵义会议，战略转移逐渐进入死局，又是毛泽东出来指挥军事，然后队伍到达陕北，共产党再一次逃出生天。

第三幕：一九三六年，国、共、日三方纠缠不清之际，毛泽东挥笔写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最复杂的时刻指导共产党从容应对。

第四幕：一九三八年，国共合作抗日，大家想不明白。毛泽东又写了一篇文章《论新阶段》，从思想上告诉大家，如何跟国民党相处又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

第五幕：抗日战争最为严酷的时候，许多人或急躁（认为可速胜）或自卑（认为要灭亡）的时候，毛泽东写了那篇军事杰作《论持久战》。

第六幕：抗战胜利，中国该何去何从？毛泽东再次高屋建瓴，写下《论联合政府》。

如此等等，每到关键时刻，毛泽东那高大的神奇的形象总是以独特的方式出现，带领同志们走向胜利。毛泽东之所以称为最高领袖，是靠实力赢得的。

这一次又将如何呢？代表们在期盼着。

刘少奇已经给他们上了一盘山珍，他们希望再尝一尝毛泽东烹饪的海味。让他们颇为意外的是，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厨艺仿佛下降了不少，端出来的菜味道怪怪的，远不如刘少奇的菜可口。

毛泽东口头报告的内容：民主集中制；关于认识世界的问题；对国际的看法。

何为民主集中制呢？就是把权力集中起来发扬民主作风，团结绝大多数人，对少部分人实施专制，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毛泽东说：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做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

毛泽东说：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

毛泽东说：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也不行，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所以，没有民主，就不能克服困难。现在不是强调集中吗？强调集中，首先要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经济。

毛泽东说：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的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凡是个人说了算的第一书记，就是一人称霸，就叫“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

听起来非常美好，但是有一个致命缺点：那就是人民群众仅仅监督而已。人民群众并没有参与进去，更没有约束的权力。然而在那个民族意识觉醒而民族智慧没有开启的时代，人民群众只有狂热精神，并无思辨能力监督政府。如果党组织内部对集中起来的权力制约不力，必然形成一个巨大的官僚阶层，这个阶层会在组织内部争夺每一个权力重新分配的机会。等到若干年以后，毛泽东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时，又过于天真激烈，惹出另外一系列的灾难，这是后话。

在七千人大会上，尽管“民族集中制”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在当时大家一致反对分散主义的背景下，在整个国际国内的大背景下，已经是能做到的最好的选择了。

至于认识世界的问题，对国际看法，都是老话题，翻不出新意来。因为美国既没有跨过越南进来；苏联也没有从北方突入；蒋介石虽然还在口头上反攻大陆，实际上心里在默默祈祷大陆不要进攻台湾。国际形势虽然复杂，目前还是安稳的，目前最重要的是解决大饥荒遗留的问题。所以这篇

讲话立意虽然高远，比刘少奇的讲话更为深刻，然而却属于远水，远水解不了近渴。

因此毛泽东这番话虽然引起了一定反响，但论影响力还是比不上刘少奇三天前说的话。如果会议到此结束，那么风头就被刘少奇占尽。

怎么办呢？出第二招，出气。

三年前在庐山，毛泽东在延长会议之后选择猛烈出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彭德怀推入历史的断壁之中，方式极为霸道。三年之后，局势已变，刚猛霸道的方式不能再用了，需要另一种方式——笼络人心（或者说官心），对抗刘少奇的求变。毛泽东的杀手锏是——延长会议，让大家出气，又名“出气会”。

本来会议决定三十号结束的，这天下午仅安排了一个节目：毛泽东讲话。再过六天就到春节了，大家要各找老婆孩子炕头热。毛泽东告诉大家：为什么一定要回到你们家里过春节才算舒服？我们在北京七千人一道过个春节不好？我看，春节不关大局，不关什么农业、工业、商业、学、兵、政、党，过也好，不过也好，我主张集体在北京过一个春节，有什么不好啊？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极其受欢迎的意见，大家情绪非常的高昂。虽然春节陪老婆、孩子很重要，然而在那个视领袖如神明的年代，多看领袖一眼都会引起心中强烈的火焰，何况一起过年！短短几句话就把气氛推向高潮。一九六二年春节，代表们过得相当满意：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

出气会上，毛泽东选择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自我检讨。

在此之前，毛泽东也做过检讨。最有名的那次是在延安整风后期，拜康生同志出神入化的审干业务能力所赐，整个苏区人人自危。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好几次脱帽鞠躬，给大家赔不是。这一次，整体上是另外一种气氛。尽管确定了集体负责，中央领导人在各个场合表示了一定程度上的检讨，这种检讨是很不彻底的，特别是省委一级，时间紧迫，还没有轮到。毛泽东提出延长会议让大家出气。地委、县委一级是欢呼燕雀，但是很多人心里肯定是很不好受的。比如说曾希圣同志，如果一月三十号大会结束，他还是安安稳稳地回到安徽，做他的一把手，谁有意见就灭了谁。会议一延长，好了，完了。

要让所有人彻底检讨，最好的办法就是领袖带头检讨。

毛泽东说：同志们，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做检讨。

毛泽东说：去年6月12日，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才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

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毛泽东说：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

毛泽东说：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

这些检讨取得极大成功，毛泽东的自我批评，在会上引起极大的波动。当时很多人认为：“毛主席绝对正确，有些事办错了，也是歪嘴和尚念错经，是下面的错。”

有人当场表示：听了主席的讲话，只有一条意见，就是他老人家不该做检讨，我们把工作做坏了，为什么叫他老人家检讨呢？

很多人感动得流下眼泪：主席都检讨了，我们还有什么说的？

这些都是地委、市委级别的领导，职位相对较低。按照大会反分散主义的原则，这些人手中的权力要被收回，而且可能被追究责任。回到地方，省委如果清算，这些人可能要背黑锅。信阳事件，搞民主补课，一下子修理了那么多人，不就是基层干部背黑锅么？

毛泽东从自己的身上检讨，给所有领导人做了一个表率：所有人都有错，不要想赖账。如果想赖账，那就到组织外面去赖。所有人，如果脱离组织，相当于鱼儿蹦上岸，谁敢？毛泽东来这么一手，基层干部能不感动么？毛泽东这辈子最大的特点就两个：一个把枪杆子紧紧抓在手里；另外一个就是，他总是和最基层站在一边。平时代表广大的工农阶层，在七千人大会上，最大的阶层就是地委、县委这一级。

毛泽东这么干，相当于带领一批地委书记和县委书记去踢省委书记和市委书记的屁股。——让你们老虎屁股摸不得，偏要摸。

本来还有很多地方老大、省委书记什么的，借反对分散主义之风说：错误都是你们的。这下好了，最高领袖都自我检讨了，还敢嚣张只有死路一条。一个个赶紧夹着尾巴做人，开始从自己身上找错误。当然原则性错误是没有的，小毛病是少不了的，大毛病尽量淡化。就算自己找的不够，还要发动众人帮着找。虽然心里恨得直痒痒，还得笑着请下属批判，美其名曰：同志们，你们就可怜可怜我，帮我找点小差错过关吧。不是他们喜欢在下属面前哀求，实际也是情非得已：要不然的话，中央来帮忙。

毛泽东并不是一个喜欢认错的人，更不喜欢检讨，每一次检讨都有极大的政治需求。延安整风之后检讨，是为了安抚一下逃过康生魔爪的那些受伤的心灵，让他们好好干活，为了红色共产主义

理想而奋斗。这一次也一样，把广大基层干部抓在手中。

尽管在这次大会上很成功，成功地把大会推向另一个高潮。然而从长远角度上看，他还是失败了。因为在未来几年内，行政系统基本倒向了刘少奇。

刘少奇的言行是不一致的，行动和言词是矛盾的；毛泽东的行动和言词是一致的。但是刘少奇赢得了行政系统的支持，原因并不是刘少奇突然比毛泽东高明了，而是他们的理论依据——三面红旗有大问题，尽管两人都没能有新的突破。刘少奇背离了那个有缺陷的理论，所以离“实事求是”更近一点，要“求是”更简单一点。

（十一）从曾希圣和李井泉的结局看七千人大会

如果大会真的在一月三十号结束，很多问题就来不及澄清。比如说谭震林，大饥荒时代，他是分管农业的，无论如何集体负责，谭震林都难逃干系。关于谭震林的事，留到二月逆流再讲，这里讲一讲另外两个牛人。

七千人大会会有很多诡异的东西。比方说，后来被广泛宣传的英雄们，实际上并没有那么英勇。比方说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发言，就没有任何英勇的地方。这些事例只能解释为，政治是复杂的。最为复杂的一点便是曾希圣和李井泉的结局。

同为饥荒时代的五虎上将，因为坚定贯彻三面红旗的精神，带来无穷的灾难。到七千人大会时，五虎之中的三虎（舒同、张仲良、吴芝圃）都已没了牙齿，只剩下曾希圣和李井泉两个人。面对汹涌的大饥荒，两个人还是做了不同的选择。

曾希圣选择以“责任田”的方式把土地给分了，这个举动挽救了安徽很多人的生命。

李井泉选择坚决执行中央命令，咬着牙调粮，加重了四川的饥荒程度。

如果搞清算，把两人全部给刷了，想必任何人都没话说，然而实际情况复杂得多。直到一月三十号，也就是七千人大会按照原定计划行将结束之时，他们还如同两尊大佛一般岿然不动。更气人的是，当时定的四个受灾大省分别为河南、山东、甘肃、青海，安徽和四川竟然不在列，真是岂有此理！

大家自然很不服气：死了那么多人还能糊弄过关，还有天理和王法么？安徽又不是你曾希圣的，凭啥就一手遮天？！

曾希圣，一九零四年生于湖南书香门第，六八年病逝于北京。

职业：革命家，政治家。

性格：强势。

曾希圣十八岁参加革命，二十岁加入黄埔军校，参加北伐，赴苏联学习，二七年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值文斗转向武斗的阶段。多次在中原一带从事革命工作，然后在新四军当了一系列不同级别的干部。大饥荒时代主政安徽，让安徽农民尝尽人世的辛酸，同时也让安徽的官员尝尽官场的辛酸。

农民没有机会让曾大官人尝尝苦头，但是干部有机会报复霸道的曾书记，让他尝尝官场的辛酸。比方说在七千人大会上，就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此时再不发飙，更待何时？

于是在大会即将结束时，一位勇敢的同志写了封匿名信：许多代表和他们一样，话没有讲完，还憋着一肚子气，省委压制民主，不让人讲话。同时还有另外几封信，内容大致不差，就是讲曾希圣在安徽搞一言堂，没人敢讲话，大家本来对中央开会抱了很大希望，想在中央的会议上把问题讲出来，看来现在没有法子讲了，因此很失望云云。

毛泽东接到这些信后估计很生气，好哇曾希圣，还想搞割据不成？掂量掂量自己的斤两先！于是刘少奇到了安徽组负责揭盖子——安徽的盖子就此揭开。

曾希圣同志知晓刘少奇来安徽组摸底，还耍了一个花招：请彭真捎话给刘少奇，请刘主席给安徽的同志鼓鼓劲。曾希圣敢这么做，并非胆大包天等等，而是听了刘少奇讲话之后的自然反应。刘少奇的报告和曾希圣干的事简直是不谋而合——看刘少奇后来的经济调整，还没有曾希圣的办法直接有效，所以曾希圣有理由对刘少奇充满期待。当他听说是刘少奇到安徽组负责出气，心中应该是美滋滋的吧：这一次又跑到政策的前面，又可以当明星了，说不定还能进入政治局，成为常委，再进一步……好梦由来最易醒。

梦是好梦，现实是复杂的，政治尤其复杂——刘少奇很快敲碎了曾希圣的梦。

刘少奇来到安徽组之后是这样鼓劲的：关于私人和减产这些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的？我在报告中讲了四条缺点、错误，安徽有多少条？是多一条两条，还是减一条两条？错误的性质，我在报告中说，不是路线性的错误，是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安徽是不是这样？错误的责任，总的来说是中央负责，省、地、县是个什么责任？

这一连串组合拳把曾希圣轰得手忙脚乱，省委下面那些人则受到极大鼓舞。大家七嘴八舌说曾希圣同志如何如何霸道，如何如何蛮不讲理，如何如何一人说了算，如何不顾及作为下属们的感受等等。

面对上下夹击，曾希圣同志就算真是老虎也架不住了，于是拿出组织内部的生存绝学——检讨：一是对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没有认真研究，不求甚解，贯彻不力；二是实际上形成了对中央封锁

消息；三是对中央有些部门傲慢乱顶，对友邻地区关系没搞好；四是对同级和下级不民主，不以平等态度待人。所有这些，都使党受到了严重损失，使人民受到了严重损失，使工作受到了严重损失，造成了严重非正常死亡，破坏了农村生产力。

一句话——教训是非常沉痛的，我已经知错了。

在当时，如此检讨之后都会换来一句：某某同志还是好的，还是支持政策的，只是在执行时出现了点偏差等等，然后了事过关，即使有账等到将来才算。然而曾希圣没有听到这席话，他摇了摇头，听到如下声音。

刘少奇听完检讨问大家：曾希圣同志、黄岩同志作了检讨，你们满意不满意呵？

众声皆曰：不满意。

曾希圣同志的政治生命就此划上句号，人生就此转折。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前一天吃饭，大家还非常希望和曾书记同桌，聆听书记大人的教诲。一转眼就没人愿意和这位曾经的“霸王”沾边了。“出气”期间，大家都有位置，曾希圣没位置，他只好自己从别的地方找把椅子。人情冷暖就在一瞬间呵，其中的悲凉，唯有当事者方能体会吧！

需要指出的是：曾希圣确实对安徽百姓犯了天大的罪过，但是他的责任田却是一条出路。他对下属官吏可能霸道粗鲁，一部分打成右派，然而这些只是个人恩怨。不能就此认为这些反对曾希圣的官员就如何高明，因为大饥荒中他们同样对安徽百姓犯了罪，而在那个集体犯罪的大环境里，他们并没有提出任何建设性意见。换句话说，他们没有资格反对曾希圣。有资格反对曾希圣的是安徽百姓，而百姓没话语权。官员反对曾希圣，不过是出于个人恩怨或者跟风、随大流而已。因此不能把这个声音——不满意——理解为正义之声，相反，这个声音扼杀了一个有罪的探索者。

这些反对都是常态，可以理解。反常的是，刘少奇为何要对曾希圣穷追猛打？和刘少奇同时参加各省讨论的政治局常委中，周恩来到福建组，朱德到山东组，陈云到陕西组，邓小平到四川组，各省一把手分别检讨一番过关，唯独曾希圣立刻完蛋了。

刘少奇说：我想了解安徽一些真实情况，希望大家说真话，说心里话。问题严重的有山东、河南、甘肃、青海几个省，安徽没有算在里面，但安徽问题比河南严重，比河南严重的是把问题一直包到现在，直到这里还不讲老实话。讲假话是不允许的，在今天以后，再讲假话要立即开除党籍，不管是谁，30年党龄也要开除党籍。

刘少奇说：现在别的事情我不抓，专门抓要讲老实话。不管问题怎么严重，都可以不处分，批评一下承认错误，改正错误，但是再说假话，非处分不可。因此，我要有点压力。现在有两种压力，一种是不要你们讲老实话的压力，一种是要你们说老实话的压力。共产党员应该说老实话的，三大

纪律中的第一条就是要如实反映情况，我在报告中也讲过了，不如实反映情况，是丧失党性的表现。

随后曾希圣在安徽下岗，从此以后，虽然身居高位，实际上却是闲云野鹤，无事可干。

单纯追究责任，罢免曾希圣无可厚非。然而当时并没有大规模追究责任，为何把曾希圣赶入绝路？要知道曾希圣不同其他人，虽然犯下大错，但是他后期的作为——把土地承包出去——实际上是给中央找到一条出路。刘少奇想要大规模调整经济，应该把曾希圣引为知音才对，不应该如此不留情面。

如果要分析其中的原因，只能是猜测了。在行事方式相似却要拳脚相加的情况下，要猜测，只能从立场来猜。就立场来说，当时刘少奇和毛泽东已经出现分歧，下面这些人就会牵扯到一个问题：站队。站队不是问题，每一次最高领导层出现分歧，都会出现站队的问题。正如文革开始后，林彪对贺龙说：你的问题很简单，可大可小，就是支持谁反对谁的问题。

然而曾希圣很独特，他干了很多很多人想干而不敢干的事，换句话说，是个出头鸟。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可以当，就是出头鸟不好当。

假设曾希圣应该站在毛泽东的一边，对刘少奇而言就是一个巨大威胁。因为曾希圣比刘少奇走得更远啊，到时候出了成绩，毛泽东可以说曾希圣就是他请的代言人嘛。曾希圣在，相当于夺了刘少奇的旗帜，所以刘少奇要把曾希圣借机拿下。

另一种可能就是，曾希圣站在刘少奇一边。从后来毛泽东的表现看，他根本就不认同刘少奇那种理论和实践分裂的行径，所以把曾希圣撤掉，借此警醒刘少奇不要胡来，不然曾希圣的前车之鉴还有后辙。

还有第三种可能，就是不管曾希圣支持谁，毛泽东都要通过拿下他警告刘少奇。

所以曾希圣注定出局。当曾希圣出局时，刘少奇心中作何感想？有英雄相惜之情么？这个答案已经无从知晓了。虽然曾希圣同志曾经足够活跃，虽然在很多人眼中曾希圣已经很大，但是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曾希圣的级别和分量都差得太远。根据分组来看，偏偏把刘少奇分到安徽组对付曾希圣就能看出苗头了。

评：曾希圣不是一个好官，但当时拿下他，不该。

曾希圣成了最高层矛盾分歧的牺牲品。

曾希圣有些不服气，特别是跟李井泉对比一下之后，更为不服气了。

李井泉，江西人，生于一九零九年，死于一九八九年。

职业：革命家，农民（注意这个身份）。

特长：坚决贯彻执行上级命令。

信念：视组织为生命。

李井泉是在二七年参加革命的，那时他只有十八岁。加入革命队伍之前因为家庭贫穷又是老大，已经当过几年农民，种过几年地，对插秧和收割有直观体验。在四川折腾出那么大动静是不可理解的。要理解他……不说也罢。

四川情况比安徽严重，其他省份的灾难减少了，四川的灾难还在继续。其他省的一把手都下岗了，李井泉还是四川的一把手。这个情况让四川省委下面的工作人员受不了。

和安徽一样，中央也受到来自四川的匿名信。大致内容也是差不多：李井泉很狂很霸道，中央精神不传达，让人不敢讲话等等。简直就是一军阀嘛，要整一整。

中央随后派邓小平去四川给大家出气。邓小平是四川人，又是李井泉的老上级，有助于摆平问题。然而事实是，若干天之后，李井泉又回到四川，继续以中央委员的身份当省委第一书记。中间的是是非非已经很难说清楚。

和曾希圣一样，李井泉的角色定位也很难。大跃进时代，李井泉是跟着毛泽东干的，可谓立场坚定。通过大饥荒的折腾，刘少奇已经和毛泽东分裂。邓小平和刘少奇纠缠在一起，同时李井泉和邓小平的关系一直很不错。解放大西南，李井泉就是在贺龙和邓小平的领导下工作的。若干年后，邓小平被流放，依然和李井泉保持着良好的个人关系。随后李井泉惨遭批判，又是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平反。

其实根本没必要纠缠李井泉的立场。因为他注定不会有事。

在七千人大会上，在毛泽东和刘少奇已经闹矛盾的情况下，李井泉的界限已经非常模糊。作为地方势力派，李井泉本就是三面红旗的忠实粉丝，毛泽东不会无辜清洗他。刘少奇要搞调整，更需要地方派系的支持。

所以无论李井泉的立场如何，都会平安度过七千人大会上那一关。因为他没有像曾希圣那般当出头鸟，把自己龟缩在体制内部，反而成了香饽饽。

当曾希圣看见李井泉的待遇，不应该感到不公，却也应该释然。是非功过，终究是要还原的，就算不能直接触及真相，却可以逼近真相。

然而关于大饥荒的责任并没就此结束，这不过是个开始而已。